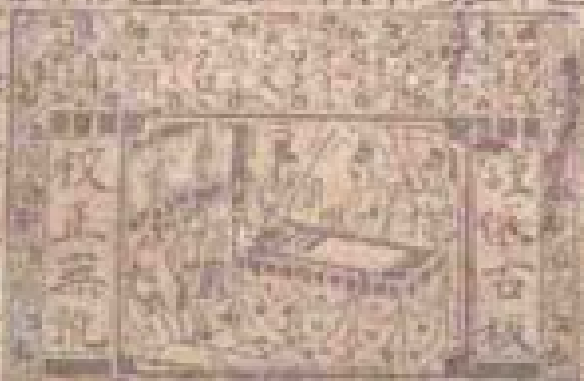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

姜亚沙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ISBN 7-5013-1859-X

9 787501 318599 >

ISBN 7-5013-1859-X

K·369　　定价：16.00元

553
7838
347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

姜亚沙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A10642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姜亚沙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5

ISBN 7-5013-1859-X

Ⅰ.影… Ⅱ.姜… Ⅲ.古籍－影印本－简介－中国

Ⅳ.G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360 号

书名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

著者 姜亚沙 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电话（010）66126153 传真（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 nlc. gov.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75

版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0（千字）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5013-1859-X/K·369

定价 16.00 元

前言

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聚集于各公共图书馆的古籍文献中，这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协同各图书馆，发掘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影印出版了许多珍贵、稀见的古籍文献，包括罕见的刻本、抄本、异本、名人稿本、佚文、信札、墨迹、稀见方志、档案等。

本人从事古籍影印工作已有十几年了，在整理编辑这些珍贵的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文献中，深感我国历史悠久，文献资源浩瀚，祖先留下的这些无价的财富，亟待整理影印，传及后代，以发扬光大。“缩微中心”十几年来影印出版了上百种文献，分成《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中国佛学文献丛刊》、《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中国公共图书

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等几个系列，每个系列又分若干种古籍。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文献中，每一种都有其珍奇之处。一般善本书常人难以得见，尤其是那些珍稀孤本，更是难中之难。所以缩微中心每整理影印一部古籍都受到普遍的欢迎。每种书的出版前言都对该书的版本源流及其价值作了简要介绍，这些介绍都是经过专家、学者反复推敲、论证的结果。此《举要》就是在这些前言的基础上综合改编而成的。

在邀请史学专家瞿林东教授为《明刻珍本史学要义》作序时，他看到了我们的出版目录，感到惊讶、兴奋："影印出版了这么多有价值的古籍，真是功德无量！"当我告知想编写一本《影印古籍文献珍本举要》以便向读者进一步揭示"中心"所影印的文献古籍时，瞿教授大为赞赏，鼓励我进行这项工作，并送给我一本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让我作为参考。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现在《举要》的编排体例基本上仿照此书。

此《举要》在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古籍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三种加以介绍。在这七十三种影印古籍中，按其特点又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首次影印鲜为人知的名家手稿本。例如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成书于乾隆三年的《水经注》五校稿本，一直深藏而秘不宣示。未刊之前的几百年间，只

有胡适与陈桥驿两位先生读过，胡适曾称此本为“天地间仅存之孤本”。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外国通鉴稿》是一部不见任何著录的研究中外交通以及中国周边诸国历史的重要著作，王氏此手稿本是偶从造纸厂化浆处拣回而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的，现首次影印问世。此外还有王先谦未刊稿本《蒙古通鉴长编》等。

二、首次影印一些未刊的重要抄校本。如《抄本聊斋文集》（道光间抄）、《抄本黄公说字》、《小学稿本七种》、《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古泉汇考》（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批校）等。

三、一批珍稀刻本。如清天禄阁原藏《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明刻柳氏自存孤本《柳如是诗文集》，清代禁书《皇明资治通纪》、《足本按辽疏稿》等。

四、罕见的重要工具书，如《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抄本历代高僧集传》等。

五、罕见的外国刻印的中国古籍，以及中国人介绍外国情况的图书。如：有中土已失传而在日本1857年印行的《夷匪犯境闻见录》（鸦片战争史料集。清代官员编纂，稿本流入日本而中国未见著录），朝鲜李朝全罗道刻于明正统五年（1440）的《樊川文集夹注》。又有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著作《瀛环志略》（日本刻本）与记录清官员从欧洲接回所购兵舰沿途见闻的

《航海琐纪》，这两种书是清人对当时外国情况的观察与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流传在国外的珍贵版本及信函，如：《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日本中土往来书信集》、民间收藏的稀见本《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等。

六、经过整理或汇辑的典籍。如《澳门问题史料集》、《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及其续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及其续集、《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等。

《举要》是以每种书的成书年代顺序排列，综合类书排在最后。每种书均著录有：书名、略名、异名，卷、种，成书年代，原书收藏者，影印书序作者，撰者生平、著述，版本源流，内容体例，版本价值，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实意义，其他版本的正误，影印编辑说明等。

此书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如：《中国人名词典》、《中国善本书提要》、《史籍举要》、《历代官制概论》、《中国古籍二百种提要》、《清代名人千家著作举要》等。得到了陆宏基、陈翔华、杨素英、陈湛绮、经莉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宋拓王献之法帖朱释本 …… (1)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 (3)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 …… (5)
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 …… (11)
容斋五笔类钞 …… (15)
《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 …… (20)
皇明资治通纪三种 …… (24)
纪录汇编 …… (29)
世庙识余录 …… (30)
宋元资治通鉴 …… (33)
皇明经济文录 …… (34)
宪章录 …… (36)
明刻珍本《史学要义》 …… (39)
皇明肃皇外史 …… (45)
四镇三关志 …… (47)
抄本筹边纂议 …… (50)
南北史合注 …… (52)
《明文海》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 (55)

足本按辽疏稿 …… (60)
柳如是诗文集 …… (62)
两朝宪章录 …… (67)
东莞志 …… (69)
宪章外史续编 …… (72)
西园闻见录 …… (74)
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 …… (76)
平闽记 …… (79)
抄本黄公说字 …… (80)
《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 (85)
蒲松龄手稿本《聊斋志异》 …… (89)
清抄本聊斋文集 …… (94)
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 …… (98)
小学稿本七种 …… (102)
南征日记 …… (108)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 …… (110)
安南纪略 …… (115)
澳门问题史料集 …… (117)
古泉汇考 …… (124)
宋会要辑稿补编 …… (128)
吴大澂手批本弟子箴言 …… (131)
蒙古通鉴长编 …… (134)
抄本历代高僧集传 …… (137)
外国通鉴稿 …… (140)
太平天国稀见史料 …… (142)

瀛环志略·航海琐记 …… (145)
夷匪犯境闻见录 …… (149)
道光间广东防务未刊文牍 …… (152)
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 …… (154)
北洋海军资料汇编 …… (157)
刘襄勤公奏稿 …… (159)
科布多史料辑存 …… (162)
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 …… (165)
钦定台规 …… (167)
满洲编年纪要 …… (169)
稿本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事略 …… (171)
历朝折狱纂要 …… (174)
袁世凯未刊书信手稿 …… (175)
陶勤肃公新疆奏稿 …… (177)
明代宫廷杂录汇编 …… (179)
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 …… (182)
直庐日记 …… (184)
文澜阁四库全书选粹 …… (186)
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 (189)
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 …… (193)
丝绸之路资料汇钞 …… (196)
广东通志稿 …… (218)
清代粤人传 …… (225)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续编 …… (228)
淹留 …… (236)

诸葛亮传记集……（239）
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245）
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254）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259）
名人楹联墨宝集锦……（266）

宋拓王献之法帖朱释本

宋拓王献之法帖朱释本　（东晋）王献之书，共有《鹅群帖》、《江州帖》、《疾不退帖》、《消息帖》、《集聚帖》、《铁石帖》、《知铁石帖》、《玄度帖》、《忽动帖》、《委曲帖》、《庆等帖》、《新妇地黄汤帖》、《鸭头丸帖》等十三种。有邃道人跋。现藏于河南省图书馆，卷前有陶善耕影印序言、卷后释文。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工书法，兼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在继承王羲之基础上，进一步改变当时古拙的书风，有“破体”之称，其书英俊豪迈，颇有气势。王献之五岁学书，传说其父潜其后掣笔，其笔不脱。其母郗璇乃女中仙笔，舅舅郗惟、郗昙皆知名书家。其由州主簿、秘书郎升转秘书丞、公府长史，又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等。婚后约八年，迫于皇室压力，做了简文帝司马昱的驸马。不久，拜中书令。

古今书家对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品和人品早有定论。如果“清风出袖、明月入怀”是对王羲之的“书圣”之颂，那么“书脱巢穴、自标新意”则是对王献之的“破体”之誉。其实，从王献之青壮年时代起，到唐代初年，其声望远在其父之上。南齐刘休云：“羊欣重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书微古，

不复贵之。”或许是功成名就的缘故，唐太宗李世民对善于继承的王羲之情有独钟，将其真迹常置座侧，称之“尽善尽美”；而对勇于创新的王献之却百般斥责，谓之“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因李世民褒父贬子，使王羲之书得以盛行，而王献之书则较少存世。今见王献之存世书迹以小楷《洛神赋十三行》，以及《中秋帖》、《鸭头丸帖》、《保母砖帖》、《二十九日帖》、《地黄汤帖》、《辞中令帖》、《鹅群帖》、《授衣帖》、《舍内帖》、《东山帖》等最为著名。宋太宗酷爱书法，命翰林侍读学士王著编次《淳化阁帖》，其中就收有王献之的若干墨迹。

尽管所影印的河南藏本法帖不曾为历代书家或金石学家所提及，与流行较广的《淳化阁帖》相比，其字形、拓风及释文也不尽相同，其真伪尚待进一步考证鉴别；但如邃道人在跋中道：“假使当年手泽犹存不识，赏鉴家果能辨其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否耶?”他叹曰：“虽宋拓也，犹存古意。”也难怪鲁阳（今河南鲁山）赵氏在大梁（今河南开封）购得此帖之后，视为稀见拓本，用夹板珍藏。

由此祖帖而生发，自宋到清中叶，因大量学书者学帖的需要，摩勒拓印从官方流向民间。但因晚清之后的连续战乱，这些民间拓本渐渐失佚。所以更显此宋拓本之珍贵。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唐人撰　唐耕耦、陆宏基编。本书是从英、法、日、前苏联及我国所藏数万件敦煌秘室文书中选取有关社会及经济方面资料，汇编成五册，用原件照片及现代释文分类影印，并附前人研究论著索引。这是一部大型的参考工具书。其中许多资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卷首有唐耕耦、陆宏基前言。

敦煌石室所出文书，有数万件之多，内容极其丰富，除了大量的宗教经典和经、史、子、集各类汉文古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政府和寺院档案、契约、文书等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以及山川、地理等是极其珍贵的资料。但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份文化遗产，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流散在英国、法国、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我国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刘复、王重民、向达、陈寅恪等，在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作出过不少贡献。但由于资料分散，而且缺少系统的整理，使用很不方便，留存在国外的资料，一般人更是难得窥见。以往，虽然海内外都先后发表过一些敦煌遗书的影印件，但为数有限，而且比较零散。台湾出版界出版《敦煌宝藏》，三百五十册。但《敦煌宝藏》是将各地所藏敦煌

文书的缩微胶卷，按号次影印，没有就其内容加以分类，也没有释文，故读者查阅时，仍感不便。考虑到以上情况，编者查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图书馆及有关单位所藏的敦煌文书缩微胶卷，从中选出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献资料，加以分类影印，兼附释文，题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供学术界和需查阅敦煌资料的读者参阅。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五卷　（唐）杜牧原撰，宋元间佚名注。注者为南宋元初间人，刻于明正统五年（1441）朝鲜全罗道。此书鲜为人知。书中注文引用大量今已失佚的古籍，如引已佚《翰府名谈》一千多字，详细叙述杨贵妃之死，从未见人引用过。《樊川文集夹注》存世只有三部，而以辽宁图书馆所藏的最为完整。今据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影印。本书卷首有韩锡铎前言。

杜牧（803—852），唐代京兆万年人，字牧之，号樊川子。他的诗文集以“樊川”名之。现在传世的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收入他的全部诗文，《四部丛刊》收有此书；《樊川诗集》四卷，只收他的诗，即二十二卷本《樊川文集》的前四卷删去卷一的赋三篇；《杜樊川集》十七卷，只收文和赋而不收诗。唐末以来，杜牧的诗一直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为其诗作注。清代嘉庆时桐乡冯集梧为四卷本《樊川诗集》作注，对典故、词语、背景注释颇为详尽，为《四部备要》所收录。前有吴锡麒序，云：“（冯氏）尝以樊川一集前人未有发明，取铁群言，积牍盈尺，既藏功有日矣。”冯集梧认为他是第一个为杜牧的诗作注的人。其实前人是有注本的，不仅冯集梧不悉，今天知道的人也不多，前人的注本就是《樊川

文集夹注》。日本学者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卷六著录："《樊川文集夹注》零本二卷，明刊本，宝素堂藏，现存一、二卷，无序文及刊行岁月，编注名氏俱未详。每卷首题樊川文集卷几，下记夹注，次行署中书舍人杜牧，次行有目录。第一卷载赋三首，古诗二十八首，第二卷载律诗六十七首。各句下夹注颇详，卷末更附添注。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界长七寸四分，幅四寸八分，四周双边。此本板式陋劣，然仿佛存古本之体，或是朝鲜国人所刊欤?"清杨守敬在驻日本使馆任职时也见到此书，《日本访书志》卷十四记述如下："《樊川文集夹注》残本二卷，朝鲜刊本，存一、二卷。无序文及刊行岁月，亦不知注者为何人。审其字体纸质，确为朝鲜人刻版。……注颇详，瞻卷末又附添注。注中引北宋人诗话说部，又引《十道志》、《春秋后语》、《广志》等书甚多，知其得见原书，非从败鬻而出，当为南宋人也。自来著录家无道及者，岂即朝鲜人所撰欤？惜所存仅二卷，不得详证之耳。森立之《访古志》称为宝素堂旧藏，顾无小岛印记，当是偶未钤押耳。"对日本藏的残存二卷本《樊川文集夹注》，杨守敬记录的要比森立之记录的详尽许多，确认是朝鲜刻本，谈到了引书情况，认为注者是南宋时人。《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卷线装本）卷六著录有："《樊川文集夹注》四卷外集夹注一卷，唐杜牧撰，佚名注，朝鲜刻本，四册，邢揖（邢之襄）捐赠。"国家图书馆藏本确认该书全本为五卷，为朝鲜刻本，但没有说明版刻年代，当此书上无据。明正统五年朝鲜全罗道锦山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此书正集四卷外集一卷，卷数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同，特征与森立之、杨守敬记录的日本藏本同。该书卷末有"正统五

年六月全罗道锦山开刊”牌记一行。牌记后为郑坤跋，云：“小杜诗古称可法，而善本甚罕，世所有者字多鱼鲁，学者病之。今监司权公克和与经历李君蓄议之，符下知锦山郡事李君赖，令详校前本之讹谬而刊之。始于庚申三月，历数月而告成。公之嘉惠学者其可量哉。前通政大夫成均大司成知制教郑坤跋。”跋后为权克和、蓄、赖等六人署名。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完整无缺，具有明确的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点，推之当与日本藏本、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同版。

《樊川文集夹注》只收杜牧的诗和赋，即二十二卷本《樊川文集》的前四卷和外集一卷。在注文中经常用引文来为诗赋作注，如卷一《感怀诗》“如何七十年”句下注云：“见本集罪言。”按《樊川文集》卷五《罪言》篇有“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七十余年矣”之句。可见是以《樊川文集》为底本进行注释的，也许是想将全书皆注释，但只注释了诗的部分，故仍以“文集”名之。所谓夹注，即是指古籍注释常用的双行小注。每卷之末的“添注”，是对该卷中没有注释或注释不完备的字句予以补充注释。注文中引用之书，还有晚于杨守敬所列举者，如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等，故作注者当为南宋中期以后人，至于是谁，书上没有署名，亦无序跋言及，出自中国人之手可能性更大些。

《樊川文集夹注》是有其突出价值的。

第一，《樊川文集夹注》是国内现存杜牧集子的最早刻本。《樊川文集》较早的版本有四个，皆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其不同在于有无刻工和刻工姓名的不同，盖互相翻刻所致，《四部丛刊》本即是据其中之一影印的，审其字体风格，

最早者也只不过刻于正德、嘉靖间。四卷本《樊川诗集》，最早刻本为正德十六年朱氏文房刻本。十七卷本《杜樊川集》编译于明末。而《樊川文集夹注》刻于正统，早于正德一个甲子有余。从文字上讲，《樊川文集夹注》的鲁鱼亥豕之讹亦不少，它并不是一个好本子，但时代早这一点，必然使它有长于其他诸本的地方，在校勘上有特殊的功用。仅以卷一试举几例：《杜秋娘诗》“拜貂七叶贵，何妨戎房支。……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四部丛刊》本“戎”字作“我”字，“尽”字作“盖”字；《李甘诗》“我死有处所，当庭掣诏书。”《四部丛刊》本、冯注本“掣”字作“裂”字；《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对酒不敢把，逢君还眼明，云鬟看人捧，波睑任他横。”《四部丛刊》本、冯注本“把”字作“起”字，“捧”字作“棒”字，“睑”字作“脸”字。

第二，《樊川文集夹注》是已知杜牧诗集最早的注本。就整体来说，冯集梧注本要比它略高一筹，但有些字句的注释，《樊川文集夹注》高于冯注，仍以卷一试举几例。《感怀诗》末二句：“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樊川文集夹注》：“《汉书》，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召为博士。是时匈奴强，侵过（应作边），天下初定，制定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淮北王皆为逆谋。谊数上书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云云，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冯注：“贾谊《新书》，幸臣之计，半岁之间休屠饭失其口矣，少假之间休屠系颈，以草膝行顿颡，请陛下之义。”

按，《樊川文集夹注》引文见《汉书·贾谊传》，冯注引文见《新书》卷四《势卑》篇。虽然两个引文的实质差不多，但《樊川文集夹注》的引文较为完整，更能准确表达杜牧写《感怀诗》的思想。

《杜秋娘诗》“武帐弄哑咿”句。《夹注》：“《汉书·汲黯传》‘上尝坐武帐’注，但成帐为武士象也。”冯注：“《汉书·霍光传》，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按冯注未注明“武帐”为何物，而《樊川文集夹注》则注释的很清楚。《杜秋娘诗》“四朝三十载”句，《樊川文集夹注》：“《唐书》帝纪，宪宗在位十五年，穆宗四年，敬宗二年，文宗十四年，共四朝三十五年。”冯注：“《旧唐书·郭子仪传》，杜云四朝。《尔雅》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按，《樊川文集夹注》将“四朝三十载”的含义解释的清晰明了，而冯注未解释实质。

第三，《樊川文集夹注》引用了许多现已失传的书。据不大准确的统计，《樊川文集夹注》引书达二百余种、篇，其中许多书现已失传，如《十道志》、《春秋后语》、《遁甲开山图》、《五经通义》、《三辅决录》、《魏略》、《晋阳秋》等。其中有些书清代虽有辑本，但已远非原书之旧。《樊川文集夹注》历来流传甚稀，清人的辑佚都没有用过，因此可为古籍辑佚提供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卷二《华清宫三十韵》“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句下，注文引用了《翰府名谈》中《玄宗遗录》的一千余字，这段资料是他书所未见的，因文字较长不作引述，读者自可从书中查到。这段资料的内容是记述因安史之乱，玄宗出逃，至马嵬发生兵变，杨贵妃被缢而死的。关于杨

贵妃之死，人们是很关心的，有很多文献记载，甚至有的说她没死去了日本。所有已知的这些记载，都缺乏细节，而这段资料细节较为详细，如玄宗赐她死，她据理辩驳；死前用毛巾蒙脸痛哭，第一次被缢未死，又缢第二次等。《翰府名谈》二十五卷，宋代刘斧撰，今天全书已经亡佚，只在南宋曾编辑的《类说》中保存十二条及现存《永乐大典》中保存一条，都没有上面这条。《玄宗遗录》不见著录，可能是唐代陆贽撰的《玄宗编遗录》，此书不见于新旧《唐书》的《艺文志》和《经籍志》，而见于《宋史·艺文志》的传记类，著录为二卷。如果真是《玄宗编遗录》，这段资料的可信程度是很大的，遗憾的是《玄宗编遗录》也已亡佚了。

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零八卷　（南宋）李焘撰。这是一部反映北宋历史的基本史籍，其书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以编年之体，记述宋太祖至英宗五朝一百零八年事迹。惟焘不敢自比于《通鉴》，故称《长编》。影印本以辽宁图书馆藏宋刻本为底本，用陈垣先生收藏励耘书屋旧藏嘉禾堂、抄本补配。影印本卷前有陈智超前言。

李焘（1115—1184），南宋史学家。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初任川中地方官员多年，孝宗乾道三年（1167）任兵部员外郎。以后历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礼部侍郎等内外官员，以主持修史最为长久。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未几病卒。为南宋大史学家，博极群书，尤其熟悉当代典故。除《续资治通鉴长编》外，另著有《历代宰相年表》、《五代将帅年表》、《易学》、《春秋学》、《六朝通鉴博议》等数百卷。

此书材料多取政府档案、实录、杂史、文集等，编撰前后历时四十余年，史料相当丰富。其进书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据赵希弁《读书附志》言，《长编》卷帙达九百四十六卷，其中各朝分卷如下：太祖至英宗五朝，一百七十五卷；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三

卷。正因为卷帙如此庞大，故难于传写，当世诸本已有详略不同，神、哲、徽、钦四朝之书只由秘书省缮写一部，未经镂版，故自元以来世鲜传本。至清代，传抄本只一百零八卷，至英宗止。今本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浙江书局刻本，卷数虽已五百二十，然仍有残缺。英宗、神宗两朝有缺，徽、钦两朝全无。现在通行的《长编》版本是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浙江书局本。中华点校本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浙江书局本源自《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本系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

五朝本宋板《长编》的影印出版，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陷。现存的宋版《长编》都是五朝本（自太祖至英宗），海内外总共只有三部。一部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题《续资治通鉴长编撮要》，原本一百零八卷，宋刻不足五十卷，缺者用清抄本补配；一部原为陆心源皕宋楼所藏，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书名同国家图书馆藏本，宋刻存五十一卷，其余抄配。第三部就是现在影印出版的辽宁省图书馆藏本，题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原本一百零八卷，篇幅多者卷再分子卷，以子卷计则为一百七十五卷。仅缺七十五、七十六两卷以及八十、八十二两卷的各一页，是现存宋版《长编》中最完整的一部。宋刻五朝本的来源，因为没有其他文字记载，推断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它就是乾道四年上进的五朝本。因为宋刻本卷首有李焘于乾道四年四月上孝宗的《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该年所上的正是一百零八卷的五朝本。至于这个本子内容（条数）与通行的七朝本的差别，可能是因为淳熙十年李焘上定本时，曾将全部九朝记事增加了一些新条文。第二种可能，它是乾道

四年上的五朝本的书坊所刻节本。赵希弁在著录《长编》时，说过他家藏的蜀本较书坊所刻者为详。书坊刻大部头的书，为了省工省料，删节内容是常有的事。诚信者在书名下加“撮要”两字，取巧者则不写。根据这部宋版《长编》的装帧、印记以及文献记载，可知它的来历。先是徐乾学从泰兴季振宜处购得，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献于朝廷，此后藏于清宫。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中盗出宋版书二百余种，先带至天津，后又带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长编》即其中的一部。1946年为东北民主联军接收，移交辽宁图书馆前身的东北图书馆，先后转移至佳木斯、哈尔滨，最后由辽宁图书馆入藏。

五朝本影印价值：

第一，它保留了原书的格式。《长编》以帝分纪。除英宗纪外，每一帝纪的首卷全载该帝庙号、谥号，如太祖启运立极英武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次卷以后，只书庙号，如仁宗皇帝纪十六。英宗纪首卷无谥号。文中凡涉及北宋诸帝，如帝、上、太祖等，都空一格。这些格式，从收入《永乐大典》以后，全被取消了，只有“太宗纪 一”，因为太宗即位后一反常规，逾年就改元，所以这个标题仍保留在卷中。由此也可以证明原书以帝分纪。

第二，它保留了原书前五朝的分卷情况。《长编》前一朝记事在乾道四年上进的时候，按年分卷，计一百零八卷，内容多者再分子卷，共一百七十五子卷。淳熙十年上全书定本，不按年分卷，九朝一百六十八年计分九百八十卷，每年平均五点八卷。但《长编》详近略远，到后来记事越详，据赵希弁著录他所藏的《长编》，太祖至英宗五朝共一百七十五卷，与五朝

本《长编》的子卷数相同。这不是巧合，说明定本《长编》前五朝的分卷和五朝本的子卷完全一样。

第三，它保留了辽、西夏的人、地、官名的原译名。

第四，在内容及文字上，它保留了未经清人窜改前的原貌。现存的九卷《永乐大典》所录《长编》，可作为宋刻五朝本的补充。

第五，它保留了宋刻的原貌，有文物及版本两方面的价值。

容斋五笔类钞

容斋五笔类钞五十四卷　又名《**容斋五笔合编**》，　（宋）洪迈撰，（清）黄本骥等编于清道光、咸丰年间，仅存写本，从未刊刻，现藏湖北省图书馆。影印本卷首有王梦华、阳海清、刘烈学共撰前言。

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自幼过目成诵，博极群书，于经史百家、医卜星算莫不深究，每有所得，随笔记之。中词科。以十八年之功，撰成《容斋随笔》七十四卷，颇得孝宗赏识。遂乐此不疲，相继撰成《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合称《容斋五笔》，历时四十年而撰成。前四笔皆有自叙。惟《五笔》未克告竣而殁，仅成十卷。全书共收各类札记一千二百一十六则，各则自有标题。“其书自经史典故、诸子百家之言，以及诗词文翰医卜星历之类，无不纪载，而多所辨证。昔人尝称其考据精确，议论高简，如执权度，而称量万物不累黍，欧曾之徒所不及也。”其书内容甚富，包括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历史掌故、人物评介等等，极受历代学者重视。问世之后，代有刊刻，至今犹具生命力。《四库全书》收入杂家类杂考之属，并被视为“动成巨帙，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的代表作。八百年来，它以其考据翔实、辨证精确，成为历代士人案头必备之籍。

黄本骥，字仲良，号虎痴，湖南宁乡人，道光元年中举，官黔阳教谕，平生好编修古籍，有《圣域述闻》、《历代职官表》、《皇朝经籍志》、《山甜雪》等著述二十五种。关于本书之纂辑初衷及经过，在咸丰元年洪庆华所撰《容斋五笔合编序》中言之甚详。道光庚戌，本骥造访洪迈族裔孙洪庆华，时庆华"知沅陵县权凤凰厅同知"。二人"纵谈今古，辄至夜分"。庆华"意欲儿辈稍扩见闻，不使童稚性灵汩于科举俗学"。本骥以为"积书万卷，遍读甚难；读而无贯通之术，虽多无益"。"昔文敏公迈，为南宋硕儒，所著《容斋随笔》"，"论无巨细，无一不从经史中外内酝酿而来"，"即以是编永为家学可也"。庆华虑及此书"寻检为难"，遂委本骥"代为诠次"。但由于是笔记体裁，寻检不易。为此，编者将其分为经学、史学、政典、书籍、艺文、考据六大类，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重加编辑。从而使五笔所载二千余条"如钱在贯，如珠就绳"，极便查检。编者在编校过程中，还对原书作了三万余字的增订补注。于此本骥以清乾隆甲寅扫叶山房翻明崇祯马元调本为蓝本，越年完成斯役。

稿既纂就，却并未付梓，仅存写本。迨至同治九年(1870)，长沙彭舒英对写本再作雠校，删去若干冗文，调整编排次序，整理大量注释，使之更臻完善。并将书名《容斋五笔合编》易为《容斋五笔类钞》，将各卷端第三行所题"慈溪族裔［洪］庆华同编"换以"长沙后学彭舒英校字"。关于彭氏之生平事迹，以及此次整理何以由其充任，有无洪、黄二氏参与均已无据可稽。由同治辛未（十年）佚名所撰序可以窥知，彭氏本有刊刻之意，未知何故未果。后此稿经过辗转流传，归

诸湖北省图书馆庋藏。

纵观全书，黄、彭二氏所作之贡献：

一、部居类归。洪迈原书内容淹博，撰写时间跨度很长，五《笔》各自成书。虽不能说各《笔》漫无统纪，然就全书观之，则毕竟条目逾千，卷帙浩繁，学者不易寻检。此《类钞》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仿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例，根据全书内容，分成经学、史学、政典、书籍、艺文、考据六个大类，各类之下又分别细分为易、书、诗、春秋三传、礼记、周礼、五经总义、论语、孟子、尔雅、小学（以上“经学”）；史法、论史事、论时事、历朝故事（以上“史学”）；学校、科举、职官、庶政、刑狱（以上“政典”）；藏书、国语、战国策、大戴礼、汲冢周书、子书、兵书、佛书、通鉴、国史、注书（以上“书籍”）；诗、文、四六（对句附）、书启、志铭、碑记、词赋（以上“艺文”）；地理、宫室、时令、风俗、方言、姓氏、名字、讳谥、器用、物产、技术、蛮夷、杂考、订讹（以上考据）等52个子目，末为“附录”，将全书条分缕析，依照一定次序，缀于相应类目之下，编为五十四卷。从而“使随笔为合笔，变五笔为一笔”，让“五笔所载千有二百余条如钱在贯，如珠就绳，遇有遗忘，一检即得”（洪庆华序语）。其置类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毕竟使全书有所统序，诚可为初学善本。

二、释疑疏滞。原书成于南宋，所记多为历代典故，于宋代典章制度记述尤详。时经数百年，物换星移，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事物后人未必都能理解，这就需作必要的疏通。本书编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缀于各则正文之末的按注多达四百零一条，三万七千字以上，即对全书三分之一的条目作了释疑

疏滞。所作按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短仅数字，长逾千言。许多按注，均为旁征博引，彼此参证，既是正文之注释，亦是正文之延伸，利于读者掌握所述对象的更多信息。尤为可贵者，还能坦陈对原书的批评意见，如卷一“孔安国古文尚书”条后注：“《四笔》云书序出于史官，《金篇》以为周公作，疑是非是。此条引伊尹相汤伐桀，武王胜殷杀受，直以书序为孔子作，何自相矛盾乃尔!”此类注释文字无疑有助于读者阅读。

这些注释究系何人所为，尚难完全论定。从卷端署名及佚名序有“虎痴……间附己意于后”观之，当系本骥所撰。从其注释文字与正文笔迹迥异且全以另纸粘贴审视，又似为舒英所作。或许本骥写有初稿，舒英作了增删整理，亦未可知。

三、正误补阙。此书以翻马元调本为蓝本，马氏重刻序云已改正千余字，编纂者对此颇有訾议。其“凡例”称：“间有误字，安知非马氏妄改？其中有可议者仍之，灼知其误者改之，亦有管窥未及者，尚祈博雅是正，以成完书。”此乃朴学遗风，自是完全正确。抽与刻本对比，所正之字亦数以百计，且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如卷四“曲礼记童子事”条第四行“今卢陵石刻由存”，“由”改“犹”；卷五“景污子晁以道”条第二十九行“于夏至而束方角亢七宿”，“束”改“东”，等等。若发现有错字而又无法改正者，则在注释中言明，如卷二十四“太平天国五年”条注云：“此条内有误字数处，无可质正。”至于补阙，则主要在名、讳方面：讳者还原本字，以△号别之；对仅称字号、官谥、封号之当代名人，其可考者补书其名，以便查考。

四、删繁汰芜。凡原书文字过于冗长者，此本在不损害原意的前提下，适当作了删节，使之更为严谨。如卷七“孟子书濯庾公一段”条（刻本原题“庾公之斯”），删去前边二百五十二字。似此情况虽不多见，但采撷颇称精当。五《笔》之中亦间有内容重复之篇什，遇此则不重录，径在按注文字说明之。

有此四端，我们便可以说此书之纂辑不无意义，黄、彭二氏堪称容斋功臣。但本书亦有其不足之处：一是刻本各则自有标题而此本弃之，不如刻本醒目；二是抽校刻本，发现有个别脱字；三是“目录”及部分注释写于废稿反面，不甚清晰。

自彭舒英于清同治九年整理定稿，至今已有 127 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编纂者调整次序接贴稿纸用的浆糊已经失效，致使叶次出现混乱，部分粘签脱落。影印前对乾隆扫叶山房刻本逐条作了核查，使各则首尾完整，叶次彻底理顺，基本恢复原稿旧观。惟因彭氏所作调整量较大，修复后，少量版心叶码或有重、阙，但文字已相衔接，并无阙漏。又原稿注释文字多以用过之稿纸翻面誊写，复印时反面的字透现过来，现已作了技术处理。

《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

《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　（明）罗贯中原著，陈翔华主编。此书选取海内外所藏具有重要价值的罕见珍本共五种，辑成《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其中明双峰堂《批评三国志传》，聚合日、英、德三国五处藏品为一帙；文光堂原刊《京本三国英雄志传》、国家图书馆藏《汤学士校正古本通俗三国志传》、美国藏《朱鼎臣辑本三国志传》，都是各具特色的稀见之版本。这些既可以作为阅览《三国志演义》的读本，又是研究古代小说以及俗字与插图美术史的珍贵史料。各书卷首有中外专家所撰前言：陈翔华《略论余象山与其批评三国志传》、周兆新《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略说》、陈翔华《刘龙田及其乔山堂本三国志传记略》、金文京《朱鼎臣辑本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岑桦《六卷本三国志简记》。

罗贯中（约1330—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生平事迹记载很少。他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其代表作。

《三国志演义》在明代刻本已甚多，现在保存在国内外的刻本不下于三十多种。一些版本不仅人物、故事及文字各有差

异，而且往往有误。现代学者通常认为，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这部小说的最早刻本，但是，这个本子也有许多修改。同后来有些刻本如《三国志传》相比较，甚至某些方面改动得还要多些。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三国志传》虽晚刻，而其祖本却比嘉靖元年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更接近于罗贯中原著。这种看法颇能言之成理，但有待深入研究各种明刻本及其关系，以作进一步的论证。

其中《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二十卷，为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存世孤本，《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二十卷，为日本天理馆珍藏善本（所缺卷七至卷十七，用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笈邮斋据乔山堂原版重印本配补），《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二十卷，为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这些明刻本都是不易获得的重要版本。尤其难能珍贵的是《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此书刻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是存世的第四个明刻本，国内早已荡然无存。其残卷，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第七、八两卷，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第十一、十二两卷，伦敦博物院藏第十九、二十两卷，德国斯图加特市符腾堡州立图书馆藏第九、十两卷。日本藏残卷鲜为人知。于是请日本友人辗转委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胜村哲也先生洽商，获得建仁寺住持伊藤东慎先生的大力支持与协助，终于将所残存的十卷拍摄返归祖国，以与英国、德国诸处残卷配补而成十四卷影印出版。将存世的余氏双峰堂刻本残卷搜求影印出来，不仅最大限度地保存余氏刻本原始面目，亦实为学术界之一大快事。

首辑五种，与通常所见的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颇有异同，对于探索罗贯中原著的本来面目有很

[illegible]

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分卷与段（节）目上的不同。除《六卷本三国志》外，其余都为二十卷，而嘉靖元年序刊本则为二十四卷。段（节）目也不一，例如《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有“白门楼斩吕布”、“刘玄德走荆州”等六言句式，“刘玄德跃马跳檀溪”、“献荆州王粲说刘琮”等八言句式，“袁术分兵七路下徐州”等九言句式，“曹操谋杀董卓不就私奔”等十言句式，“玄德三顾茅庐先知三分天下”等十二言句式以及七言句式；其他四种虽不尽如此，但段目句式亦多作五、六、七、八言不等。而嘉靖元年序刊本则俱作七言句式，完全划一，显然是经过后来加工整理的。

二、故事情节与细节描写上颇多差异。嘉靖元年序刊本只字不写关索其人其事，而《双峰堂批评三国志传》、《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却以“关索荆州认父”使之成为小说中智勇双全的活跃人物。有的明刊本则写至关索镇云南事二十多处。其实关索故事在宋元间早已广为流传，罗贯中写之入书，当是不足为奇的。陈翔华先生还在《双峰堂批评三国志传》与《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两书影印本的前言中，例举其细节描写上与嘉靖元年序刊本有许多不同之处。

三、文字上有不少差异。《丛刊》首辑所收五种尽管也有许多加工与讹夺，但是在某些人称、地名、名物以及其他语词等方面所存在的异同，不仅可以匡正嘉靖元年序刊本许多谬误，而且还较多地保存了罗贯中原著的真实面目，有待我们去研究与探讨。例如嘉靖元年序刊本写张松诡称《孟德新书》乃战国时无名氏作，曹操闻之，“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下有小字

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书"字是嘉靖元年序刊本改易的。查双峰堂等本此处作曹操"遂命破板烧之"，乔山堂本、朱鼎臣辑本俱作"操令破板焚之"，证明这些《三国志传》出版"旧本"，即源于未被嘉靖元年序刊本擅改的更早版本（参见周兆新《旧本三国演义考》）。这些对于探索罗贯中原著的版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皇明资治通纪三种

皇明资治通纪三种二十九卷　（明）陈建、卜大有、卜世昌编纂。《皇明资治通纪》十四卷，陈建辑，逐年按月记事，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起义，至明正德十六年（1521）止。此书入清遭全毁之禁，今流传稀少。《皇明续纪》三卷，（明）卜大有纂述，续至隆庆六年（1572）。此书《四库全书》入存目。《皇明通纪述遗》十二卷，卜世昌补续。据拾稗史之言，按年逐月编排元至正十一年至明隆庆六年间有关史料。将三书合并为《皇明资治通纪三种》。现存湖北省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石洪运等前言。

《皇明资治通纪》十四卷，陈建辑、卜世昌校正。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亦号清澜钓叟。广东东莞县人。自幼笃于学，年二十三补邑弟子员。明嘉靖七年戊子（1528）领乡荐。两上春闱，皆中乙榜。三十六岁选授福建侯官教谕，后迁临江府教授。陈建不汲于仕进，闻有引荐，则力辞之。循资升阳信令，至则以教养为急，劝课农桑，申明条约，不事蒲鞭，不半载而邑大治。四十八岁，以母老乞养，邑民攀留；力请，乃得告归。性缜密，博闻强记，究心学术，致仕后益锐志著述。母卒后，遂隐不出。有《皇明资治通纪》十四卷、《治安要义》六卷及《古今至鉴》、《经世宏词》、《明朝

捷录》、《陈氏文献录》等。

陈建学识温醇，议论纯正，崇正黜邪。粤地原有新会之学、增城之学，而至陈建书出，世称之东莞学。其为时所推重如此。初，陈建始著《皇明启运录》八卷，香山黄佐见之，竭力鼓励其纂辑明史长编。于是，陈建裒辑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徐寿辉领导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以来迄明正德十六年间史事，为《皇明资治通纪》十四卷。此书前原有陈建序，自谓考据群籍，直书垂鉴，不敢虚美隐恶。当时学者也极力推崇此书。如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湖北黄梅人瞿九思曾譬称国家聋瞽，自此则有目有耳。时人多以荀氏《汉纪》、李氏《续资治通鉴长编》例之，并谓应当与正史并行。

《皇明续纪》三卷，卜大有撰，卜六典、卜世昌校正。大有字谦夫，浙江秀水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知无锡县，剔蠹搜奸，执法不挠，中时忌，严明益著。入为南京工部主事，历礼部精膳司郎中，以忤时宰，出知寻甸州事。《明史·艺文志》载其著有《经学要义》五卷、《史学要义》四卷。另据《秀水县志》，还有《监泉诗稿》。

《皇明续纪》乃仿陈建《通纪》之例，续以嘉靖元年（1522）至隆庆六年（1572）共五十一年史事。卷上题“秀水卜大有纂述，卜六典校正”；卷中题“秀水卜世昌校正”；卷下题“秀水卜大有编辑，卜世昌校正”。这与后面的《皇明通纪述遗》一样，盖二三人合作纂述，而仿《新唐书》各署姓名之例。

《皇明通纪述遗》十二卷，明卜世昌、屠衡校订。屠衡，秀水人，生平不详。此书卷一、二、四、五、八至十、十二凡八卷，题“秀水卜世昌校订”；卷三、六、七、十一凡四卷，

题“秀水屠衡校订”。盖二人合作，分工纂述，各署其名。王重民先生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此书明万历间刻本（十行二十一字），其书衣上刻卜世昌识语八行，称“间与同志屠生辈，参质疑信，积久成帙，付之剞劂”（今据以影印之本，亦十行二十一字，疑即此本。因前有缺叶且书皮已换，卜氏识语，已不得见）。可证此说不诬。《四库总目提要》收录“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其“提要”称该本前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冯梦祯为起讫，编年记事。《四库总目提要》对此书多有非议，谓其“多捃拾稗史之言，冗杂特甚。如首卷多载元顺帝荒淫琐事，与明无关，殊失断限之义。又如以成祖征漠北时，太监沐敬进谏之事窜入建文四年之末，则记载之无法，可以概见矣”。然此书多补陈建《通纪》、卜大有《续纪》之遗缺，可资参阅。

由于陈建《通纪》风行于海内，影响之及，便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编纂补续明代史乘的风气，则成为“晚明野史，不下千家”的先导。其间有自作一书者，如薛应旂《宪章录》、高岱《鸿猷录》、郑晓《吾学编》、朱国桢《皇明史概》、涂山《明政统宗》之类，皆明代的编年史。至于折衷《通纪》，删芜纳新，订核续补者，则不可悉举，如卜大有《皇明续纪》。又，沈国元将《通纪》、《续纪》汇录并补葺万历朝事，纂《皇明从信录》；另辑泰昌、天启两代，成《两朝从信录》。秀水卜世昌《皇明通纪述遗》，多补陈建之未备。陈龙可《皇明十六朝广汇记》，又补嘉靖至天启间时事，而于辽事所言尤详。另陈仁锡《皇明实纪》，亦效陈氏之法而稍事增益；张嘉和《通纪直解》则分类补注《通纪》之书。此外还有钟惺的《通纪集略》，孙纡原订、马晋允增订的《皇明通纪辑要》等。陈建《通纪》以

个人之力，搜辑固尚全备，加之后人踵事增繁，致其体例益杂，遂招人贳议。至明隆庆间，有焚毁《通纪》之事。据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著述，焚《通纪》条云“《皇明资治通纪》，嘉靖间广东东莞县人陈建所纂，载国初以至正德事迹，皆采掇野史及四方传闻，往往失实。至隆庆间，给事中李贵和上言：‘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拟，已犯自用自专之罪，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乃以一人闻见，迷惑众听，臧否时贤，若不禁绝，为国之害非浅，乞下礼部追焚原版，仍谕史馆勿得采用。’上从之。”虽然明朝当局饬令焚毁，但是此书在海内传诵，依然如故。甚至重梓行世，其刻印精工，有的还数倍于前。

陈建《通纪》流传既广，又屡有踵事增补，故其书名卷数多有差异。《明史·艺文志》载为“皇明通纪二十七卷续通纪十卷”。今存最早的两个明嘉靖刻本，分别题“皇明资治通鉴前编八卷后编三十四卷”，“前编”题为“启运录”；“后编”始于洪武三十一年，迄正德十六年；永乐以前，又题为“革朝靖难纪”。其他明刻本，除书名冠词不同外，卷数分别有十、十二、十四等。此次据湖北省图书馆所藏进行影印的明万历刻本，名为十四卷，而其实有十七卷（有“卷又三”、“卷又九”、“卷又十”）。至于他人批、评、订、补者，书名多有改变，卷数则有三十卷、四十五卷（前编二十七卷后编十八卷）、三卷、八卷、十二卷、十六卷、二十四卷、二十八卷、四十卷等，盖加工者随书析卷所致。

据现存《皇明资治通纪》及其订、补、增、续《通纪》之本，多单行于世，今据以影印的“明万历刻本”，系《通纪》、

《续纪》、《述遗》三者的汇印，从内容上，形成了以《通纪》、《续纪》为主，编年通纪明代隆庆六年前史事，以《述遗》为辅，补述二书史事之未备。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明代史乘。考三书的责任者，惟秀水卜世昌贯穿其间；据卜世昌纂《皇明通纪述遗》，记事截止隆庆六年；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的记载（此汇印本只有“明万历刻本”）和前引《述遗》书皮上卜世昌“积久成帙，付之剞劂”的识语，此汇印本的汇辑、刊刻，极有可能是卜世昌所为。

陈建创《通纪》为明代首部编年史，甫出即传播宇内，并被推为当朝典故权舆，足见其史学价值之所在。晚明虽遭禁毁，然于禁而不绝之中，却制作弥精，踵增其书者益众。明清鼎革，清初禁纲未张，其书仍行于天下。迨至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此书列于“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之首，罪名是“坊间野史，不足征信”。然其真意禁绝销毁者，乃记录神宗万历后史事中有“语多悖犯”者。但因《通纪》所载，未涉万历，故其欲禁者，实乃补续《通纪》之众作者也。故“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前十二种书中，就有六种续补订辑《通纪》之书。因其禁毁与文字狱相辅行，遂使《通纪》连带《续纪》、《述遗》，再无重刻之举，故现今传世者，悉为明代所刻印，多属珍稀善本。

纪录汇编

纪录汇编　（明）沈节甫辑录。沈节甫（1533—1601），明浙江乌程人（今湖州），字以安，号锦宇。嘉靖进士。此书汇编明嘉靖以前诸家记述共一百一十九种二百一十六卷。卷帙浩繁，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流传稀少，现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所收诸书，涉及明嘉靖以前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政治史：有朱元璋的御制《皇陵碑》、《纪梦》以及《皇朝本记》、《天潢玉牒》、《龙兴慈记》。记述朱棣的《北征录》、《后北征录》。记述祁镇的《正统临戎录》、《天顺日录》。记述朱厚璁的《圣驾南巡日录》等，均系“局中人道局中事”的第一手资料。军事方面有：《平胡录》、《北平录》、《平汉录》、《平吴录》、《平蜀记》、《平夏记》、《平蛮记》、《西征日录》等，其中如《云南机务钞黄》，系朱元璋对云南用兵的诏令，他书均未收录，更显珍贵。外交方面有：《平定交南录》、《防边纪事》、《挞虏纪事》、《清夷纪事》、《朝鲜纪事》等，尤其是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对周边地域的地理习俗有着真实详尽的纪录。

另外，该书还收录了记述天文、地理、人物、典制诸类史书，更有《志怪录》、《涉异志》、《奇闻类记》等著述，给人以新的视角。

世庙识余录

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　（明）徐学谟著，吴丰培整理。本书是明代史书名著，极为世间所推崇。现仅有明刊本，传本较少，研究明史者均渴望目睹。此书记载明嘉靖时佚事，并引录许多当时文献，不仅对了解嘉靖时期的史事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小说《金瓶梅》的研究也有参考作用。此书与《皇明肃皇外史》相辅为用，可以相得益彰。今据明刻本影印。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徐学谟（1523—1593），初名学诗，后更名。字叔明，一字子言，号太室山人，明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历湖广布政使，官至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岁。撰有《万历湖广总志》、《春明稿》、《徐氏海隅集》、《归有园稿》。

此书是徐学谟久任礼部郎中，练习典故，故将嘉靖一朝的重大事件择要记述，往往采用原折，加以辑要，始末具备。事件之后，每有评论，颇中时弊。对子嘉靖帝一身作为，在作者自序中虽说："肃皇帝在位四十一年，而时文谟武烈，咸秉睿裁，更革变通，超轶三王，于乎盛矣！"极加颂扬，而实际在书中对于嘉靖帝的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多有记叙。最初偶有批鳞之奏，尚能容忍，后来稍有异议，略违其旨，便获得谴，甚

至杀身。今日尚传旨褒奖，明日便下诏狱，喜怒无常，意向难测，“不喜臣下雷同”。凡有参奏之案，虽交科道群议，其实无不出自独断，或由奸佞之臣逢迎而定。议者偶有不合，便被罚降调，更有下诏狱杖讯，株连多人。文字之狱者，亦有多起，甚至考试文字，断章取义，便加治罪。又好刺探人之隐私，喜闻讦告，宰辅的任、罢、降、调，任其喜怒而行。

其次，记事详尽，楚王显榕，世子英耀，父子荒淫，竟至弑父，以及曾铁、夏言的冤死，张经、王予的被杀，严嵩父子的罢斥和显戮，无不备载，并评其是非，尤以多节用原折，如杨继盛的参劾严嵩、海瑞的上治安疏，以及朝鲜特派使臣力辩《大明会典》中记其太祖李成桂所载不实，及使臣金继辉致阁臣之文，措词典雅，意更婉转，乃用左国之体，于明代文字中亦属罕见。又记安南投降之表，亦多服罪之辞，均用原文，都属可贵资料。由于著者久任礼部郎官，得见原始资料，又得诸故老口述，记录详尽，是以说明他所得内幕情况，非一般史官所能得者，宜其详赡而可征信。故《四库全书提要》已称：“其练习典故，于《世宗实录》多所驳正。”列举数则，均有确据，作为明代史籍中之上乘，固非过誉。得于档案及耳闻目击，为其他史籍所无者，均能缕述，即使有小疵，仍不掩瑜，确实为可读之作。宜为研究明代嘉靖一朝不可缺少之书。

此书原有明活字本，卷首印有：“仅印百部。”故流传极少，足视为珍本。今取而整理，为之断句。又因板面模糊，为之修洁，字体不清，又有缺字误字、互倒者，达百余处，为之描清、补缺、正误、勾乙，凡他本缺或有疑者，未敢擅动。如杨继盛的《请罢马市疏》及《早诛奸阴巧佞贼臣疏》（即参劾

严嵩父子)，海瑞的《治安疏》，均用本人文集，加以校勘，改正误文，补足脱文多处，较诸原印略可增色。

宋元资治通鉴

宋元资治通鉴　（明）薛应旂撰。撰者采用《通鉴》体例，用了十余年时间，凡宋元名人文籍、家记、野史等，继《通鉴》五季，迄于元末，将四百八十年间史事汇成一百五十七卷，计三百余万字。补编了宋元两代之史事。《四库全书》列入编年体存目，存世仅有明刊本。今据私家藏明刻全书影印出版。本书卷首有吴丰培影印前言。

薛应旂，字仲常，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十四年进士，与江南王鏊、唐顺之齐名，由慈溪知县迁为南京考功郎中，二十四年主京察，为严嵩不容，谪建昌通判，历任浙江提学副使、陕西按察司副使等职。

此书明代传本传刊多次，虽《四库全书提要》曾指出许多舛误、不尽得当之处，而薛应旂自序中云："凡有关于身心性命之微，礼乐刑政之大，奸良邪正之辨，治乱安危之机，灾祥休咎之征，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皆直书备录，其义自见，君臣士庶，咸可鉴观，随其所居，各求尽分，匪直可以资治而已。"其记事翔实，论述公允，尚多可取，惟对元代八十余年的统治，视同夷狄，详于国内，而忽略太祖远征。明代记载元朝史实，大抵如是。此书亦不例外。书中陈锡仁评语，照载不遗。全书有句读，惟独缺陈锡仁序言，影印时补足，又将《四库全书提要》列在卷首。

皇明经济文录

皇明经济文录　（明）万表著，明嘉靖刊本。此书为清代禁书之一，故世少流传。明代编纂文录之作较多，但此书选录精当，传本极少，故目录学家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也未提及。著者根据《皇明名臣经济录》及《九边十三省录》等汇成此书，分为开国、保治、政府六部、省情况以及边防等三十一类。章节分明，记事翔实。原书现存苏州市图书馆。影印本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九沙山人，明定远鄞县（今属安徽）人。正德末武进士，累官都督同知佥事，提督漕运镇守淮安地方总兵官。以淮安总兵，武职人员，雅好文翰，精通经世之学。《明史》未列传，兹选《明史稿》中之传，列于卷首。表才兼文武，每与名臣唐顺之等讲学，御倭亦有功绩，号称儒将。撰有《灼艾集》八卷、《现鹿亭稿》八卷亦有传本，尤以《前后海寇议》著名，《四库全书》列人兵家存目，并云："倭乱大起，表用少林僧习格斗法，屡歼其众。盖本能以才略自显者，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见也。"万表曾提督漕运，其书中多选漕运之文，也是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材料。

书中选录，均取经世之篇，极为广泛。凡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边城设防、邻区概况，都有论及。编者自叙称此书："乃取黄

训所集《皇明名臣经济录》及其所辑《九边十三省录》，本人所辑《漕暇录》，加阮鹗所辑《文录》四种，并续采群集而成。”上述各书，除《皇明名臣经济录》尚有传本外，其他三种均属稀见，此书传世，更足珍贵。著者选录标准，据自序所定，约有数则：凡迂谋渊虑，忠言嘉猷，久而无弊者；达权处变，安危定乱，保扶社稷者；老成谋识，深达国体，曲当时宜，不愆旧章者；言由深衷，事专毗主，犯颜无讳者；论事必原始，详夫沿革之因，可备征考者；议论剀切，深究时弊，有所建明者；言悉民隐而处置或未一一尽当者，详于收录。而繁词泛论，不切机宜；或论呈琐屑，非关大体，无裨经济者，皆摒弃之。是其取材精审，重点则在有裨治理者。其类别则依黄训之旧章而有所增益。卷一至四为开国和治安，细目重要者有于廉之狱、王振之变、石亨之变、曹吉祥之变。凡朝政大事，均有专题论及。卷五至十六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事，户部则重点在财赋税收，兵部涉及军事、马政等，工部则论及治河建港。其下卷七至三十一为各行省，卷三十二至四十一为九边通考、蓟州、大同、三关、榆林、宁夏、甘肃、固原等。论云南述及交趾，记甘肃则论及西域，分类著录，便于检索。世以《皇明经世文编》所选资料最称丰富，而此书虽不及其卷帙浩繁，但所收秘籍叠备，选录有章，不失为有关经世之作。两书更可相互参用。

影印时原书目录中之错误保存原貌，仅将与正文内容异同处作如下处理：凡仅存篇目而缺佚本文者，在该目框下署“缺”字；凡存本文而缺篇目者，另编《皇明经济文录补目》附于原书目录之后。又为便于读者检索，特将影印本页次标于原书目录板框下方。

宪章录

宪章录四十六卷　（明）薛应旂撰，陆光宅跋。此书是明代编年史，记述自洪武建国至正德间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著者继其《宋元通鉴》之后，按年详载，编成此书，以追宗孔子“宪章文武”之意，故名为《宪章录》。成书后颇为时人所重，但流传不广。因其能博采杂书，可补其他明史载籍的不足，其价值实堪与《国榷》相比美。今选明代大字刻本影印。本书卷首有吴丰培前言。

应旂曾继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纂成《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成为编年史之巨著。他又将明代之史编成此书，自洪武开国，以迄正德，使一百五十余年的史事与前书有所赓续。应旂著作极富，就《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除本书及《宋元资治通鉴》外，尚有《皇明人物》七卷、《甲子会纪》五卷、《隐逸传》二卷、《高士传》四卷、《浙江通志》七十二卷、《考亭润源录》二十四卷，《苏子庸语》十二卷、《方山集》六十八卷、《方山诗说》八卷等。

《宪章录》一书，《四库全书》作四十七卷，因卷三十九分为上下故然，今依《千顷堂书目》仍作四十六卷，为明代编年史之名著。《宪章录》虽《四库全书》列入存目，提要讥其“采摭集书，颇失甄别”。如惠帝逊国，事本传疑，应旂乃于正

统五年十二月书思恩州土知州岑璞送建文帝入京，号为老佛。然其自叙云："或纪载于馆阁，或传报于邸舍。"以广取博采，说明此书的特点，详略有殊，亦史籍中所常有，细审书中，虽部分引自《实录》，而泛采轶闻，更接近于第一手资料。同一史事，与《明史》相较，倍觉真实。例如《明史·于谦传》云："谦性故刚……徐埕以叙南选，为谦所斥，至是改名有贞，稍稍进用，当切齿谦。"文字过简，述事不明。而此书卷二十六云："时缺祭酒，翰林徐有贞属意补之，因中官以达于上（景帝），上宣谦至文化，辟左右谕之曰：徐有贞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教坏了心术。谦无所封惟叩关谢过，及退，汗出浃背。有贞竟不知之，自是遂衔谦矣。"观此叙述，生动曲折，更表现了有贞的私心奸邪，景帝有自知之明。

再《明史·于谦传》又云："于谦疾作，景帝遣与安、舒良更番往视，或言宠谦太甚。与安曰：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而此书云："于谦以病告，帝遣太监与安、舒良更番来视……诸言宠用过重，与安曰：谦日夜与国家分忧，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寻一个来换于谦，恐未使得。"此太监二字，万不可省，否则难知与安为何许人。家产作家计，也很确当，而与安所云，近乎口语，则更感真挚。举此两例，也说明此书可为《明史》的辅功绩物。

明廷对于文字殊少禁忌，历代所编实录存于馆阁，文人学士可以进馆加以抄录，故列朝实录，存有明代抄本较多。同时依据实录而编纂本朝史籍者也有不少，今就《千顷堂书目》所

载史部各类，竟近二千种，地理部分又超过三千种，数量之多超越唐、宋。其中不免有抄袭之作，云称罕见的《皇明驭倭录》和《五边典则》亦大部分辑自实录。故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涉及禁忌者，概行全毁或抽毁，一般史籍列入存目，固封前朝乙部，有所偏见，而且有些质量不高，妄灾梨枣之作，则摒而不录，亦非无因。

明刻珍本《史学要义》

明刻珍本史学要义四卷　补一卷，共五卷。（明）卜大有辑。卷前有明徐栻作叙。明万历五年（1577）刻本。此后四百多年，未曾重刻。此书汇集了明代及其以前的史学名家文章二百六十余篇，内容涉及史学史的诸多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今仅存两部，现据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影印。影印本卷前有瞿林东前言。

卜大有，字谦夫，嘉兴府秀水县（今属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嘉靖丁未（1547）进士，初知无锡县（今属江苏无锡），执法不挠，称“强项令”。后调潜山县（在今安徽西南），莅政刚明，夙奸畏服；历南仪曹郎，以忤时宰，出为寻甸（在今云南中部偏东北）守，致仕。《明史》无传，其《艺文志一》诸经类著录“卜大有《经学要义》五卷”，《艺文志二》史钞类著录“卜大有《史学要义》四卷”。但《经学要义》已失传。

徐栻（1519—1581），字世寅，号凤竹，苏州府常熟县（今江苏常熟）人。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举进士，从宜春（在今江西西部）知县做起，曾先后巡抚江西、浙江，最后拜南京工部尚书，旋归里，里居二年而卒，终年六十三岁。徐栻先后为卜大有《经学要义》、《史学要义》作叙。

《史学要义》对史官的设置、史学家的评传、史书编纂体

例的得失等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述，有些篇章堪称古代史论的经典之作。所辑之文，上起西汉，下迄明代。诸文体例有疏、表、事状、书、论、序、跋、传记等。通观全书所辑之文，多是关于史家、史书的评论，或论得失、辨是非，或溯源流、探新途，都是关乎史学本身的认识，书中所辑之文，也有几篇是讨论历史问题的，如卷四之论东、西周，补卷中之论唐八司马、《通鉴纲目》之论正统等文，虽与“史学要义”之本意不尽吻合，但寥寥数篇，不影响全书的性质和面貌。

至于《史学要义》史料的价值，徐叙开篇就这样指出：“载籍博矣，而义有要焉；得其要义，则会通有机。是学史者，要义尚矣。嗟夫！事以代殊，文缘人异，纷纭述作，迷目眢心，自非博雅之士，恶足以与于斯。”这里讲的“博”与“义”的关系，本质上是知识与思想的关系；又讲到“要义”是“会通”的关键，表明作者重视会通并指出“要义”与“会通”的关系；还讲到只有“精明博雅之士”才有可能与之探。叙文里提到：“卜大夫究心史事，既得其旨趣，间尝采辑古今论著有切于史学者若干卷，题其端曰《史学要义》。予得而读之，见其陈叙事之义例，原载笔之职司，析编年、纪传之同异，以暨辨正杂，别良秽，罔弗备焉。乃叹曰：‘勤哉，大夫之志乎！精哉，大夫之取裁乎！’”其旨趣卓尔不群，取裁见识独到，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强调了“切于史学”实为本书采辑之主旨。这是对《史学要义》一书内涵、价值的肯定，也表明他对于辑者本人的称赞。

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辑者十分明确地把握了关于“史学”自身方面的问题，并把它概括为“要义”。古往今来，不

少治史者对于历史（或曰史事）与史学的区分不甚关注，这颇有碍于对史学理论的探讨。我们从书中所辑诸文可以看到，卜大有受到刘向、《隋书·经籍志》、《史通》、曾巩、郑樵、马端临等史家、史书的启发颇多。可以认为，《史学要义》大致上勾画出了上起西汉、下迄明代人们关于史学之认识的轨迹。如果说在此之前，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是以作者自己的评论来描绘唐初以前的这一轨迹的话，那么卜大有的《史学要义》则是以诸家所论来铺筑汉、明间的这一轨迹；二书的识见和影响自有高下之分，但其旨趣确有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要义》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

《史学要义》在文献上的价值也很突出。书中所辑之文，重要而常见者自不必论说，贵在辑者的视野开阔，采撷广泛，多有新的发掘。如宋人唐庚论《古史官不专注记》，王安国《后周书目录序》，张唐英《读史通》；明人陆深论《历代史官建置》、《论作史义例》、《作史法》，杨慎论《史通》等，多不甚为人们所关注。此类文章，占有一定分量。这对于从文献发掘方面推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史学要义》一书经历明、清几代再未刊行，且其流传未广，近代以来，鲜为人知。与有明一代，朝廷只修实录，不撰国史，大有联系。有的学人则因所修实录存在一些问题，便断言明代“无史”（郎英《七修类稿》卷十三“三无”条）。有的学人更进而认为：“有明一代，国史（按指实录——引者）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在一个诬妄之世界。”（张岱《石匮书自序》，见《琅嬛文集》卷一）像这样的批评，显

然是过分了，而其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从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明代史学确无可与《史记》、《汉书》、“三通”、《资治通鉴》相媲美的著作，但这并不是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朝代之史学成就的惟一标准。明代史学也确有不少可议之处。《史学要义》一书的影印出版，对促进关于明代史学的研究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辑者卜大有对《史学要义》的编排虽未作任何说明，但根据各卷所辑内容来看，大致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卷一是关于史学总的面貌和关于“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评论；卷二是关于《三国志》至《元史》历代正史的评论；卷三是关于《资治通鉴》及与之相关的多种历史撰述的评论并兼及对于《史通》等书的评论；卷四诸文涉及到的史书在内容上和体裁上广泛而驳杂，似乎是相对于“正史”以外的“杂史”。按照刘知几《史通》的分类方法，纪传体、编年体的皇朝史均为“正史”，其他体裁的史书大多归于“杂述”之下。卜大有于卷一收入刘知几论“史氏流别”、《隋书·经籍志二》的“正史”、“杂史”小序，于卷三收入评论刘知几和《史通》之文，或者包含了他关于本书的编次思想，即首先是综论，继之以“正史”，最后是“杂史”。

此书明刻本流传下来的极少，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仅见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两处收藏。但国家图书馆所藏有残缺，即缺：卷二之第四十五叶、补卷之第六十八至七十一叶，山东省图书馆珍藏的明万历刻本完整无缺。故影印本名之为《明刻珍本史学要义》。

《明刻珍本史学要义》卷首目录原共四卷，正文补卷之目

乃未另立，分别散入卷一至卷四各目之末，但补卷正文则另列一卷即为第五卷。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今据原书正文各篇顺序，影印时重新编排了一至五卷的总目录，并添加相对应的页码置于影印本之卷首。

在影印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出版者还作了以下处理。

一、原书有些篇目未列作者，如卷二之第二百六十八页《五代史》，卷五之第六百七十三页《三国志》等，目录及正文均不提及。其中有些篇章作者虽然可考，但今编目时仍不注明，以保留原书本来面目。

二、原书目录失收的篇章，如卷一之第五十页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卷二第二百七十四页《论五代史唐六臣传》等篇末列入卷目，现据正文俱补入新编目录。

三、原目录与正文不一致，今编总目时仍取原目录。如卷一之第八十九页原目篇名《司马谈司马迁》之出处署“史记司马迁自叙”，而正文署“司马迁自叙”；卷一之第一百二十三页原目篇名《班彪班固》之出处署“西汉书班固叙传”，而正文署“班固叙传”；卷二之第一百六十九页原目篇名《晋书》之出处署“欧阳修唐书艺文志”，而正文署“唐书艺文志”；卷二之第二百三十四页原目篇名《隋书》之出处署“郑樵通志略”而正文署“通志略”；卷二之第二百四十二页原目篇名《李大帅李延寿》之出处署为“北史·李延寿自序”，而正文之出处署“北史”。今编总目均用原目文字。

此外，又考虑到原本正文的实际情况，今编总目时酌情采取正文所题。如卷一之第四十四页与一百二十九页《史论》，原目录分为“上”、“中”、“下”，而正文仅分为二处，但没有

标示“上”、“中”和“下”合并一起也无标示，故今编总目时亦不再分“上”、“中”、“下”。又卷二之第二百五十一页原目篇名《旧唐书后序》，而正文篇名《旧唐书重镂后序》；卷二之第二百四十二页原目录篇名《李大师李延寿》，而正文篇名《李大师李延寿自序》；卷二之第二百七十三页原目篇名《论五代史》，而正文篇名《论五代史死节传死事传》；卷三之第三百零七页原目篇名《资治通鉴序》，而正文篇名《御制资治通鉴序》。总目均依正文编排。

四、原书目录篇名或作者、出处的题署失当或有误。如卷一之第五十二页篇名《答韩愈论史官书》，应作《与韩愈论史官书》；卷一之第七十七页《杂史》下署出处作《隋书·艺文志》，应作《隋书·经籍志》；卷一之第八十九页《司马谈司马迁》下署出处《司马迁自序》，应作《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之第一百二十三页《班固传》下署出处《西汉书班固叙传》，应作《汉书·叙传》；卷一之第一百四十八页《范晔传》，作者原署作“陈寿”，而作者应为“李延寿”；卷二之第一百六十二页《陈寿传》、第一百七十二页《习凿齿传》、第一百七十八页《干宝传》，作者原均署“唐太宗”，实误（因《晋书》曾被题为“御撰”而致误），应作“晋书”；卷二之第二百四十二页《李大师李延寿》下署为《北史·李延寿自序》，应作《北史·序传》。今编总目仍保留原书面貌。

皇明肃皇外史

皇明肃皇外史四十六卷　（明）范守己著，吴丰培整理。此书是记载明嘉靖一朝四十五年事，属编年体。《四库全书》列此书于史部编年类。此书成于万历十年（1582），乃当代人记本朝事，故史料翔实可靠。原有明抄本。此据清抄本断句影印出版。影印本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范守己，字介儒，河南洧川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明史》无传，只知他在万历三十三年任茶陵知州（见《明史·河渠志》），官至按察司佥事。《明史·历法志》云："万历三十八年钦天监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亏圆之候，职方郎范守己疏驳其误。"盖习历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立纲分目，颇见详备"。自序也说："视于眉睫，庶几不失百步"。引书据《千顷堂书目》云：一名《肃皇大谟》。此书成于万历壬午（十年），去嘉靖朝不远，益无讳忌，固胜于清初庄氏史案以后，士则噤若寒蝉，史尽歌颂之文，求得据事直书如此书者，殊不可得。此书又采耳闻目击之事，视后代修史，辗转抄录者不同，何况遗闻佚事，亦属史料难得的资料，如徐学谟的《世朝识馀录》，便多此类材料，可补纪传史籍的不足，若与此书同读，系一朝之事，自有相得益彰之趣。《提要》向对明代之作颇多微辞，评

论此书自不例外。书中于重要事件亦有论述，虽类似明臣论史的见解，仍存不少可取之处。

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提到“当时南京书坊刻节本，附雷礼《大政记》以行则其全也”。但以《大政记》与此本相较，文字有增、有删、有改、则所刻并非节本，而为修订本，馆臣盖未详校。今《大政记》已不可多得，而此书明抄本今仅见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今据傅增湘所藏，有双鉴珍藏图记，虽为傅抄，但字体工整，凡仪字均缺末笔，自是宣统时所抄。明人文字，颇不通俗，影印时加以断句。抄写也多有错误，明显的已加以改正，有怀疑的仍保持原貌。

四镇三关志

四镇三关志十卷二十册　（明）刘效祖等编纂，吴丰培整理。此书是一部极为难得的明代地理书。此书虽有万历刻本，但因清代列入抽毁之书，故流传极少，且多缺页。以明刊原版为底本，并以旧抄本补全，成为足本影印。是研究明代历史、地理、民族史必备之书，尤其对编纂河北省地方志，更有参考价值。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刘效祖（1522—1589），字仲修，号念庵，明山东滨州（今滨县西北）人。为明崇祯帝生母孝纯皇后之弟，后封新乐伯，改新乐侯。寓居京师，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卫辉司州，迁户部主事，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坐内计罢归，年六十八卒。他长于诗文，除此书外，尚著有《春秋窗稿》、《刘仲修诗文集》等书。

《四镇三关志》是明中叶后期地志名著之一，因以镇、关为主，故未列入地方志书之中。是研究河北、辽沈一带地理者必备之书。《清代禁毁书目》称此书第十卷夷部“语多诬谬，应请抽毁”，故传本较少。

本书自序称：“四镇：曰蓟也、曰昌也、曰保也、曰辽也。三关：曰居庸也、曰紫荆也、曰山海也。皆京兆左右辅地也，左右辅，内地也，非边也。”当时北方民族元代后裔分据蒙地，

与明王朝对抗。自正统帝出关游说，到了土木被掳后，民族矛盾更为紧张，随时南犯，疆宇不宁。至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又有兵临畿辅、京师戒严之事，虽不久退回草地，而朝廷震惊之余，纷调全国能将劲旅，布置于长城内外，分段驻兵，派总督领之，以资防卫。并采取多种措施，如修台筑堡、挖沟铲坡、植林清野、训练军士、增布骑兵、派兵化装深入敌后等。自曾铣复套之议被斥罢，竟至冤死后，论关镇防卫者只议以守，不敢言攻，故此书“制疏考”，均载防守之策，不及征讨之谋。

此书纂于万历二年（1574），成于四年（1576）。内分建置、形胜、军旅、粮饷、骑乘、经略、制疏、职官、才贤、夷部等十考。每考一卷，而“制疏考”卷积最多，竟有三百九十余页，三十余万字，占全书五分之二。每考中除总论外，又分蓟、昌、保、辽四镇，以次分辑各镇事实。其取材则以各镇方志为基础，而补以当时官书中之公牍事实，沿革溯自古代，以迄于明。自庚戌以后，记事尤为详备。

此书特点颇多。隆庆四年（1570），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刘应节及继任杨兆先后“摭谱牒、收遗事”，委诸熟习镇事之刘效祖。效祖用二年时间，除条收旧乘，增补诸司所籍记，又亲赴黄花镇、易水各地视察，增添目击材料，故内容丰富，类次明晰。军事布置、练兵办法，均详述及，可目军事之书。粮饷数量，实物折色，折合当时银两，均有准确计算，马市交易，亦有规定，均可供研究明代经济。辽镇制疏中，涉及建州初期史料，亦可取材。镇堡瞭台修建办法及经过，可资研究长城沿革。职官人物，可补明代传记所未备。卷首附绘舆图多幅，可知明代该地的概貌。甚至军中的服装及上下级的称谓，都有述及。

影印整理此书时，除加断句外，凡版面不清处，均加修整，缺字可补者描补，无法识读者概存原貌。缺页从其他书可补者，都有注明。

抄本筹边纂议

抄本筹边纂议八卷续集一卷　（明）郑文彬辑评。此书成于万历十八年（1590），刻于万历十九年（1591），有万历十八年作者自序及吴崇礼、杨元祥的序，赵光大跋。诸家书目多不记载。此本为清初抄本，半叶九行二十二字，当据刻本抄录，字迹工楷，墨香浓郁，颇为珍贵。现藏辽宁省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武亚民前言。

郑文彬，号三桥，祖籍山东，后寓居辽海三十余年，因以辽海人自称。万历年间，官至奉政大夫，山西潞安府同知，管理蒲州事，颇有政绩。万历十八年（1590），青海火落赤部借故南侵，犯洮、河二州（今甘肃境内），杀人掠物，守将李联芳、刘承嗣先后败亡，朝野震惊，乃派兵部尚书郑雒经略陕西及山西宣、大边务，乱始平息。作者对此触动颇深，既恨“虏寇”之凶顽，又叹边将之昏庸无能，于是取历代史书中有关讨伐“虏寇”之事，并参以己见，汇为一书，名曰《筹边纂议》，以此作为守边之良策。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蒙古族遂退居漠北，然其南侵之心未死，对明朝统治仍有极大威胁。因而明太祖屡派大军征讨，使其臣服。明成祖时，蒙古瓦喇部逐渐强大，时常侵扰。成祖遂迁都北京，并多次率军亲征，最终卒于征战途

中。虽未能彻底征服瓦喇诸部，而瓦喇亦不敢大举侵犯。正统以后，奸臣当权，朝政腐败，边防松弛，瓦喇趁机扩张，吞并其他各部。至也先时，更是野心勃勃，挟元室后裔以自恃，自封为太师，藉人贡为由，大举南侵。正统十四年（1449）于土木堡一役，俘获明朝英宗皇帝而归。明朝自嘉靖以后，国势日衰，不得已而开马市，许互易，边事遂一发不可收拾。作者在书中对明朝北方的边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区分利弊，指出明初朝廷恩威并施，蒙古各部疲于自顾，多有归附。正统以后，朝廷恩有余而威不足，以至贻下大患。当今之计应施之以威而后安抚之。作者积极主战的思想在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书中所辑录的历代事例，均是征讨之例，如汉破匈奴，唐击突厥，宋拒契丹和女真等。而所辑录的明代有关边事的议论，也都是切实可行的有用之言，如杨博、王崇古、郑雒等人对于边事的筹划，书中给予详细的记录。作者希望以此来激励将士，鼓舞军心。

作者久居边塞，留心边事，笔而录之，图而志之。详细记载了北方各部族的宗派源流，并绘以《九边图》，注明其聚居的地点。“九边”是明代在北方边塞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的总称，它们分布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一线，包括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太原、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重镇，是明代防御北方各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这一屏障的依托就是万里长城。对此，作者在书中还专门写有《城塞》篇，论述分析了长城在古今各历史时期对于防御北方各民族南下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研究明代的民族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　（明）李清撰。这是一部史学名著，被誉为古代三大奇书之一，《四库全书》编纂时，原定收录，并撰了提要，后因著者的另一部著作《诸史同异录》有违碍朝廷辞句，故被株连销毁。向无刻本，只有几部抄本传世。著者李清，博学多才，认为《南北史》中“牴牾冗杂”，因而会通诸史，博采群书，加以注释。所引之书不少已是失传之作，尤显珍贵。现用最完整抄本影印，浙江省图书馆藏。卷前有吴丰培先生影印前言。

李清（1602—1682），字心水，别号映碧。明末清初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大学士春芳五世孙、礼部尚书思诚之孙，少而颖慧，崇祯四年进士，由宁波推官擢刑部给事中。熊文灿抚张献忠，先生论其失策。以久旱请宽刑，忤旨，贬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夏归。起吏科给事中，入朝疏言：治道在固民心，不报。崇祯十六年（1643）遣策封新昌王。

《越缦堂日记》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四库全书馆所刻销毁抽毁书目，尚不及映碧诸书，故是年七月所进简明目录史部别史类收《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卷数有误），载记类收《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至提要告成，则削去两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禁令早颁，故并其名氏见于他家

集者，亦抽毁之耳。”王重民著《李清著述考》亦云：“按映碧先生不幸于明之季，国事已不可为，原大声疾呼，侃侃建白，及沧桑之后，息影林泉，潜心著述。”李清诸作所以被禁，不仅因“比疑不伦”，而是清初文字禁锢，稍一不慎，祸便及身。对于前代史论，尚且如此，更何况论本朝。清代史籍缺乏，清又隐居不仕，屡荐不出，为清帝所不满。所以乾隆帝谕旨云其本身“幸逃显戮”，则其著作被禁，势所必然。但被禁之书，往往反被抬高了身价，更为后人所渴求，得之视为珍品。

他的著作极多，除上述被禁几种外，《李清著述考》尚记有十几种之多，有《明史杂著》（见《国粹学报》），《南渡录》(有抄本)、《外史摘奇》、《甲乙编年录》、《惠宗实录》、《忍宗实录》、《袁督师斩毛文龙始末》（荆驼逸史本）、《自叙年谱》、《史略正误》、《诸忠纪略》、《女世说》、《谏垣疏草》等。

《南北史合注》是一部久为历史研究者渴求而难得的史学名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被称为清初三大奇书。顾炎武、顾祖禹所纂上述两书流传很广，并有二顾合刻，今又有标点本传世。而此书在清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原定收录，所以撰有提要，乾隆五十二年（1787）发现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中有违碍言论，遂选派官员，重新检查清所有已经编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如《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诸史同异录》四种，统加禁毁，不准流传。撰就《南北史合注》及《南唐书合订》的提要，则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撤出。因此世无刻本，只有少数抄本存世。

1964 年中华书局整理重印《四库全书总目》，从故宫博物

院中将此书的提要找到（最早见于王重民《李清著述考》），附在书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存有抄本，虽属抽毁原本，惜均不全。此抄本属全帙，前半部书法工整，后半部便较潦草，非出一人之手。前有常熟瞿耀邦题记云："海内传抄本闻仅有二部半，而此本最善，信书林异宝也。"

《明文海》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明文海》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明）黄宗羲编纂。《明文海》是一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明代文稿总集。清朝乾隆对《四库全书》进行复检时从内廷文渊阁原藏抄本中抽毁的部分散叶，共一百三十五叶，此散叶装订成册，从未刊刻。现藏于河南省图书馆。卷前有刘阳序言。

黄宗羲（1612—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父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陷害，他受遗命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后又在乡组织“世忠营”抗清。南明鲁王监国，委任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左都副御史。入清后，黄宗羲决意不仕，隐居治学著述。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均有研究。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他历时七年时间编成明代文稿《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其后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增益，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时，以八十四岁高龄，终于完成《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的编纂。黄宗羲编《明文海》的主要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是为保存明代的文章典籍，也是进一步为纂修《明史》而保存史料。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不仅将明代文坛各派的代表性文章搜罗备至，还以“勤力巨眼”，将“埋

杂于应酬讹杂之内”的“情至之语”发掘出来（《明文案·序》），甚至游戏小说家的文章作品也兼收并采，为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武备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明文海》编成后向无刻本，传抄不多。最接近《明文海》原貌的是黄氏续钞堂本。而以此本与四库文澜阁本核对，卷数虽同，篇目却相差极大，四库本比续钞堂本短缺一千余篇。清朝当局借修书之机，对触犯禁忌之书进行大规模的禁毁和抽改，因而造成了一些书籍的亡佚，有些收入书也由此失去了原著的本来面貌。今见《四库全书》所收的《明文海》确已重遭删削。《明文海》抽毁稿即为证明。《明文海》抽毁稿是何时何人何故从北京辗转流落到河南，现今实难知其谜底。20 世纪 50 年代，河南省图书馆从河南民间购得，作为善本珍藏至今。

《明文海》抽毁稿，涉及到《明文海》第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二百二十四、二百二十七、二百二十八等七卷内容，基本上按照原书先后顺序装订成册，但偶有错乱颠倒之叶。此散叶用上等开化榜纸，直行红格，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以端楷抄就，在纸张、行款等方面都与今见四库文渊阁本同。尤其是卷二百二十四末叶及卷二百二十七首叶分别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与“文渊阁宝”朱印，与《四库全书》每册首叶钤阁名之印章、末叶钤“乾隆御览之宝”印章的做法完全一致，更可证明这些散叶确系复检时从原文渊阁已抄成的《明文海》中抽出来的。

今将散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之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明文海》（以下简称重印本）相对照，发现其中有四十余篇完整文章为重印本所未收，例如

焦竑之《修史条陈四书议》、吴道南之《谥法议》、袁黄之《苏州府赋役议》、徐时进之《常平仓议》、叶向高之《保甲议》、沈懋孝之《七略序》、赵南星之《酒史序》、陈继儒之《武则天删伪经自序》等。另有一些散叶只是文章的局部。部分散叶上墨笔删改勾划十分显眼，有些书叶天头处还草草批注有“换讫”、“以下删至某某页”等字样。其被抽毁的原因大都与政治违碍有关。

其一、消除反抗清朝之民族思想。清王朝统治者祖先原是中国东北境内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金朝。明末，满族贵族努尔哈赤接受过朝廷的官职和封号，后来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号为金，史称后金。1636 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清取代明朝后，统治者极为忌讳“后金”之名，更以曾为明臣为耻，因此竭力抹杀这一史实。张鼎之《辽夷略》、陈继儒之《建州考》等书，因记载有满洲贵族接受明朝封号及入侵明朝的事实而遭到严禁。今存抽毁稿中发现有张鼎文三篇、陈继儒文五篇，当是由于受牵连而从原文渊阁本《明文海》中抽出的。查《四库全书总目》，张鼎未见著录，陈继儒的著作也只立存目，可证明这一点。清代统治者由此对所有宣传反抗外族侵略，可能诱发汉民族意识的著作，也都在查禁之列。《四库馆臣议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说：“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尤甚者，仍行签出拟销。”抽毁散叶第二百二十四卷中有沈懋孝的文章十六篇，其中《题宣和谱之前》开篇曰：“昔宋王安石执政时，其深心以为宋之受侮于辽者，至亡状矣，不可不一决而思约金人以斗之”，其

之所以被抽毁，盖因语涉辽、金。当局甚至还忌讳汉族士大夫鼓吹的“夷夏之防”、“夷狄之辨”，凡涉及“夷、狄”等字样也往往要删改。因此《明文海》涉及到胡、戎、夷、狄等少数民族的文章，大都难逃被删削之厄运，例如原收入《明文海》的瞿九思《九边辨》、张大复《东征献俘》等文被删。又散叶第七十四卷祝允明《孔子庙堂续议》一文，当局便用墨笔涂去了“扬雄曰在夷狄则进之倚门墙则麾之”句（今对照重印本，确已无此句）。这些均可窥及当时统治者文网之严密。

其二、为加强文化统治，视不合程朱理学的思想为异端邪说而加严禁。《明文海》中因违背礼教和理学而被四库馆臣抽毁的文章占有相当数量。例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敢于批判孔子学说，反对礼教，倡导民主思想，而被清统治者看作“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四库全书总目》）。《明文海》原本所收录的李贽《复邓石阳》、《答耿中丞》等文自然在抽毁之列。并且因为焦竑与李贽为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斥责其“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因此，《四库全书》对焦竑著作一部不收，只立存目，而且对《明文海》原收焦竑之文也加抽毁。散叶第七十五卷第十至十三叶即为抽出的焦竑《修史条陈四书议》一文。又如袁中道与李贽过往亲密，李贽死后，他曾为李贽作传，给予高度评价与赞扬，这便使原收入《明文海》中的《李温陵传》被抽毁，还殃及袁中道其他文章也在被摒弃之列，散叶第二百二十七卷第六至九叶《宋元诗序》就是一例。

学术界公认，《四库全书》从学术角度对前代文化做了一

次较全面的总结，在保存典籍、促进善本的流传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清统治者的“寓禁于征”，编纂者有意删改，也给大批古籍带来巨大损失。纵观这些劫后而保存至今的《明文海》抽毁稿，或因触犯遭忌，或因受累被撤，或整篇抽出，或酌加删节，虽只一百三十余叶，涉及七卷内容，但从中可以看出四库馆臣是如何对违碍书籍进行查禁删削的。同时，由于《明文海》编成后未曾刊刻，目前存世的几个抄本又多有歧义，因此将抽毁稿公诸于众，对于探索《明文海》的原貌也是不无裨益的。

《明文海》抽毁稿本原顺序有部分错乱：卷七十七第六叶在本卷第二十叶之后。卷二百二十七第十九、二十叶在本卷三十二叶后。现影印本为了方便读者，调整为正常顺序。

足本按辽疏稿

足本按辽疏稿六卷　（明）熊廷弼著。明刻本。卷前有李化龙序。此书系辽事疏议，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参考书。初刻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前期，清乾隆时列入全毁书，世间罕传。此书全帙仅藏于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秋季华序言。

熊廷弼（1569 或 1573—1625）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明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保定推官，擢监察御史。万历三十六年（1608）巡按辽东。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但所陈以守为战的存辽计，与巡抚杨镐之议不和。不久，督学于南直隶，以严明声闻。万历四十七年（1619），经略辽东，勇于任事，持守边议，以后金人抚顺，被劾罢官。天启元年（1621），后金取沈阳、辽阳，朝廷乃以王化贞巡抚广宁，并起廷弼经略辽东。次年，王化贞兵败，弃广宁，两人皆退入关内。时太监魏忠贤欲藉此以陷正人，因诬廷弼，斩于市，传首九边。至崇祯二年，始获昭雪。熊廷弼除撰《按辽疏稿》外，尚有《辽中书牍》、《熊襄愍公集》等书。

《按辽疏稿》是熊廷弼于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巡按辽东时的奏稿。当时正值明代晚期，民族矛盾日趋紧张，后金

（即书中多次提到的狂虏）随时侵犯，疆宇不宁。熊廷弼指出："今之辽极矣，如大病之人，风邪外侵，精神内槁，肠胃脉络皆枯竭而无余，所不绝者丝发之气息耳。所为治之法，宜外护其风邪，内养其元神，泽其荣卫，实其凑理，一切劳形弊精之事，勿以扰之，夫然后生气可复，而生理可全也。"熊廷弼到任后，加强兵防，惩罚逃兵败将，修亭障、筑边墙、广积粮，采取多种防卫措施。巡辽三年，功绩卓著。此书就是他在这三年中的奏疏。

明刻本《按辽疏稿》，版框高二十二点六厘米，宽十四点六厘米。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鱼尾上镌书名。全书分六卷，编制体例大体依年代为序。李化龙序称："直指武昌熊公按辽之三年，既有南畿衡文之命。届行，乃裒其所指陈辽事疏议凡六卷，梓之以行。"《按辽疏稿》"付梓以行"，李化龙又为之作序，时在"甲午"、"丙申"后且二十年，则当在万历四十年（1612）后不久。可见，《按辽疏稿》初刻于明万历四十年代前期。

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此书有明末刻本。又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说："《按辽疏稿》一书闻有旧刻本，然已稀如星凤，为罕见之籍。"傅、王二先生所谓明末刻本与旧刻本，未知与天津图书馆此藏本是否为同一种刻本。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按辽疏稿》一书仅天津图书馆藏有全帙。《清代禁毁书目》称此书为"违碍"书，故传本极稀，世人难得一睹。此书对于研究明史，特别是明代的民族矛盾及辽东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极有重要参考价值，亦足可补明史记载之缺憾。

柳如是诗文集

柳如是诗文集　（明）柳如是撰，谷辉之辑。今据浙江图书馆所藏几种明本俱为著者自存明刻孤本，汇纂成书，又从文献中辑成“集外诗文”一编并选印柳氏传记、轶事等资料附录于书后。此书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女性文学生活的重要资料。本书卷首有谷辉之影印前言。

柳如是（1618—1664），名隐，后更名是，字如是，一字蘼芜君，号我闻居士。明末清初江苏吴江盛泽镇人（一说浙江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早年为吴中名妓，工吟咏，擅丹青，与陈子龙、宋徵与交契甚厚，词翰风流，声播远近。崇祯十三年（1640），扁舟一叶，初访虞山钱谦益，谦益为筑我闻室，称河东君，雅相礼重。东山酬唱，往还不辍，为东南吟坛盛事。翌年，如是年二十四，始归虞山。明亡，劝谦益自尽，不听。嗣后谦益潜通复明义师，实由如是襄助，慷慨有奇节。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曾详加考证，于清初江南这一段史迹隐微，深表而出之。清康熙三年（1664），谦益病故，如是因不堪族人求金要挟，自缢身亡，年仅四十七岁。

柳如是著述甚多，有《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尺牍》、《我闻室鸳鸯楼词》、《红豆村庄杂录》、《河东君诗文集》

等。藏诸绛云楼者，尽毁于火，故传本至尠。浙江图书馆藏有明刻《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尺牍》三种，为海内所仅见。1982年曾影印若干，国内外学者求索不绝，久已告罄。今特将浙江图书馆珍藏《戊寅草》等三种重予影印，幽兰重光，公诸同好。

《戊寅草》不分卷，署“柳隐如是著”，共收诗一百零六首，词三十一首，赋三首。前有陈子龙序，称柳诗“凌清而瞷远，宏达而微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为焉”，并谓柳诗与陈氏平素论诗远旨“深有合者”。陈子龙此序，《陈忠裕公全集》及《安雅堂稿》皆未收，故亦值得重视。陈序未署年月。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集中诸作，起于崇祯六年(1633)，至十一年（1638）结集，以与陈子龙、宋徵与唱和者居多。是集刻于杭州。戊寅为崇祯十一年，如是二十一岁。浙江图书馆藏本于1956年购入。卷端钤“抹云楼藏”朱文印，知由秦祖泽抹云楼散出。秦祖泽（1877—1966），字润卿，浙江慈溪人。

《湖上草》一卷，亦署“柳隐如是著”。收诗三十五首。卷端题下注“己卯春”，己卯为崇祯十二年（1639），如是二十二岁。此集盖继《戊寅草》而刻，时如是居杭州，遍游湖上诸胜。《岳武穆祠》云：“海内如今传战门，田横墓下益堪愁”，《于忠肃祠》云：“自公替凌后，几人称荦卓。所以徒步客，恸哭王霸略”，皆寄慨时局。《西湖绝句》“大抵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亦颇称赏于时。陈寅恪先生谓《湖上草》乃“依据手写原本摹刻”。按如是有题望海楼楹联书迹传世，楷体间以隶笔，出自钟繇，与《湖上草》波澜莫二，知是集确据作

者手迹摹刻，弥足珍贵。

《柳如是尺牍》一卷，卷端题“尺牍”，署“云间柳隐如是”，为崇祯十二、十三两年间致汪汝谦（然明）书简，凡三十一通。有三山（福州）林雪《柳如是尺牍小引》。时人称尺牍“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前二十九札起于己卯春，迄于庚辰秋。第三十札则记庚辰冬过访、虞山事。后汪然明欲刻如是尺牍，如是复作书为谢，并祈刻成后惠寄数本，语见第三十一札。今浙江图书馆藏本有“绛云楼书画印”及林云凤题咏，或即汪然明所寄而转赠林云凤者。传说江然明刻如是尺牍，以数十册寄虞山，谦益拉杂摧烧之，并求其版毁焉，当时流传绝少。此本因由汪然明持赠林云凤，故得保全。

《湖上草》与《柳如是尺牍》由汪然明刻于杭州。浙江图书馆收藏前，历藏林云凤、徐康（子晋）、赵宗建、高时显四家。三百年间，辗转流传，1964 年至 1965 年间，由高氏后人售予浙江图书馆。林云凤墨笔题云：“汪然明以柳如是《湖上草》并《尺牍》见贻，口占二绝”，二绝分咏《湖上草》、《尺牍》，末署“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冬日仙山渔人题于携李归舟”，有林云凤、字若抚诸印。徐楙墨笔题识称：“道光（丙申十六年，1836）冬，家子晋持眎藏本”，钤“徐楙私印”白文印。惠兆壬墨笔题识：“壬寅（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六月访徐子晋，于凤泉清听之室出此卷”，有“红豆”朱文钤印。赵宗建墨笔题记“甲子（同治三年，1864）冬日徐于晋赠，次公记”，钤宗建私印白文印。据此，知是本道光初归徐子晋，同治三年入藏赵氏旧山楼。1920 年，高时显自虞山携归杭州。王国维题云：“庚申季夏，野侯先生归自虞山，得此

秘帙，假读一过，漫赋二一章。”钤“静安”、“王国维”二印。浙江图书馆藏本《尺牍》在前，《湖上草》在后，乃为旧山楼重装。封面有赵宗建题记：“光绪丙戌（十二年，1886）夏，非昔居士重装。”今影印本恢复原装，前为《湖上草》，后为《尺牍》。

《湖上草》卷末粘附一小签条，有“柳如是私印”钤记，下墨拓边款“崇祯辛巳秋中顾苓”，知印为崇祯十四年钱谦益门人顾苓所镌。按此印后归高时显姻亲沈衡，签条实高时显借得沈衡藏印所钤，而非原本所有。又钤印“柳”、“私”二字，上半部分缺，以朱笔描补，所缺部分则以反字粘于钤印之上半寸许处。盖签条年久脱落，重粘者初颠倒正反，又撕下重粘，以致于此。今影印本已不能辨其描补之迹，故加以说明。

柳如是诗文尚存于他处者，今辑为附编二种。附编之一为《东山酬和集》，其中存柳如是诗十八首。《东山酬和集》二卷，为钱、柳及钱氏友朋唱和之诗集。有吴门沈璜崇祯十五年（1642）序，及钱氏门人孙永祚《东山酬和赋》。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如是访钱谦益于虞山半野堂，翌年六月七日，钱、柳结合。如是年二十四，谦益年六十。此集以如是《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始，至谦益《催妆词》终，皆其间二人唱酬及友朋奉和之作。相与酬唱者有程嘉燧、徐锡胤、沈瑛、苏先、徐波、朱陈、林云凤、周葵、张纪、冯班、钱龙跃、冯舒、何云、陈玉齐、吴宗荣、陆贻典、冯孝威、顾凝远、钱龙惕、许经、周永年、周永言等二十二人。钱、柳唱和，并见《牧斋初学集》卷十八、十九、二十（缺柳如是《新正二日次韵》一首）。又诸人奉酬之作，仅表程嘉燧三首，编

次亦稍有更动。《东山酬和集》原刻及旧抄均未见，今据民国五年丁祖荫辑《虞山丛刻》本全文排印，以见钱柳因缘与一时风雅。

附编之二为柳如是诗文补辑。主要辑自《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及邹漪所辑《柳如是诗》，计诗二十四首，词二首，文一篇，按文体编次排印。此外为便利读者计，本集还将有关柳如是资料若干辑为附录，附印于后。其中有传记四种，杂记三十五则，题咏七十八首。

两朝宪章录

两朝宪章录二十卷　（明）吴瑞登著。本书记载明嘉靖、隆庆两朝之事，传本极少，仅有明刻本，今已罕见，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影印，并加以校勘、断句。但有缺页、漏字、误字数百处，经遍查明代史籍，加以补漏正误。影印本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吴瑞登，字云卿，武进人，由贡生官兖州训导，除编纂此书外，尚有《明绳武编》三十四卷，载于《明史·艺文志》中。

此书以编年为体，以选诸臣章奏，汇编成书。每疏之后，加以评议，论其是非，颂其卓见，不免多存封建文人迂腐之见，然其中亦不少针对时事，有特殊见解的，时人于嘉靖帝多颂扬其雄才大略，称其虽二十余年未曾临朝，而大权在握，不使宵小切据。其实严嵩、赵文华辈害人坏政之事多有，亦足以说明嘉靖帝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暴行。故此书在隆庆元年记吏部总述嘉靖朝诸臣因建言弃市死者杨继盛、沈炼等四人，廷杖死者杨最、王恩等十三人，戍边死者李璋、杨慎等二十八人，居首相之夏言，建功名将张经、曾铣、王忬等被弃市，久系诏狱而未死者吴时来、海瑞等人之生死，尚不预焉，是见嘉靖帝对敢谏直言之臣，批及逆鳞者尽行杀戮，于功勋之臣毫不怜惜，甚至名将被诛，北敌立至，仍一

意孤行。在位四十五年中残杀大臣之多，深文锻狱，波及无辜，较洪武帝尤为酷虐。又其性喜怒无常，今尚温旨褒奖，明则斩首弃市，种种暴行，此书记述无遗，是本朝人写本朝史敢于直书者。

书中对于贪污之风深恶痛绝，认为贪污之风，起于奢侈。又云："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百金称多，今则累十万以为常。"亦证明自中业以后，贿赂公行。严嵩为相，更是贪墨横行，民不堪命，及其势败，籍没其家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古玩所在又数百万。《知不足斋丛书》中曾著录有文嘉辑《钤山堂书画记》一卷，其中珍品无数，即有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文嘉为名书家文徵明之子，亦擅长书画，当钤山堂抄家时，文嘉参与其事，见其事而记录之，益证严嵩父子的贪污罪行。此书屡志其恶，则此书名为宪章，其实也暴露了封建帝王将相之罪恶。

东莞志

东莞志［崇祯］八卷　（明）张二果、曾起莘重修。此志分为地舆志、政治志、学校志、兵防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外志，记录了东莞明朝各时期的兵额饷银、职官俸禄及人口、田地赋税的具体数字，又最早记载了袁崇焕的事迹，及明末西方传教士庞迪我的在华行踪，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东莞县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崇祯《东莞志》未见刻本，仅有抄本存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现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卷前有谢晖影印出版前言。

张二果字稚复，号荪公，东莞博厦人，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崇祯十二年（1639）编成此志后，与曾起莘一起入庐山为僧，创建罗浮华首台、水帘洞诸山寺，后卒于庐山。

曾起莘字宅师，广东番禺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崇祯十二年（1639）偕张二果出家于庐山，法名函是。明亡，居番禺员冈之雷峰寺。函是虽为僧，但以忠孝廉节闻名，一时抗清义士如屈大均、金堡、张安国等皆为其弟子。清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卒，著有《瞎堂集》，为清代禁书。

东莞县（今东莞市）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且近年又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城市。东莞在元初始有志书，以明代而论，存世有卢祥的《东莞县旧志》和张二果的崇祯《东莞

志》。卢志为残本，只有张二果的崇祯《东莞志》较为完整。此书前总目中、子目之下均注分撰作者，凡十二人，其中丁邦祯、李贞、陈万几、尹体震四人参加明末张家玉的抗清斗争。若不是此志留下一丝痕迹，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对东莞史志的贡献。

此志中凡遇“皇明”、“国朝”、“今上”、“圣谕”等字均提行抬头，以尊明制。又“常”作“尝”，“深”去“氵”，“学校”作“学较”，“检”作“简”，以避明成化、泰昌、天启、崇祯诸帝之讳，可见抄者仍保留明代形式。书中条文之上，多有圆形木印“查”、“抄”二字，条文下尤其是《艺文》诗文题目之下右方，多有“周志录”或“彭志录”等字。“周志”指周天修纂之雍正《东莞县志》；“彭志”指彭人杰修纂之嘉庆《东莞县志》。条文或艺文题目之下右方又有“已录”、“已钞录”字样。检民国陈伯陶修《东莞县志》，凡此志无“已录”、“已钞录”字样者，陈志则无之，此可证是志为陈伯陶编民国《东莞县志》时所用之本。考抄写之字无论是笔法、字形还是风格，与所书“周志录”、“彭志录”、“已录”、“已抄录”等字均无二致，可见此志抄于民国《东莞县志》编写之时，即民国元年至六年（1912—1917）间，抄者应为志局中人。

全志分八卷，上承万历初年的《东莞县志》，下接崇祯十二年（1639），其间六十余年的东莞资料赖此保存。

《政治志》的《事记》中，列“总部”，以记全国与东莞有关之事，列“郡”以记一省与东莞有关之事，列“县”以记东莞大事，这种体例在全国方志中殊少见到。在“总部”里记载了明兵部尚书袁崇焕史事三条，分别叙述袁崇焕击破清兵，皇帝加封袁崇焕及崇祯帝误杀袁崇焕等事，崇焕以“叛国罪”被

杀，在当时情况下，任何志书均不敢提及袁崇焕事，而崇祯《东莞志》记这些事之时，距离袁崇焕之死仅九年，是全国方志中记袁崇焕事最早的一种。

此书特别详记了崇祯之赋役情况，是研究明末东莞经济与人民生活的重要资料。而在《人物志》“方技”的刘杰传中，记载了明末西方传教士庞迪我与刘杰的友好交往，对于研究明末西方传教士的在华行踪，提供了原始资料。特别是在东莞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宪章外史续编

宪章外史续编十四卷，又名**《五朝注略》**。（明）许重熙撰。明崇祯刻本。卷前有自序及董其昌序。此书起自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迄天启七年（1627）八月。现据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影印，影印本卷首有徐红岚前言。

许重熙，字子洽，太学生，号东村八十一老农，江苏常熟县人，以史学著称于世。数游京师、金陵、淮扬、匡庐间诸藏书家，得遍识其书，饱读典籍，学益博，识高古。撰有《历代通略》、《国朝殿阁大臣年表》、《宋史增订类新编》等，俱入禁毁书目。

许重熙于崇祯初年，以编年的形式将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天启七年八月间一百余年的史事编撰成《宪章外史续编》一书，以赓续薛应旂《宪章录》。《宪章外史续编》以明代人写明代史事。董其昌序云："……臣间尝睹嘉靖朝有若大政、编年、识余、闻见诸录，万历朝有若笔麈、邸抄，泰昌，天启朝有若日录、从信、纪政，或出自侍臣随事载笔，或本之通儒有故发愤，皆可为纪述之光……"而称此书保存了一些真实史料，"可以破讳近之疑，可以镜治朝之概"。

此书记载辽东兵事颇多，如谓："奴寇宁远，诸将凭城御之，炮伤奴兄召力兔，奴兵解围退去。……奴胆已寒，灭之有

日”（天启七年六月）。因许重熙有“刘伯温非渡江勋旧”之语，是节引了《神庙留中奏疏录要》中的语言等，皆为后来清人所深讳。故至清乾隆间，即被列入禁书。《清代禁毁书目》小注云：“查《四朝注略》系明许重熙撰，内第七卷以至十四卷，诋斥之词甚多，应请销毁。”

《宪章外史续编》一书，乃清代禁书浩劫幸存者，又题《嘉靖以来注略》（即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史略），禁书目题作《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其实漏佚卷十二、卷十三的“泰昌注略”。

西园闻见录

西园闻见录一百零七卷　（明）张萱撰。这是一部上起洪武，下迄万历的明史著作。书成无力付梓，仅存明抄本。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据邓之诚等所整理的明抄本排印出版。今影印哈佛燕京排版本。卷首有吴丰培影印前言。

张萱，广东博罗人，字梦奇，号九岳，别号西园。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举于乡，官至平越知府，学识渊博，精通经史。曾参与修史，得当时旧档，以二十年之力，完成此巨著。此书卷帙浩繁，一百零七卷，约四千页，竟达三百余万言，涉及范围广。《千顷堂书目》列入史部别史，《明史·艺文志》列入史部杂史。书成据自序云：只有六卷付梓，而全书过多，无力刻行，故世罕流传，只存抄本。但抄本中错误百出，无法阅读。遂由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指导，学生侯仁之教授博采典籍，加以校订，其显属笔误者则径改之，不则正以他书，其不能改者则仍之。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据由邓、侯先生整理过的居敬堂明抄本用宋体排印，分订七十二册出版。满足了研究明史者之渴求。

此书价值颇高，分类详赡，上起洪武，下迄万历，内编以表德行，专重行谊，分列子目近百。外编纪政事，依官为次，又列目百有五十。其他则列杂编，也列目十二，各目之中，以

（前言）集名家之言论，（德行）详具体之事例，意在因事存人，因人见事，采摭浩博，多非习见。原书已亡，幸赖此书而得存，信为考明事者所必参稽。邓之诚先生跋文誉此书有六大特点。边疆、海防，重点所在；属夷、属国，民族研究之要务；治河、屯田，事关国家的大政；忠烈、孝顺，意在伦理；廉法、节俭、更是人民所依赖；职官、朝政、存有史料价值。虽其中有庞杂无章之文，迂腐之论，究不失为有用之作，廉政建设及爱民防盗措施，也有现实意义。

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

日本黄檗山万福寺藏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　陈智超等编。隐元隆琦于1654年以六十三岁高龄东渡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尊为“国师”。他在日本十九年，仍与中土保持联系。至今日本黄檗宗大本山万福寺珍藏着他所收中土来信一百一十八封；写信人包括郑成功等许多著名僧俗人士。这些信件保存了许多抗清资料，极为珍贵，对研究南明史、佛教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皆具史料价值。整理者对原件详加考证、释录外，还从《隐元全集》中查补了大量复信，使其相互衔接。卷首有陈智超序言。

清顺治十一年（1654），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清远里黄檗山万福禅寺住持隐元隆琦及随从主僧十人等一行，于六月二十一日自厦门出航，七月五日晚到达长崎。他们乘坐的是郑成功的贸易船队，即所谓国姓父船。

隐元当年六十三岁，他先后曾在黄檗山住了十五年多。由于隐元的经营，黄檗山伽蓝一新，成为一大丛林。众多僧侣及乡绅居士皈依，顺治八年（1651），参堂僧众达千人。

当时的黄檗山，由于以复兴临济宗自任的明末大禅师密云园悟、其法嗣费隐通容、法孙隐元隆琦等三代相继经营，以临济正宗为标榜，使临济正宗在日本广为传播。

隐元为何东渡日本？它既有自古以来日中深入交流的历史背景，也同当时日本锁国政策下的贸易活动有关。在当时惟一开放的贸易港口长崎居住的从事贸易的中国人（唐人），按照日本的风格完成崇福寺、福注寺，并以中国僧侣为住持。当崇福寺需从中国招请住持之时，福注寺的无心性觉举荐他的友人隐元的法嗣、罗源县凤山报国禅寺的也嬾性圭。然而，应邀的也嬾性圭在东渡途中遇海难身亡。兴福寺的逸然性融，是长崎唐三寺众僧中的长老。在他的主持下，三次请也嬾性圭的本师隐元。隐元为完爱徒之愿，毅然应请，所以他在后来给本师费隐通容的信中说："日本之请，原为嬾首座弗果其愿，故再聘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对于黄檗僧众、檀越的慰留，隐元与他们约定三年还山，然后东渡。

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复杂。由于明亡而引起的混乱，有人亡命日本以避难，还有南明的抗清，以及郑成功等向日本乞师。隐元东渡之时，郑成功控制了福建沿海一带。关于当地在此前后的详细情况，甚望加以研究。

在日本方面，视隐元之东渡为"祖师西来"，众多僧人在隐元会下参拜。因为在此之前，《隐元禅师语录》已传入日本，"黄檗隐元"之名也为人所知。在参拜隐元的僧人中，不少人寄希望于隐元这位三百年来的大善知识，期望他能振兴处于沉滞状态下的日本佛教。历史上，日本僧人到中国留学、参拜名师，曾为日本佛教带来清新之风；而这时企图去中国留学的僧人，又因锁国而不能实现，因此他们把从中国来的大禅师看作是"祖师西来"。

京都花园妙心寺龙溪宗潜，秃翁妙周和竺印祖门，原拟请

隐元为洛西古刹心寺住持，因内部反对而未能实现。于是又向幕府交涉，请住畿内摄津富田的慈云山普门禅寺。在隐元来日次年的九月，他移住普门寺，当时限定参禅的日本僧人不得过二百人。龙溪等人又为一个新的计划而向幕府请求，即留隐元在日本为一所寺庙的开山，建立新的禅宗教团。虽然隐元为履行三年归国之约而多次表达回国愿望，终因龙溪谒见家纲将军而使建寺开山之事落实，从而中止了隐元的回国。

1661 年（宽文元年）8 月，隐元在众多中日僧人的随从护送下进山。为表示不忘旧寺，仍名黄檗山万福寺。从此出现了称为临济宗黄檗派（后称黄檗宗）的新教徒，并开创了本山。因此称福建的黄檗山为唐黄檗或古黄檗，而日本的则称为新黄檗。隐元最终没有回祖国，终年八十二岁。此后，新黄檗由隐元的法子法孙承继，由中国僧人任住持的情况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隐元东渡以后，新黄檗开创前后，既有返回祖国、也有东渡日本的僧人，还有托便船携带的来往书信，其中有许多是古黄檗众僧及檀越催促他回山的书信。这些书信虽然没有全部保留下来，但现在新黄檗仍收藏有诸和尚、居士写给隐元的一些来信，分装为五卷。

平闽记

平闽记十三卷，又称《**平闽记事**》　（清）杨捷著。杨懋绪编，清康熙刻本。记叙杨捷康熙年间征伐郑成功之子及其部将刘国轩，平定福建事。此书未收入《四库全书》，全书总目录史类仅存目。影印本卷首有杜晓明序言。

杨捷，字元凯，义州（今辽宁义县）人。原为明朝将领，顺治元年（1644）降清，授山西换标中军游，身经数十战，所向无敌，为清朝统一中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官至江南提督，加昭武将军，卒谥敏壮。《清史稿》有传。

清朝初年，郑成功死后，其子郑锦继位，据守台湾，仍作反清复明准备。康熙十三年（1674），趁清靖南王耿精忠谋反之机，派遣其骁将刘国轩率众渡海攻福建。康熙十七年（1678），连陷漳州、海澄等城，福建提督段应举兵败自杀。刘部军威大振。朝廷诏调江南提督杨捷出兵福建代段平息战乱。自是年六月杨捷领兵入闽起，前后三年，经过大小数十次战役，最后刘国轩兵败，率余部撤回台湾。东南之乱，遂告平息。

此书由杨捷之子杨懋绪等编纂，收入杨捷自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三年间与平闽之役有关的奏疏、笺启、咨文、牌榜、告示等文稿。书前有杨捷自序，详略俱载其平定福建经过。此书流传不广，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抄本黄公说字

抄本黄公说字十二集四十五卷　（清）顾景星撰。卷首有庐陵（今江西庐山）赵巍序。康熙二十三年（1684）成书，清徐氏臧棱庵抄本。四库入存目。是一部研究汉字的专著，历来无刻本问世。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阳海清前言。

顾景星（1621—1687），字赤方，号黄公，湖北蕲州人。明贡生。清康熙间，举博学鸿儒，曾授翰林院检讨。未几，即称病请归，杜门著述。其曾祖顾问、顾阙皆系理学家、进士，祖父顾大训为藏书家和著述家；父亲顾天赐通经史、精医道，所著经学、医学诸书多入《四库全书》。黄公既出身名门，幼承庭训，加上生性颖悟，勤奋好学，少有神童之誉。六岁能作赋，八、九岁遍读经史，记诵渊博，诗文雄赡。旋补诸生。未几赴试秋闱，论才当取解元，以卷中一字犯考官名讳而被黜。考罢，适逢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战事四起，遂长期奔走江南各地。南明弘光元年（1644）应江淮各省流寓贡生试，名列榜首，授职推官。赴任直陈时弊，疏至通政官处不呈，遂辞官闲居。清顺治八年（1651）奉母柩归里，自此杜门息影，潜心著述。康熙十七年（1678）诏求天下鸿儒，景星以“专心诵读，雅擅诗文，品行端方，兼精字学”而获六科举荐，但未应召。次年，帝令湖广督府“作速咨送（景星）来京，以副朕求贤至

望”，乃进京入觐，授官翰林院检讨。未过三月，称病请归，取易无咎之义，其堂曰“白茅”。顾氏著述宏富，有《白茅堂集》、《读史集论》、《赜池集》、《顾氏历代列传》、《南渡来耕集》、《阮籍咏怀诗注》、《李贺诗注》、《童子集》、《愿学集》、《虎媒记》、《登楼集》、《避地泖淀集》等。

顾景星著作有二百余卷，其手稿大多毁于兵燹，今仅存《黄公说字》等数种。幸存残稿由其第三子顾昌纂为《白茅堂集》，《黄公说字》得以成书并流传至今。

景星自幼喜攻六书，习篆籀，凡所读典籍中，文字“有形体差讹、奇释舛谬者，必考求原委，引绳证注，使归至当”。久而成帙，纂为《赜池集》一百十八卷。后补其遗漏，依附部首，更名《黄公说字》。景星殁后，其第三子顾昌“即于丧次起手誊真”，终因“教读远方”和“卷帙浩繁”而未能于其生前克功。迨至乾隆十二年（1747）已经“行年六十”的顾三经，痛其祖父“萃毕生心血著为此书”，而其父“誊真甫及其半，莫窥全豹”，稿存箧笥，年深月久，“恐滋朽蠹”，故“除应试及疾病耽延外，朝夕抄录，阅二年而全集告竣”，从而使其“先君子未了之局，粗有正副草本贮之石室，以防湮晦”。

顾景星《黄公说字》手稿，存亡罔知。经顾昌父子整理、校录而成的稿本，据顾三经识语，有正副二本。其一或即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之“湖北巡抚采进本”，《四库总目》入经部小学类存目；另一则是70年代末在景星故乡所发现者，今藏湖北省蕲春县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已著录。后者以印制之六行墨格纸誊写，版心上印书名，下印“□集”、“□部”，以其钤有“黄公”、“顾氏景星”、“家在蕲春玉

峰”等朱印和末有三经题识观之，当是三经所称“正副草本”之一。惟其与四库采进本孰为正、孰为副，尚待考定。正文依地支分为十二集（寅集已佚），并不分卷，亦与《四库总目》著录一致。自顾昌父子整理、校录后，至今已有两个半世纪，此书始终未能付梓，仅有抄本流传，现尚存二部：一部为清抄本，藏于东北师大；一部为武昌徐氏臧棱庵所抄，藏于湖北省图书馆。两抄亦皆为十二集，与“四库采进本”、蕲春馆藏本所不同的是又细分为四十五卷。蕲春馆藏本与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均有佚名批校，后者是否录自前者，待考。

此书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基础，参考历代文字学及其他著作一百一十余种，先按楷体分编，次引古文、小篆，兼收俗字，标释字体源流，收字不避帝王之讳，注音兼反切、直音并间注古音、方音，释义则博采众家之长并参以己意。

此书为一百六十万字之鸿篇巨构。由中国古代字书源流言及本书之价值所在，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对字书渊源流变之叙述甚为简明，于读者理解和使用此书有所裨益。《古今字书略录》，自汉许慎《说文解字》至明张自烈《正字通》，列书百种有奇，其间虽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之诸种弊病，但毕竟是要籍，足资参考。《黄公说字例》，共18条，于本书的宗旨、体例、结构、取材、征引等均有明确交待。正文共收一万零四百九十二字，设二百一十三个部首序列。其收字不局限于经书，延及史、子、集类典籍用字；其部首之设置，则在《字汇》、《正字通》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调整。字则“宗小篆”、“主《说文》”、“义从六书”、“文考六艺”并旁及其他，先依楷字分编，各字之下首列篆字，次为释义、切音。例：鼎《说

文》：‘鼎之绝大者，乃声。’《鲁诗说》：‘鼏，小鼎。’《唐韵》：‘奴代切。’《正字通》云：‘旧注又上声，囊海切。非。’《原》‘从古文乃作鼏，亦非。按乃象气出之难者，古文作弓，鼎之大者，气出盛，故从乃，非乃声也。’王安石《字说》：‘大鼎，孕出其气。是也。’《诗说》：‘小鼎。非。’若《字汇》虽有讹谬，皆沿前人，则不复琐引，恐滋藤蔓。若《正字通》原本论辨详确者，不复赘录，仍附本字于各画之下，以便稽查。且采用“某互详某”之手法，既理清其关系，又避免了赘出。

中国古代字书，自《史籀》、《说文》以降，发展甚速，不惟其类型愈来愈多，而且其数量极为浩繁。迨至明清时代，出现了形音义合解的大型字书，如明梅膺祚《字汇》、张自烈（一题清廖文英）《正字通》和清张玉书等之《康熙字典》即是。由于《字汇》和《正字通》在录字范围、编排体例、注音释义等方面较之前此字书有着重大的改进和突破，故颇为当时士林所重，对后世亦有影响，代有刊刻。晚于《正字通》七十余年问世的《黄公说字》与之一脉相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说自称推本许慎，而大抵以梅膺祚《字汇》、廖文英《正字通》为稿本，仍以楷字分编”。赵嶷则在此书前序中称：“《正字通》出，有功于前贤；《黄公说字》出，有功于万世。黄公于梅、张二氏，人未谋而，鬼可通神。使《说字》大行，为前人掩愆彰功，剔微阐义，此顾氏之心而亦梅氏、张氏之心也。”于三者之渊源关系言之甚明，于此书之原委、主旨乃至得失亦已略陈大端。

当年《黄公说字》成，不胫而走，遍传朝野。今综观诸家评论，可谓褒贬不一，毁誉兼具。褒者谓其“诂释磅礴，虽一

家之言，实综百代之奥”。“夫文以显道，字以显文，学以证字，字学之家必融会群书，始求至当。先生经神学海，淹贯百家，署曰《黄公说字》，盖自命之矣。于戏！车书混一，今此其时。”贬者则病其舛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陈言甚详。

《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清）顾炎武撰。《日知录》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成全书，共三十二卷。是一部按经义、吏治、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撰的读书札记。抽毁余稿用开化榜纸，朱丝栏墨书，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一字，与现存于世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款式完全相同。这些散叶装成一册，计有四十二叶，顺序混乱。现藏河南省图书馆。影印卷前有周新凤序言。

顾炎武（1613—1682），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江苏昆山人。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曾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弃家出游，“笃志经史”，誓不仕清。他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县掌故、天文仪象，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都有研究。一生著述宏富，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日知录》一书是顾炎武倾注毕生心血的代表著述。此书先有康熙九年（1670）符山堂初刻八卷本，后来顾炎武成其三十余卷本。其去世十三年后，由弟子潘耒整理手稿，即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但是潘耒在整理过程中，为避文字狱之祸，已“于原文多所改窜”（潘承弼《日知录补校》）。近人黄侃据雍正时旧抄本考出《素夷狄行乎夷狄》、《胡服》等被整条抽出，仅

存其目。继潘氏“改窜”之后，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更对《日知录》一书大加抽删。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下令对已抄缮成书的《四库全书》进行全面复查。河南省图书馆所藏的《日知录》抽毁稿，正是在这次大规模复查中，从文渊阁原抄本《四库全书》里撤换出的散叶（因此该图书馆还藏有文渊阁本《明文海》抽毁稿，其第二百二十七卷卷首和第二百二十四卷卷末分别钤有“文渊阁宝”和“乾隆皇帝御览之宝”朱印。此《日知录》抽毁稿虽无卷首、卷末之叶，但款式与《明文海》抽毁稿俱同，亦当原为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物）。这些散叶是20世纪50年代由河南民间采购入藏的。

《日知录》抽毁稿一册，其装订顺序混乱，分别为卷八、九、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的散叶，其中以卷二十九散叶最多，可能跟它涉及少数民族的内容有关。散叶上多有以朱笔或墨笔所加的批语和勾划符号，有的是对某些字句的删改，有的是对某些条段的删除。今以散叶内容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重印本”）以及《四库全书》所依据的康熙三十四年顾炎武弟子潘耒刻的《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以下简称潘本）进行了对比，可以发现：

其一，散叶中某些条段的字句经删改后，“重印本”才予以收录。如抽毁散叶卷二十三《二字姓改一字姓》条下“洪武元年”一段中，散叶原与潘本相同，而后有所批改，“重印本”乃遵散叶上的标示，改动了六十四字。如散叶将“华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江统徙戎之论不可不防”、“鞑靼”等字句

皆用墨笔删涂，“重印本”分别已遵改为“土著”、“虽示怀徠，终虑淆混”、“以臣之见不如早为之所”、“来降”；散叶中“旃裘之种”、“用夏变夷”，“重印本”亦已改为“中土旧族”、“招携怀远”；该段中的人名对音，今见“重印本”亦大半有所改。

又如《骑》条“春秋之世”段中，原书有“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之语，散叶将原书的“戎翟”改为“荒服”，“杂”改为“散”。语句中的两个“胡”字，散叶俱改为“变”。今见“重印本”俱遵散叶批改而重抄之。

其二，散叶上一些条段或其中部分正文、注文被抽毁，“重印本”也就不再收录。如卷二十九第十四至十五叶上引录《国语》条，其第一段眉批：“删”，“重印本”今已无“然其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传于后代矣”共正文一百五十字注文一百四十一字（其中有称赞魏孝文帝“用夏变夷”意）；同卷第二十二至二十五叶上，原有《徙戎》条文字，“重印本”此条也遵之删去。此外，散叶删去原卷二十九第三十至三十二叶《三韩》条、原卷三十二第三十三至三十五叶《胡哦》与《胡》条，“重印本”也都不录入。

《四库全书》在收录《日知录》时，不但对顾炎武所主张的“法古用夏”、“用夏变夷”等经世主张进行了否定，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九），而且在潘本的基础上再次予以抽删。《日知录》凡三十二卷，而复查中又被抽毁撤换的就涉及到十二卷。如此大量的删改，可见清王朝文网之密，文禁之严。经过此次删削，《日知录》一书距其原貌相去更远了。

此外，某些散叶文字格式原与潘本俱同，但四库馆臣在抽毁叶上旁批“小字改大字提写”（如《乐府》条），或眉批将小字“俱改大字，另行提写作七行”（如《寺》条），“重印本”也一一遵批语另行抄写。如此“变乱旧式”，正如鲁迅所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当然散叶也有漏抄误写的，今见“重印本”。已补正之）。

编辑说明：

《日知录》抽毁稿本原顺序为：卷二十九第二、三、四、五叶。卷二十八第十一、十二、十三叶。卷二十九第十四、十五叶。卷二十四第十七、十八、十九叶。卷二十九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叶。卷三十二第三十三、三十四叶。卷二十二第三十四叶。卷三十二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叶。卷九第四十四叶。卷二十一第四十六、四十七叶。卷二十七第六十四叶。卷二十八第二十五叶。卷三十第十二叶。卷九第三十二、卷二十三叶。卷二十三第二十二、十三、二十四叶。卷十七第二十叶。卷八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叶。现影印本为了方便读者，调整为正常顺序。

蒲松龄手稿本《聊斋志异》

稿本《聊斋志异》共四册　（清）蒲松龄撰。今仅存一部，共二百二十八篇、序文三篇，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影印本卷首有康尔平前言。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因书斋名为“聊斋”故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自明万历以来，蒲家是“科甲相继”的书香门第，但到他父亲蒲磐这一代，家势早已衰微。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屡试不中，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当了一名贡生。他一生著述甚富，除了风行海内外的《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词集一卷，杂注五卷，戏三出，俚曲十四种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聊斋志异》的创作共历经四十年，是蒲松龄集毕生心血而成的小说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全书共四百九十余篇。它与《红楼梦》共同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史上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二百多年以来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有六十多种版本流传于世。现存较完善的抄本有乾隆十六年（1752）铸雪斋抄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本。著名的评注本有何垠注本、何守奇评本、冯振峦评本等。最珍贵的版本要属本文介绍的蒲松龄的半部手稿本。

对于蒲松龄的手稿，他的后人遵其“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的遗嘱。世守相传，秘不示人。因年代久远，先坏于阴雨，后毁于兵燹。国内所存手稿已不多见。《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能够得以保存，历尽周折。《聊斋志异》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不少人借阅作者已完成的手稿，当时的刑部尚书、文坛盟主王士禛，在为父守丧期间，结识了蒲松龄，也借读过手稿，并在书间标示评语。

半部手稿《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也是蒲氏晚年最后改定的稿本。因蒲松龄后人家境不好，以至于蒲松龄去世五十余年中，子孙也没有能力将手稿刊行，仅仅是传抄本流传于民间。《聊斋志异》历经几代人收藏，重新装裱成两函八册。但因装裱工的不慎，竟将手稿的天头裁切过多，使书中三十一处作者手录、王士禛的眉批及佚名校语，毁坏多处，实在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此稿在蒲氏七世蒲价人时，将其《聊斋行乐图》及《聊斋志异》分别传于蒲英翰、蒲英灏两兄弟。蒲英翰后因生活拮据，变卖了《聊斋行乐图》，蒲英灏出于无奈，借出了《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给盛京的依克唐阿将军，本约定先以半部借之，阅后再以另外半部交换，但天有不测风云，依克唐阿有事进京，不料染病逝世，所借半部手稿从此杳无音讯。后传言《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在苏联保存，是否即遗失的那半部手稿，或是其他稿本、抄本，不得而知。1950 年蒲英灏之子蒲文珊将父辈珍藏的半部手稿《聊斋志异》捐献给了国家。几经辗转，今存于辽宁省图书馆。

现存半部稿本《聊斋志异》，手稿用竹纸抄写，共四百页，纸质已陈旧发脆。均为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七至三十字不等。

卷前有刑部侍郎高珩的《序》，还请淄川达官同乡好友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题《聊斋志异序》，但蒲氏总觉得高唐二人的序没能完全表达出他的心情，于是自己又作《聊斋自志》。此序价值很高，一是因为作者讲述自己的著作经过、志趣等；二是因为它是最早用骈体文写成的序文。现存的小说二百三十七篇，是原手稿八卷中的一、三、四、七卷。佚失二、五、六、八卷。其中《猪婆龙》是重文。《五通》后《又》、《青蛙神》后《又》各分为二篇。《犬奸》、《牛同人》、《吴门画工》等二十五篇为青柯本所佚刻。其中二百零六篇是蒲松龄的手迹，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改削较多，自抄部分字迹清楚极少涂改。加之书中眉批上及各篇正文后间有蒲氏手录王士祯评语，更加说明了现成半部手稿系蒲氏清稿本。更为珍贵的是《聊斋自序》序后钤有著者长方印章一枚，此章为久已失佚的稀世品。稿本《聊斋志异》具有极珍贵的文物价值，为研究《聊斋志异》的成书年代、分卷问题、编次顺序，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稿本《聊斋志异》与铸雪斋抄本和青柯亭刻本有文字上的歧异，一些稿本中写的错别字，其他版本改过来。二是后人为避讳个别字、句作了改动。三是版本在传抄过程中，有的抄阅者嫌蒲松龄写得不够精彩，擅加改动。此稿本可以校补现行《聊斋志异》诸多版本文字的阙误。

50年代初，此稿本曾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少量影印过，但是现在存世的已是凤毛麟角，而且影印时还存在改动失真问题。今据原藏本重新影印时，将半部稿本《聊斋志异》二百三十七篇合印成一册。各篇文字顺序俱严格按照原藏本，不做任何变动。例如原本第一册有《乔女》一篇，而册末附此篇评语

一则，其正文与评语之间相隔《蛤》等多篇小说。评语置于册末而与正文不完全相接，疑乃蒲氏原稿抄成后，又抄录若干评语以附于册末，由此可见其对自己著作的反复下工夫。但是，文学古籍刊印社影印时，将册末《乔女》评语前移置于《蛤》之下，掩盖了原稿本的真实面目，对研究蒲松龄著作有误导。此次影印，仍各依其旧。除《乔女》评语外，原第四册的《罗刹海市》、《续黄粱》、《狐谐》、《念秧》的评语也都按原书顺序而不作改动。

影印说明：

原稿本疑当有目录，但久已失佚。为方便阅读，今据正文篇目补编而置于书前。由于正文篇目的情况比较复杂，作以下说明：

一、正文篇前无题，但其“天头”有一题，乃以此题入书前目录。如《小人》，当为抄写时漏失篇目，而蒲氏校阅时补加于天头，故今据之补出。

二、正文篇前二题并列，一题上加圈者入书前目录，另一题无圈者则在前者之下加括号表示之。如“武技”与“拳勇”，“武技”二字上加圈而“拳勇”上无圈，则疑蒲氏曾考虑以“拳勇”为题，不过蒲氏最后选择的篇目却为“武技”。今书前目录故以“武技”为正题，面其下加“拳勇”以括号表示之。此外，“塞月芙蕖”原被划去改为“济南道人”，但作者最后仍圈定“塞月芙蕖”，而“济南道人”又未划去。故书前目录处理方法同前。

三、正文篇目前有上下二题，上题已被墨笔划去，书前目录则以下题为正目，上题移至其后并加括号表示之。如“捉鬼

射狐”与“李公”为此篇上下题，“捉鬼射狐”虽为蒲氏原拟题，但已划去，故以作者最后所定题“李公”入书前目录，而“捉鬼射狐”加括号置于“李公”之下。

四、正文篇目文字漫漶残缺，则参考有关文献加以校补，并在书前目录上以方括号表示之。

从稿本编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蒲松龄反复斟酌的严肃的写作态度。本书新编目录尽可能地反映这种情况，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书前篇目与《聊斋志异》诸多版本不尽相同，特别值得研究者参考。

清抄本聊斋文集

清抄本聊斋文集四卷四册　（清）蒲松龄撰。清道光间邢祖恪抄本。此本收录文章一百四十八篇，首次影印披露了一部分鲜为人知的文献。虽为蒲氏素日应酬文章之汇集，但是以其文字之“苍润”、“秀拔”，对于研究蒲松龄的生平、思想、艺术以及当时的风土、民俗，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虽说不是蒲氏的全部诗文集，但较之路大荒所编《蒲松龄集》既有补遗之功，又有很高的校勘价值。补充路大荒《蒲松龄集》所未收的一些篇目。现藏河南省图书馆。影印本卷首有周新凤前言。

邢保文、蔚人，即邢祖恪，号研香居士，堂名慎余堂，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

此书是一部颇为珍贵的罕见抄本，各卷俱题“淄川留仙蒲松龄著，钱塘蔚人邢保文钞”，每册书皮写“研香居士钞书”；卷首有抄者《叙》，末署“时道光己酉仲冬既望次日，浙江钱塘慎余堂蔚人氏邢祖恪识于苑陵官廨”。今据自叙称，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他在“平舆”（按其地清时隶于河南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

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故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邢氏抄本来自李绣圃，而李氏抄本则录于“召陵旧家”（按汉代设有召陵县，与平舆县同属于汝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郾城县东）。邢氏抄本在清代散出后，曾在陈留县等处流传（书上有“陈留县典史钤记”等印），建国后才由民间而入藏于河南省图书馆。

与路大荒所编《蒲松龄集》（简称路本）异同：

第一，作品多可补路本之遗缺。邢氏抄本四卷之中，未见路本收入的作品竟达十九篇之多。其中例如有《袁太君苦节诗序》、《谢钟圣舆以宪副公传见示诗引》、《送别明府张石年诗引》、《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花种诗引》、《同长人乃甫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诗引》、《挽毕载绩先生诗引》、《信侯瑞贺安子人泮》、《代人通用启》、《通用启》、《谢亲启》、《复启》、《为觉斯与苏贞下允启》、《为毕信老与友澄启》、《代螽斯与高梓岩启》、《与颜神赵启》等十五篇。另有四篇，今见《聊斋佚文辑注》（盛伟辑注）而路本亦未收（篇目恕不另列）。

第二，标题有不少歧异。邢氏抄本一百四十八篇文章中，竟有四十多篇标题与路本不完全一样。如邢抄本《读灌仲儒传》，路本作《灌仲儒论》；邢抄本《代韩栾州祭高少宰念东先生文》，路本作《为韩樾老祭念东先生文》；邢抄本《筠通启王》，路本作《代季男筠与王亲家启》。虽然大多数歧异只是文字上的详略不同，但也有的标题则邢抄本胜于路本。如邢抄本《鸳鸯谷募修桥序》，路本此篇题目却少一“桥”字。两题相比较，邢抄本似稍胜之。

第三，异文俯拾皆是，足资以校勘。在邢抄本中，几乎每篇文章中都能找到与路本不同的字词及句子。其中难免有抄书者笔误而造成的讹漏，但也有不少地方可以补路本之不足，这大致可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多出。如邢抄本《为毕通州与邹平张启》（路本作《又与邹平张启》）的文章开头，比路本多出“松柏垂青，石上之藤萝永系；婆娑结绿，月中之桂子长生。赤绳联两姓之欢，鸟羊系千年之好。喜来满座，庆却三生。恭惟台台”字句。正文中“识丰城之紫气”后，邢抄本又多出“西园才子，夜燃天禄之藜；南国词人，日吐元亭之凤”句。此文路本中“不佞老骥伏枥”句里，邢抄本在“不佞”后则多出“朱紫下场，清白令绪”等字句。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二）正误。在邢抄本《龙泉桥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此时骑者下，车者休，荷者弛其担，两岸行人蚁而集，虚尻蹲露草中，相望愁闷。”而在路本中，“虚尻”二字却变成了“虎尻”，联系上下文，邢抄本似乎更为精当。

邢抄本所录的一百多篇文章，不但在篇目上可以补路本所遗缺，同时其大量存在的异文也为《聊斋文集》的校勘提供新的文献依据，显示其珍贵的版本价值。我们相信，今将此道光间邢抄本《聊斋文集》列入《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影印出版，必将有助于推动蒲松龄及其作品研究的深入开展。

影印说明：

原抄本各卷卷首有目录，但无全书总目。今据原书内各文的原题而重新编制了总目，置于全书之前。

原书各卷前目录与正文内原标题有时并不一致，所编总目乃一一依正文中的原标题列录。如：卷一卷首原目《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花种诗引》，今所编总目乃据文内原题改作《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诗引》；卷二卷首原目《代葛千总募关帝庙工程序》，今据正文改作《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卷三卷首原目《祭梓桐文昌社文》，今据正文原题改作《祭梓桐庙社文》；卷四卷首原目《为燕及沈兄邀客小启》，今据正文原题改作《为沈燕及邀客小启》；卷四卷首原目《祭檀斯文》，今据正文原题改作《祭李檀斯文》；卷四卷首原目《张视旋悼之诗题词文》，今据正文原题改作《张视旋悼之草题词》等等。

各卷卷首目录有时与正文顺序有颠倒。如卷一原目《袁太君苦节诗序》在《袁愚山师服考序》之后，但正文将此文排在卷尾，今编总目依原书正文顺序过录之。

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

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　（清）允禵撰，吴丰培编。本书是一部有关西藏的重要史料。允禵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康熙五十七年（1718）西藏遭准噶尔部入侵，他奉命率领满、汉、蒙大军驱逐侵略军，重新整顿藏政。此书详尽记述其前后经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影印书后有吴丰培后记。

清康熙帝雄才大略，为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杰出者之一。他一生奋发有为，不仅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尤其重要的是维护并大力推进了祖国的统一，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抵御外侮，保卫疆土，安定边疆，为现代我国版图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许多民族地区的措施，尚足以启迪来者。仅就西藏地区而论，继承了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入觐以后的民族宗教政策，使西藏地方政权逐渐受命于中央，达到融洽和服从。西藏受到分裂势力侵扰，康熙帝主张“乱则声讨，治则抚绥”，“安宁百姓，保护地方为先”。不惜重兵救援。采取缓进政策，以求实效。

当时藏族地区行政统治权，封给早已归顺了清朝的蒙古和硕特领袖固始汗。固始汗的继承人拉藏汗与地方政府中掌权办事的第巴桑结嘉错发生了矛盾，桑结嘉错便暗中勾结蒙古准噶尔部，以谋驱逐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的势力。时五世达赖喇嘛

逝世，第巴桑结嘉错秘不发丧，又与拉藏汗交恶，终于被拉藏汗所杀，于是拉藏汗便主持藏政，民心浮动。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派了侍郎赫寿（后升为理藩院尚书）到西藏去，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也就是首次派员直接管理藏政），五十二年（1731）派使入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也是安定藏族民心的措施。可是在五十六年（1717）蒙古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台吉策零端多布率兵六千绕戈壁，逾过阗南大雪山，穿腾格里（天湖）突袭拉萨，围布达拉宫，杀拉藏汗，囚禁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喇嘛伊喜嘉措并大肆摧毁寺院，杀害无辜，西藏各寺院的金银财宝被其劫掠一空，捆载而运往伊犁，使西藏社会陷于生产停滞，人民则处于灾难之中。清政府派了将军额伦特等率满汉兵数千人自西宁分兵进剿，会于哈拉马苏河，被准噶尔军所困，相持月余，粮尽食绝，全军覆没，因而威胁到四川、云南、青海的安宁。故康熙帝不顾朝臣的路途艰险出兵不便的保守主张，毅然在五十七年（1718）任命其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汉蒙三军集合于西宁，汇合青海王公台吉的兵力约二万余人，分为三路进军，适第巴阿尔布巴也来投奔，又配合了反抗准噶尔的将领康济、颇罗等，终于击败准噶尔侵略军，将其驱逐出境，平息藏乱，并拥护藏族及青海王公公认的达赖呼毕勒罕，护送他回藏坐床，正式册封为达赖喇嘛，派兵驻藏，加强了藏族人民对于清中央政权的向心力。

此稿即允禵办事的奏疏，共二十卷，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起至六十一年（1722）十月止，连续四年，内容极为重要。包括允禵受命后出征前之准备，行军路程和驻地军

需的供应，以及驻军西宁与青海王公会盟，共议进军，调集兵马粮银，护送达赖喇嘛进藏等各项事宜。其中特别要件，乃进兵之时，遇到准噶尔部对峙，青海亲王罗布藏丹津竟束手旁观，拥兵不前，继又让其母福晋以年老怀念独子为藉口，一再请求调回青海；以及罗布藏丹津收留准噶尔逃出人员，唆使他们不要归降清军，种种行为，足见其早怀异志，故来年即行叛变，投奔准噶尔。这些情况，均为其他史料所未及，则此稿之重要，极可珍视。当时军事指挥均操诸康熙帝之手，允禵奉命惟谨，观此奏稿，不厌其详，遇事缕析奏报，足见其深得康熙帝的欢心，委以如此军事重任，世传有传位之说，未尝无因吧。

此稿全是满文，原存于北洋政府的蒙藏院，经该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命该院翻译科派员译成汉文，当时前清进士、北大教授吴燕绍先生就在该院工作，素研蒙、藏、维各族历史，广事收集有关资料，亟出资请人抄录全份。原拟付印，奈译文非出一人之手，人名职称地名均前后分歧，又译者大部分汉文文笔极差，文意倒置，主次不分，竟难读顺，久存书夹，已逾六十余年。他的儿子吴丰培先生介绍内容和史料价值，后又将译文汰其重复，保留原意，统一了人名、官名、地名，文前摘录事由，以合乎奏疏体例，每篇拟目以例检用书，前加编目录和著者小传，穷年余之力，始完此稿，约计二百五十余篇。满文原稿尚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

吴丰培先生在序言中就此书作了以下说明：

一、行军前派员入藏。清军未出发前，曾派有主事瑚毕图入藏，与准噶尔部侵藏军事首领策零端多布会谈入藏事宜，为

他书所未记。

二、联系班禅额尔德尼。准噶尔部侵藏抵达拉萨后，囚禁了达赖喇嘛，而对于五世班禅罗桑益喜颇为尊崇，策零端多布曾数次去扎什伦布寺拜见班禅，有意请其来拉萨主持藏政，班禅也与他保持一定的联系。后来班禅之弟及二侄被杀，班禅极为忧闷，而清军也迭次派员与之拉拢，宣言使他坐高床，命新封达赖尊之为师，这是对于准噶尔部的政治措施，这些史实即使最近出版的《班禅额尔德尼传》极为详备地述说班禅各世的历史经过，也未能如此奏稿中记载的详细，似可补该书所未备。

三、第巴阿尔布巴之投清。第巴阿尔布巴于准噶尔部侵藏后，曾委以要职，办理军事钱粮，后来突然投向清军，原因不详。通过奏稿提到阿尔布巴与新达赖之父索诺水达尔扎有甥舅关系，故佯称已死，密投清军作为行军之向导，使清军顺利进藏，也是关键之处。就以上数则，均属这次进军的主要问题，为其他史籍所未详者。例如《圣武记》为清初武事详尽之作，而对此次战役，仅有数行记录，远不能说明此役的始末。而此稿为第一手材料，虽不免庞杂重复，而许多内情均能述及，其史料价值，固在于此，披沙拣金工作，将有待于读者。

小学稿本七种

小学稿本七种　（清）戴震、刘清源等撰。此书汇集一批颇具学术资料价值的稿本、抄本和批校本。其中有些著作未付剞劂，甚或未见著录，鲜为人知。今将有关训诂四种，音韵一种，文字二种，七种汇为一编，题名《小学稿本七种》。原稿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影印卷前有阳海清前言。

《经雅》不分卷，（清）戴震撰，著者手稿本。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乾隆间著名学者。少从江永游，于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原本；精研汉儒转注及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其性耿介，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闭户著述不辍。年二十九补诸生，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于乡，屡应殿试不第。四库开馆，荐充纂修，赐同进士出身，授庶吉士，以劳卒于官。东原学高天下而不好为人师，故著其弟子籍者无多，能传其学者惟有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三人。其著述甚富，遗稿多存曲阜孔继涵家。继涵拟尽刻其书而未能，仅刻成《戴氏遗书》十五种。清光绪中，孔家所藏书稿尽出，此稿亦在其中；先流于潍县高氏，复归武昌徐恕，20世纪60年代由徐氏子女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

此稿无前序后跋。题名《经雅》，因系仿《尔雅》体例，取

六经中鸟兽虫鱼之名，汇参先秦诸子、汉魏古籍及其传注，辨释其古今雅俗之名及与《尔雅》之异同。全书分为《雅记》、《经雅》两大部分，未标卷次。《雅记》为“释兽”、“释畜”两篇，《经雅》为“释鸟”、“释虫”、“释鱼”、“释草”、“释木”五篇。其中释虫、释鱼两篇分别列有子目，他篇则无；释草、释木释两篇于条目和异名下有反切注音，而未标引出处；其他各篇则一般均有出处，而无注音。故全书虽已形成基本格局，然其体例尚未臻于完善。底稿以正楷书写，字行间又作了较大修改，条目亦有增损。惟改订之字体为行草，某些文字较难辨认。书中钤有“南洲”、“继涵”及“翰生”、“翰生秘籍”、“潍县高翰生藏经籍”、“故才高者宛其鸿裁”诸印。

《字雅》（存卷五至六），（清）英浩辑，著者第七次手稿本，徐恕题识。

英浩，高佳氏，字慕纯，号养吾，晚号人海拙叟。清满洲盘平（今属吉林省）人，隶镶白旗。官仪司笔帖式。生卒年无考，据稿内浮签，推其八十一岁作古。

此书系解释字义之训诂专著。书衣题“字雅第七次稿存五至六”。卷五“辰集”，为曰、日、月、木、欠、止、歹、殳、母、比、毛、氏、气部，共收字三百七十七个；卷六“巳集”，为水、火、爪、父、爻、爿、片、牙、牛、犬部，共收字三百三十六个。辑者于各字之下，分别引用《说文》、《尔雅》、《广雅》、《埤雅》、《集韵》、《山海经》、《洛阳伽篮记》、《水经注》、《方舆纪要》等著作并参以己意，释其字义。

孙殿起《贩书偶记》收有《字雅选文》，实即此书。孙氏谓“辑书自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六年，共计二十一年方成一稿

本，何如是之难也”。故此稿虽仅残存二卷，且并非定稿，亦弥足珍贵，可窥该书之一斑。

《操风琐录》四卷，（清）刘家谋撰，（清）谢章铤手抄本。

刘家谋（1814—1853），字仲为，一字芑川，福建侯官人。侍御陈寿祺掌教鳌峰书院，家谋曾从之游。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于乡宴，累上春官不第，以大挑得教谕，初任宁德，继任台湾，四十卒于台湾任上。著有《外丁卯桥居士初集》、《鹤场漫志》、《海音》、《东洋小草》等。此稿为训释福建方言之专著，前有道光二十五年“自叙”。作者认为“风所自也并及方言，方言者风所存以备采也。”于是稽核群籍，对所采录之闽地方言予以注音释义，撰成此书。

抄写者谢章铤，字枚如，清光绪三年进士，不殿试而归。大吏聘为致用书院长，著有《赌棋山庄文集》等。章铤不惟手自抄录此稿，并分别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十四年（1908）为其作序、题跋，对此书之得失言之甚明：“昔杭世骏游闽，著《榕城诗话》，讥闽人为‘鸟音禽呼’（四字本魏收《魏书》），诚以此示之，当爽然自失也。”“芑川此书尚有散漫处，亦有错误处，尚须整理。余曾指以问芑川，芑川曰然。”（见《序》）

《湖北方言》二卷，傅廷仪撰，民国间稿本。

著者生平事迹无考。此稿版心印“湖北通志馆稿纸”字样，知其为民国间拟修省志而作。全稿计收“么事”、“腌痴”、“放谝放赖”、“伙计”等八十多条湖北方言词汇。各词均予注音释义，并引用群籍进行对比，以助读者了解鄂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系随得随录，排列无序，当属甫

克未竣之稿。

《音韵学稽古录》 一卷，（清）刘传莹撰，著者手稿本。

刘传莹（1817—1848），字实甫，号椒云，别号通眉生、通糜生，湖北汉阳人。二十岁以举人官国子监学正。与梅正亮、曾国藩等以文学相切蹉，攻读古文诗词。凡字书音韵、天文算书、古文家之说皆刺得其大旨。著述甚富，多未刊刻。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十一岁病卒。方宗诚为其作传；曾国藩为之作墓志，并将其所辑《孟子要略》校刊行世。曾氏于墓志中论及传莹治学云："采名人之长又与己所考证者杂载于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对照由其后裔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的二十六种二百三十八册批校本，与墓志所言一致。

此稿约写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全书分韵书源流、沈约韵、唐人用韵、唐切韵异同、韵论、等韵、三家古韵部分表等。作者对各韵作了简要介绍。如"唐人用韵"概括地介绍了孟浩然、杜甫、李商隐用韵之区别。"三家古韵部分表"是将郑庠六部表题于上方，将顾炎武十部表、江永十三部表、段玉裁十七部表对比参照列于下方，使各家之古韵分部异同一目了然。书末还对江有诰的《古韵标准》作了评介。

《识字璅言》四卷附**《辨字杂说》**一卷，（清）易本绀撰，清抄本。

易本绀，字眉孙，生卒年不详，湖北京山人，清道光间举人。专意纂述，张国淦所编《湖北书征》著录其书数十种，多未刊印，稿已散佚。其《一粟斋杂著》、《字辨证篆》、《伸古音表分配人声之说》较具影响。此或为稿本，因无确据，暂以抄

本视之。

此书厘为《辨貌》二卷、《杂论》一卷、《正说》一卷，附《辨字杂说》一卷，系一部研究文字的专著。《辨貌》主要阐述三十三种部首正书及某些单字之形体的本来面貌和发展变化情况，以纠正字形的谬误，并指出各种版本有关古字的流传及失传情况。例如从本部者，如冠、冒、冤、冥、幂；从勹变者，如军、冢、营、甍、甍；从网变者，如罙。《杂论》则从理论方面辨正字体，并以某些字体的变化来说明字形与音、义之间的关系，如“沈”之别作“沉”，“帐”之别作“账”，字形未变而字义已变等等。《正说》即僭正古人之说，将古人之说列于前，著者之说低一格列于后，共计僭正三十六个字。《辨字杂说》皆纬纡离合之说，本非论字，正文原无庸辨，然亦恐其惑人，故略正之以附，计二十六字。如“昌字：《玉海》改元，于是有离合之谶，如永昌、隆昌为二日。按：昌，《说文》从日从曰，非二日也。”

著者论说，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故此书有助于了解汉字形体变化之情况和汉字形、音、义三者之间发展变化的关系。

《凡诲书》十卷末一卷，（清）刘心源撰，清稿本。

刘心源（1848—1917）亦名文申，字亚甫，号幼丹，湖北嘉鱼腾云洲（今属洪湖）人。清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史馆协修。后任四川夔州知府，广西、江西按察使等职。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因病乞归，筑“奇觚室”居之。民国初年曾历任湖北临时议会议长、省民政厅长、湖南按察使、北京约法会议议员。心源毕生致力于金

石、文字、书法之研究，著述颇丰，有《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多种著作行世。

此书系“专为吾乡农渔工商而作”之课本，底稿题名《字串》。湖北省图书馆藏有两部著者手稿：一未署时，一成于宣统二年（1910）。此为清稿本，抄成于民国初年：小字为长沙易经翰所书，卷一各页之大字则为著者手迹。其余各页之大字空而未填，系我们此次整理时依《字串》影印移补；若《字串》亦无，则由我们另行查补。惟著者在清稿本上所书写之大字下方，还标有其篆书及行书，以明一字形意之变化，而《字串》则无，揣系著者暮年未及完成，留此憾事。

此书分十卷，卷一至六为内篇，卷七至十为外篇，字表一卷，计一百三十五章。共收五千字，其中除凑句偶用重文及奇体近百字外，“便于应用必不可少者”约三千多字；“现今物名方言之字”，约一千多字；“稍涉词章适于寻常书启之用者”，约千余字。每字均有注音，释义则用白话俗语，所采事实略古详今。各章之后有总序，说明本章文意及所用典故。间有插图，可加深读者对字义之理解。卷首有“例言五则”，详说编纂旨意，书之内容及编排方式；卷末为字表，并附蒙学单简不同字仿本，供小儿习字之用。

为帮助一般民众识字、用字，刘氏历数年之功，广搜博采，标音释义，纂此巨册，其意可嘉。作者系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对各字所作音、释，于今之治文字学者仍有裨益。

南征日记

《南征日记》九卷，又名**《援黔纪事》** 清人撰。稿本。从清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二十六日至乾隆二年（1737）六月止。详细地记载湖南将领出兵贵州镇压苗民起义的经过及其善后事宜，同时对诸将间的关系、治兵方法、苗民的风土人情等等也都有较详尽的叙述，颇有史料价值。此书从未刊印。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毛爱梅前言。

此书作者不详。按此书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七日记：先大人发九溪援黔师。九溪在湖南省西北部，清代自康熙时开始在此驻兵，作者当是出兵贵州的原驻九溪将领之子无疑。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修的《湖南通志》卷八十七原设九溪协副将条下注云：乾隆元年改协为营，副将为游击。其下列副将十人，最后一名为李椅，下注云："山东武进士。"九溪驻军改营以前，李椅是任副将的最后一人。接着在九溪营游击条下列九个人名，第一人为阮玉堂，名下注云："江南仪征人，乾隆元年任，有传。"查卷一百二十四"名宦"中的阮玉堂传记，但无出兵镇压贵州苗民事。九溪发兵往贵州事在雍正十三年，其率兵者似当为李椅。又由《日记》称发九溪援黔师者为先大人，故疑作者似为李椅之子。

雍正十三年贵州苗民叛乱，清政府派云南、四川、湖北、

湖南、广西等省兵汇剿，乾隆元年平息，实行改土归流。湖南九溪协将李椅，奉命率七协营兵进剿，此日记记其亲历之事，很有资料价值。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五册　（清）全祖望撰。此书揭示了全氏校《水经注》的真实面貌。今将全祖望的五校稿本及王梓材整理全氏七校本抄本，合编影印共六册，前三册为五校本，后三册为七校本及附录。五校本、七校本页次各自编排。书后附录全祖望跋文、函件与胡适信函手迹等四种。现藏于天津图书馆。本书卷首有陈桥驿序、谢忠岳影印前记。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一字谢山，世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雍正间举人。清乾隆初举鸿博。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后降为知县，遂愤而辞官不复出。为人有风节，博采诸书，尤以网罗文献表章忠义为事。家居后，修黄宗羲宋元学案。由于出身“郦学”世家，一生七次校勘《水经注》，是清代著名郦学家，对郦学研究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其五校稿本成书于乾隆三年，以赵一清小山堂抄本为底本而进行校勘。全氏谢世后，深藏于私人藏书楼及图书馆三百余年。到 1948 年，胡适见而称之为“天地间仅存之孤本”。七校本是未完成之著作，经后人王梓材整理。撰有《丙辰公车征士小录》、《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等。

全祖望晚年家境贫寒，去世后，其后人将其藏书连同书稿转售卢氏抱经楼。从此，其《水经注》手校稿本于私人藏书楼

沉睡几百个春秋。清末傅增湘为刚刚建立的天津图书馆（当时称直隶图书馆）购集图书，才入藏天津图书馆。因其书稿卷次颠倒凌乱，误以为残书，未加著录，又在书库中沉积几十年。1947年4月，胡适从重病卧床的傅增湘处，得知全氏五校稿本在天津，随即委托北京大学教授唐兰到天津图书馆商洽借阅。经馆长井守文同意，借出一阅。4月底胡适致信井守文，希望多借一些时候，作一番校对，并写一篇考证短文。1948年8月16日，井守文写信致胡适，催还图书。同年8月21日胡适回信称，该书“确系全谢山五校真本，已是天地间仅存之孤本了，拟写一长跋，请允许再留一二个月”。后来局势紧张，图书馆派员将书取回，不久胡适即飞离北平。

五校《水经注》稿本是以小山堂赵一清抄本为底本。赵一清，字诚夫，号东潜，郦学专家。抄本中有赵一清批校。胡适对此做了考证，并用赵一清的笔迹进行比勘，又请王重民、赵万里、袁同礼等做了比勘，认为确系赵东潜亲笔写定的真迹。

七校《水经注》是全祖望未完成之作。全氏仙逝后，书稿散佚。道光间，同里王梓材、陈劢据卢镐（月船）及林启成所藏之剪裂稿本，加以整理。抄录三部，一寄山右张穆（石舟），一存慈水冯云濠（五桥），另一部由王梓材自己带至京师，准备送广东刻板。王梓材未刻，而死于任上。七校本书稿由其子在匈带回家中珍藏。道光三十年（1850），王氏好友叶志诜曾读此书，同治四年（1865），陈劢到王家观书并带回家中。董沛（觉轩）访陈氏，见此书，乞分借数卷，随抄随换。但后遭灾，损失什之三四。陈劢又依冯云濠所藏本补其阙。

光绪十四年（1888），浙东兵备薛福成访求全氏校本，得董沛抄本，命书院学生以赵一清、戴震二本重加校订，由董沛总核，命梓成书。“刻竣，薛君将赴都中，急于印送，故未及细勘”。后经奉化孙锵校出错误千余条。

慈溪秀才林颐山“别为校本，旁稽抉引，纠正更多。然刊刻本指但期无失先生七校之旧，非与前辈为难也，故不暇他及云”（董刊七校例言）。读董刻七校本后，林颐山认为七校本是伪造的。清代学者王先谦相信了林氏的话，故编纂《合校水经注》书时，收录了当时著名学者所校刊的《水经注》成果，而惟独不收全祖望校本。并在《例言》中说：“全氏七校《水经注》晚出，浙中林颐山晋霞斥其伪造抉摘至数十事，顷岁刊行此编，一字不敢阑入。”因此，全祖望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七校本在光绪十四年由薛福成、董沛刊刻行世，但内容经董沛改动，已失去原书面貌。王梓材因此也蒙受“作伪之冤”。本世纪40年代，胡适又重提“作伪”事，并写了大量文章，指斥全氏七校本的《序目》、《题辞》是伪造的。但当他后来看了全氏五校《水经注》稿本时，五校的排序和七校的《序目》相同，才承认《序目》、《题辞》是真的，并承认《序目》是一个合理的新次序。不过，胡适因全氏的校注是在赵一清定本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又制造出“全氏袭赵”的疑案。

全祖望认为旧《水经》的序目皆出自宋槧，读者难于推按。全氏以四渎为纲，编一个新的序目（此书凡五校，乃为一目以序之）。五校稿本是全氏校后经过剪接而成，按新序目排列的。影印时按稿本顺序排列。目录中新序目下列出旧目卷次，以资对照。全祖望在该书首列参校诸书二十七种，后

题“戊午夏杪篁庵病翁五校毕漫志于首”。戊午当是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1），是时为三十三岁。书中凡赵一清批校皆改加（一清按），全氏另于天头、地脚、行间、题下加诸批注。有些地方写不下，便用夹纸条或另附页并贴于书上（此次影印时将这些夹条做了处理，在原贴条处注明“夹条1”，“夹条2”……，将夹条内容附在原册末）。

为了使全祖望五校《水经注》稿本重现于世，并展示七校《水经注》的原始面貌，今连同有关资料合并影印出版，以供郦学研究者参考。影印本附录资料，计收：

附录一，全祖望为《水经注》批校本及有关《水经注》而写的跋文。

附录二，全祖望致赵一清有关切磋《水经注》的函件。全、赵关系最密，经常切磋、专题讨论，互相利用研究成果。全祖望发现历代校本经注相混，他研究出区分经注的原则，马上告知在外地的赵一清。赵一清曾记载此事云：“（谢山）卧病中忽悟其义，驰书三千里至京师告予。予初闻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说，悉加改正。”从此全、赵二人用此方法区别经注，对后世影响很大。

附录三，张穆（石舟）关于戴、赵水经案的原委。

附录四，胡适向天津图书馆借阅五校《水经注》的有关信函手迹。

图书馆界老前辈顾廷龙先生，早在40年代就与胡适书信往来，研究《水经注》版本，一直关心全氏校本的研究。在续修《四库全书》会议上还谈及此事。当获悉全氏五校《水经

注》稿本影印出版时，欣然为影印本题写了书名。当代郦学专家、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曾阅览了五校《水经注》稿本，欣然为影印书作序。

安南纪略

安南纪略三十卷首二卷二十册　（清）方略馆撰。原书仅有抄本，从未刻印，为海内孤本。此据旧抄本影印。本书是清代乾隆朝所编方略一种，记该朝五十三年（1788）至五十六年（1791）四载援助安南国王黎维祈复位及敕封阮光平为王的经过，均为当时奏章和上谕，逐日排比，属于原始资料。对于事件原委、地理形势，记述较详细，有重要参考价值。现藏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本影印卷首有吴丰培序。

安南国的王位屡次易姓，自五季以来，直到清初七百年间，就有曲、矫、吴、丁、李、陈、黎、莫诸姓，互相吞噬，更替为王。到了清初黎氏为王，乾隆五十三年，其王黎维祈被其部下泰德王阮惠所逐，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派了两广总督孙士毅领兵三路：一出广西镇南关，由士毅亲自率领提督许世亨等一万广西兵出关为正道；一由广东钦州泛海，过乌雷至安南海东府；一由云南蒙自县莲花滩陆行至安南之洮江，二路为声援。主力攻克了谅山，过了寿昌江、市球江、富良江三处险要之区，直达其都黎城，使黎维祈复了王位。孙士毅得此胜利，轻敌不设防，在五十四年正月初一，军中饮酒作乐，而阮惠率兵大至，乃仓皇应战，众寡不敌，黎维祈带领家属先逃，士毅夺渡富良江逃入关内，桥断，提督许士亨、总兵张朝龙均战死，兵役挤

溺有万余人，尽弃粮饷、军械数十万，于是士毅被撤职，以福康安代之。阮惠诈，惧再被剿，送还遗留兵士，遣使一再请求投降，并自己改名为阮光平。乾隆帝以粮运艰难，须用民役十万，原计送黎维祈归回复位后，即行撤兵，可是士毅贪功，未即班师，致有此败，故不愿再行出兵，就应允了阮光平的请求，封他为王。他又力请在五十五年乾隆帝八旬寿辰赴京祝寿，乾隆帝素来好大喜功，最愿受人颂扬，就一再赏给他珍品，以示奖励。其实阮光平并未亲自来朝，而是派他弟弟冒名而来，以乾隆明察，福康安也很干练，未必不知，可是此书中只字未提。由于他自夸武功，将此役已列人十全，虽然蒙古、新疆等王公均来朝贺，而属国之君尚是首次，故任他冒名，不加挑明，也是他政治权术。黎维祈遁逃入内附，给予三品佐领，管理归来人员，成为一旗，以资安置。此书对于战争、求降、朝贺、设旗诸项，都据当时章奏、上谕按日排比，属于原始资料，并对于进军的地理形势有详细的记述，确为有用的史料。

乾隆帝对于封疆大吏很是严峻，如张广泗、纳亲都是亲近之臣，以金川战役失败，均正法军前，严惩不贷。而对于孙士毅丧师过万、粮械尽失的重大失败，仅夺爵职，不久又派为四川总督，如此宽待是有原因的：士毅浙江仁和人，《清史稿》有传，著有《百一山房集》。士毅久任军机章京，以廉洁著称，屡委疆吏重任，为汉员大臣中少有。屡旨嘉奖，称为汉大臣中佼佼者。而此次用兵，都是遵旨办理，若加重治，就显然是中枢指挥不当。士毅多次参与福康安军务，颇建功勋，与福康安交谊深厚，故为维护，不加参劾。又与大学士和珅友善，便有内援。故他多次担任边疆重臣，久而不替。

澳门问题史料集

澳门问题史料集　此书收集了清代历任两广总督那彦成、卢坤、邓廷桢、林则徐、徐广缙、曾国荃、张之洞等人关于澳门海防、贸易的奏牍，香山县丞张汝霖等人的有关澳门问题的史料。由南京图书馆将馆藏中稀见史料三十余种汇编成册。主要有：《澳门新闻纸》、《澳门记略》、《广东通志》、《广东海防汇览》、《中西闻见录》、《林文忠公政书》、《香山县志》、《澳门纪略》等。许多不著编译人，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未见著录。为关心和研究澳门问题的人们及专家提供一些可靠的史料。本书卷首有宫爱东前言。

卷一《澳门新闻纸》不分卷，不著编译人，清抄本，六册，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未见著录，原系两广总督邓廷桢之曾孙——邓邦述家藏书。

邓廷桢（1775—1846），清末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字嶰筠。嘉庆进士。1826年（道光六年）任安徽巡抚，1835年任两广总督。1839年与林则徐协力整顿海防，查禁鸦片。次年1月调闽浙总督。7月率军击退进犯厦门的英国舰队。10月受诬陷，与林则徐同被革职，充军伊犁。1843年释回，1845年任陕西巡抚。著有《双砚斋诗钞》。

新闻纸即报纸，澳门新闻纸系指澳门的报纸，该书是从

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间澳门报纸上摘译的有关中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及广州、澳门、悉尼、孟买等城市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大致按日期先后顺序排列，约有一百五十多篇译文，每篇多则三千余字，少则近百字，内容有一日一事或一日多事，也有多日一事或多日多事，有新闻报道或评论文章，也有夹叙夹议之文。邓邦述在本书后跋中称：此六册乃中国译外国新闻纸之嚆矢，疑是官中译笔，故间有批驳语，遇钦差亦抬写。因此书中虽未著编译人，但可推知是遵林则徐要求而译的清稿，并可从林则徐编译的《澳门月报》中得到论证。林则徐在《澳门月报·三论禁烟》中即引用了《澳门新闻纸》中第一册中间（新加坡七月初四）的内容，介绍了鸦片贸易的历史及现状，在《澳门月报·三论禁烟》中记："在1737年（乾隆三年戊午），带来鸦片不过四千余箱，前时鸦片准纳税进口，至1796年（嘉庆元年丙辰）才禁止，1836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又欲如前纳饷进口，奏而未允，其时已多至三万余箱。"而《澳门新闻纸》则是："1737年（乾隆三年戊午），带来鸦片不过四千余箱，至1837年，已多至上三万余箱，各官虽知，惟贪钱不理，前时鸦片准纳饷进口，至1796年（嘉庆元年丙辰）才止。1836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又欲如前纳饷进口，……"二段行文虽不同，但内容一样。

《澳门新闻纸》第二册中澳门10月19日新闻纸的译文："英吉利之外，米利坚销用绿茶最多，难以详计其所销之细数。"从《澳门新闻纸》行文的措辞及内容来看，是按日择译的，虽不及《澳门月报》的内容集中，但行文措辞较为准确。由此，足以证明《澳门新闻纸》的内容是林则徐编译《澳门月

报》时所用的第一手资料。不过从《澳门月报》的内容看，只引用了《澳门新闻纸》中的部分内容，没有全用。《澳门新闻纸》中未被引用的译文中，有的与鸦片有关，如在第三册澳门正月初四新闻纸中即译出有关报道我军民围困广州的夷人公司及会馆的情况，并在澳门正月十一日下篇新闻纸中又报道了伦敦对此事的反映："近来钦差围困外国人缴烟之事在七月三十日早上已到兰顿（伦敦）之因底阿好司（即东印度公司），都内各衙门及贸易与银店，俱有扰乱，……"也有介绍中国国情的译文，在第四册澳门四月二十五日中即有介绍中国当时军队及赋税情况，以及东南沿海及周围岛屿情况的译文；还有报道英国之事的，如第五册澳门五月三十日和澳门七月二十五日是报道英国王后婚配拨款及鲁衣菲力比王（即路易·菲力浦）每日生活情况的译文，又如第二册中澳门十一月初二则是报道英吉利女王宫内现设女官及俸银数目的译文；也有介绍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及一些新闻综述的译文，如第六册八月初一澳门新闻纸中即有二篇从腮呢（悉尼）报纸和一篇从佛兰西（法兰西）信上译出的关于考察南极的综合报道，在澳门八月十五日新闻纸还有关于考察北极报道的译文。故邓邦述跋中又称："彼时不独中国不知外情，即外人对中国亦极隔阂……然当时通晓西文者甚少，大吏已留心于此，犹想见老辈临事之不凡也。"由此说明当年林则徐不仅希望了解西方各国对中国及其禁烟的态度，也希望通过澳门报纸了解西方各国的国情和新闻，以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路。因此，此书的内容不仅成为中外互相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林则徐及鸦片战争的重要材料。从全书内容看，又反映出当时澳门在中外贸易、中外信

息沟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又是了解、研究澳门历史的珍贵史料，故全文影印。

卷二《澳门记略》，收录了清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二卷。此书是中国人第一部系统地介绍澳门情况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关于澳门历史的著作。

上卷由系统地介绍澳门地理形势、潮汐风候、兵守海防及海防形势图的《形势篇》和详细介绍澳门历史变迁、朝廷设官置守、推行政令、收取赋税、地租的《官守篇》组成。下卷《诸蕃篇》集中介绍了澳门的贸易、宗教、文化、风俗等情况，并附《诸蕃图》及《澳译》。不仅从形象上，而且从语言上介绍了西方文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内容，同时也为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完整，为管辖澳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也成为今天研究澳门历史的重要资料，因此全文影印。《澳门记略》二卷现存世有三种单刻本，最早刻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其本为最好，不仅内容最全，而且雕印精美。清嘉庆五年（1800）江宁藩署翻刻本，除较乾隆刻本少百余字的两广边督策楞等的奏外，内容是一致的，只是雕印略显粗糙。此次影印的是吉林市图书馆藏的光绪六年（1880）刻本，该本是仿刻嘉庆五年刻本，内容完全一样。

还有从道光、光绪、民国《香山县志》及《广东海防汇览》四书中选收的部分内容，系统地介绍了澳门名称的来历、其地理位置及其作用，并介绍了澳门被占的过程。澳门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西南的一个半岛，古称濠镜、濠镜澳、香山澳等。乾隆十年（1745）分巡广南韶连道薛温称：自香山县风楼岭迤南凡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为濠镜澳。《澳门记

略》称："濠镜澳之名著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环二湾规圆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澳焉。……其曰澳门，则以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澳门记略》的序称："澳门为香邑一隅，其地孤悬海表，直接外洋，凡夷商海船之来粤者，必经此而达，且有外夷寄处……唐宋以来，诸蕃贡市，领之市舶提举司，澳门无专官也。嘉靖十四年都指挥黄庆纳贿，移舶口于濠镜，岁输课二万金，澳之有蕃自黄庆始。二十二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人。"印光任在序中即以事实说明了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澳门的主权和管辖。

卷三清朝官员巡视澳门之奏疏与记略，主要是从《柔远全书》、[雍正]《广东通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清嘉庆朝外交史料》、《筹海初编》、《林文忠公政书》等六部书中节选出十篇清朝政府官员巡视澳门后的奏折与记略。如薛温的《澳门记》，查访得乾隆十年（1745）时澳门西洋人的户口，及叙巡视当时的澳门状况，特别从海防角度来巡视考察了澳门的地理形势。林则徐则在《会奏巡阅澳门情况折》中明确指出：澳门实为夷商聚集之所，其间华夷杂处，汉奸勾串尤多，若不从澳门清源，则内外线潜通，仍恐渐成弊薮。因此要加强管理。说明了在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认为澳门在海防上的作用较贸易上的作用更为重要。

卷四葡萄牙与澳门及中葡交涉，主要从《中葡外交史》、

《清史稿》、《平南王元功垂范》等十二书中选出一百二十一篇有关葡萄牙与澳门及中葡交涉的奏折、照会、条约等。《中葡外交史》、《清史稿》和《葡萄牙占澳经过》较系统地介绍葡萄牙殖民者通过行贿及武力来占领澳门的经过。其余百十篇电文、照会和奏折的内容既具体地反映了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中，葡萄牙殖民者企图占领澳门和侵犯中国主权及清政府反侵占和保护主权的斗争，也反映了因清政府软弱无能而导致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正式签订，使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殖民统治合法化，不过葡人虽获得了在澳门居住和管理的权利，但不得不承认澳门仍是中国的领土。

卷五英国与澳门及中英交涉，收录了从《海国图志》、《达衷集》、《清嘉庆朝外交史料》等十一部书中选出的六十多篇文章、奏折、夹片、书信等。系统地介绍了清政府及官员对西方殖民者百余年来企图侵犯中国主权，侵占澳门而挑起的各种事端的态度。

卷六其他国家与澳门，收录十三篇文章。由于当时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中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成为进入广州交易的必经之路。澳门又地处南海之滨，东北面与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相通，西南穿过马六甲海峡可进入印度洋，到达东南亚和南洋各国，又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转运站。凡此种种优越条件，引起了不仅是葡萄牙殖民者，还有英国及西方其他殖民者的浓厚兴趣，因而时时挑起各种事端，企图侵占澳门，侵犯中国主权。从这些文章、奏折、夹片、书信等资料中既可反映出英国及西方殖民者的野心和罪行，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的事实，为今天研究澳门历史问题提

供了珍贵的资料。

卷七澳门诗钞，收录的是《澳门杂诗》和《墨井诗钞》。从中不仅可了解澳门的地理环境、西方人在澳门的建筑艺术，也可了解一些有关澳门的典故。

古泉汇考

古泉汇考　（清）翁树培撰，刘喜海批校。此书向无刻本，是一部研究清代钱币学的代表作。历叙上古以来诸钱币的来源，凡古籍所载有关论述几乎搜罗无遗，还保存了失传的《永乐大典》中的古钱资料。据山东省图书馆珍藏影印。影印本卷前有奎虚书主前言。

翁树培（1765—1809）又名申锡，字宜泉、申之，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治经术，精鉴赏，长于考证、金石之学。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等。他是清乾嘉年间著名的钱币学家。于泉货一门用力尤勤，自九岁始即搜集古钱，数十年孜孜不倦，积古钱千枚。又遍览诸家钱志，凡古今泉学掌故，皆了然于胸。作者潜心此学数十年，探赜钩沉，融汇诸家，对传世古钱进行了系统的著录和考释，竭毕生心力成古钱学巨制《古泉汇考》。该书有“古泉学总汇”之誉。

《古泉汇考》一书作者生前未能付梓，但他携稿自随，不轻示人，即夜卧亦置枕畔，签改粘贴，不遗余力，直至逝世。作者无子嗣，去世后，其仆人遂将书稿转售于山东诸城人刘喜海（燕庭），喜海为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其古钱学之造诣与翁氏相埒，著有《古泉苑》。刘氏见《汇考》原稿已涂漶几乎不

可辨，遂积三年心力，校录正本，并请人抄成八厚册，装饰精整，并加眉批按语近万字，校正了原著的一些疏误，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刘喜海拟刻印未果而去世，《古泉汇考》之稿本及校录本亦随之散出。其校录本后为著名学者王懿荣所得，王氏批校此书数十处，并撰写了跋语。王氏死后，此书又辗转到安邱人赵孝陆之手，后归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翁氏之原稿本亦历经周折，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先是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曾于1933年向赵孝陆借抄一部，藏之馆中，并准备加以印行，并作跋纪其事云："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燕庭）《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巨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燕庭先生旧藏抄本，手自校注，拟刻未果，原书后归福山王廉生，庚子变后，天壤阁藏书散出，安邱赵孝陆先生收得此书，雅自珍秘，不轻示人。再三请求假录，贮之本馆，幸蒙允许。缮写半载始告竣事，刘批色墨一仍旧贯。日后如有机缘，当为印行，书此用当息壤。"不久日寇入侵，印行之事遂告中断。如今二抄本宛然俱在，惜已物是人非。

《古泉汇考》以钱币发展的历史为线索，以考鉴各种钱币的形制、文字、源流沿革为中心内容，全书分八卷，其前六卷以时代顺序依次为：卷一，上古至商周；卷二，秦汉附魏吴；卷三，晋至隋；卷四，唐、五代；卷五，北宋、南宋附伪齐；卷六，辽、金、元、明、清；卷七，外国及不知年代品；卷八，撒帐、吉语、厌胜之类。全书计三十三万余字。此书问世后，虽流传不广，却在钱币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清道光时学者倪模称其"足为考古泉之总汇"，钱币学家李佐贤谓其"蒐

罗宏富，可称大观”。

本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献史料搜集极为赅博。此书以钱币为纲，在各钱条目下，有关其源流沿革、历代考评著录、诸家收藏情况，“凡见于载籍者，一篇一句，罔不详究异同”，其搜罗之勤，取材之博，远远超出前人。如卷一“赤侧五铢”条下，作者引用了《史记》、《汉书》、《通雅》、《钱币考》、《刘青园札》、《日知录》、《本草纲目》、《文选》、《金薤琳琅》、《猗觉寮杂记》、《述异记》、《西江志》、《四川通志》、《江南通志》、《明诗综》、《绳庵外集》、《存吾春轩集》、《质直谈耳》等近二十种文献中的材料。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供职京师，曾以数年之力，将藏于内廷的《永乐大典》中钱币一门之材料悉数抄录下来，并分别载于本书各条目之下，其时《大典》尚大部完好，今《大典》所存无几，而古泉一门保存材料丰富，全赖翁氏辑录之功。

二、考析精当，超出前人。作者并不满足于大量堆砌资料，而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每一种钱币进行详密的考释，于每条之下附加了大量的考证按语。其考析的内容相当全面，“凡泉之轻重薄厚，轮廓大小，一点一画，罔不析及毫厘。匪特辨其形也，兼辨其声；匪特辨其质也，兼辨其色”（鲍康语，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字、形、色、质、声五者并重，是此书考释古钱的一个鲜明特色。历来谈钱币者，赏玩家难免井蛙之陋，掌故家多有凿空之弊，作者则能兼擅二者之长，以目睹之实物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一方面能根据实物纠正前人成说中的大量谬误，另一方面又根据文献记载考知古钱币的源流、真赝。近人罗振玉云：“近来诸谱之佳

者，马若轩（昂）之《货布文字考》、蔡铁耕（云）《癖谈》，明于小学，马氏则兼明历史；翁宜泉（树培）《古泉汇考》明于历史；初渭园（尚龄）《吉金所见录》、戴文节《古泉丛话》、李氏《古泉汇》，精于鉴别。”（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罗氏这番话道出了《古泉汇考》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即善于寻绎钱币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在钱币研究中注重与文献、史事、典章制度相互参证、相互发明，从而提出了许多超迈前人的见解。它是清代第一部注重考订古钱币版别的著作，同时也解决了许多传世钱币的真赝问题。这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使古钱币研究逐步跳出了谱录之学的藩篱，走进了史志之学的广阔天地。当然此书也并非毫无缺点，如全书仅有考释而无图像，原钱之形状、大小、文字，研读者无从得知，而文字仅靠传抄者摹写，极易失真；征引文献虽称宏富，而于先秦刀布一类实物反有遗漏；其上古部分的某些条目仍沿袭前人陋见；又因系稿本，故征引材料错落较多，兼有信手所记、未行删定者。但这些微瑕并不影响其成为古钱币学的一部巨著。

宋会要辑稿补编

宋会要辑稿补编　（清）徐松辑，陈智超整理。《宋会要》是宋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原书已失传，但明初曾将其内容收入《永乐大典》各字韵中。清嘉庆年间，徐松又重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便是现存的《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曾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两次影印出版，成为研究宋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影印本《宋会要辑稿》并非当年徐松所辑全文，其中部分曾已被删落。其删落的部分，现藏国家图书馆，计有一千七百余页，约八十万字，相当于影印本《宋会要辑稿》十分之一以上。这八十万字辑稿有很高史料价值。其中十余万字为影印本《辑稿》所无；另一部分是复文，可以补校影印本《辑稿》之不足。现整理影印出版，定名为《宋会要辑稿补编》。本书卷首有陈智超整理说明。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十年二甲第一进士，年仅二十五岁。十四年入全唐文馆。十五年至湖南任学士，十七年谪戍新疆伊黎。道光十六年归授礼部主事。历官潼商兵备道，精于史事，尤长地理，好钟鼎碑碣文字。有《新疆识略》，又有《唐两京城坊考》及《后汉书西域传补注》等著作。

《宋会要》是宋代政府组织编修的一部典籍巨著，内容涉

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族、礼仪等各方面，向来被认为是研究宋代历史必须参阅的百科全书。但此书大概在明代中叶失传。幸好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其内容分类，按韵目收入书中。然而，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永乐大典》大部分被毁。而清代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稿本尚存。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在30年代主持将徐松所辑的宋会要影印出版，名为《宋会要辑稿》。至今《宋会要辑稿》已在海内外多次影印，成为宋史研究者的基本参考书。

但是翻开影印的《宋会要辑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空白处，上下文也不衔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宋会要》被收入《永乐大典》时，原著体系已被打乱。后来学者如徐松、缪荃孙、屠寄、刘承干、刘富曾等人都想恢复原来体系，而将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宋会要》资料加以整理，因而出现了徐松原辑稿（又称底本）、广雅稿本、嘉业堂清本等三种版本。现在面市的《宋会要辑稿》，就是根据删除后的徐松原辑稿影印，自然就出现前面所讲的出现许多空白、上下文不衔接的情况。而被删除的部分辑稿，半个多世纪以来，下落不明。陈垣先生之孙陈智超先生，继承家学，专攻宋史。1981年，由于收集《宋会要》的资料，他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两捆标为“宋会要”稿本的稿件。据当时图书馆同志介绍，这些稿件是1953年从北京旧书店来薰阁购进的。经陈智超先生一再查核，发现这两捆稿件正是被刘富曾删除的部分辑稿。其中约有六十余万字是复文被删落的，另有十多万字是今本《宋会要辑稿》所无，乃被刘富曾误作复文删落的。这部分文字的价值不言而喻。面作为复文被删落的文字，亦不失其价值。因为这

些复文虽有些是完全重复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之，这些复文既可作为校补之用，又可帮助我们了解《宋会要》原本的情况。

陈智超先生将其发现被删除的《辑稿》进行整理，影印出版，定名为《宋会要辑稿补编》。全书约八十万字，分上下栏，十六开精装一册，以与通行的八册《宋会要辑稿》配成一套。为了方便读者，《补编》编制了详细目录，目录所采用的标题力求符合《宋会要》的原名，按《永乐大典》卷数次序排列，同时列出参见影印的《辑稿》页码和位置；凡是从原本《宋会要辑稿》剪裁下来的条文，尽可能查出原剪裁处，在正文前后注明，并按该条文在《辑稿》中所在位置影印；若是复文，则在目录及正文后注明参见条文在《宋会要辑稿》中的位置。

《宋会要辑稿补编》加上原来的八册，读者可以看到比较接近徐松当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稿本原貌。但是，这仍不是其全貌，更不是原版《宋会要》的全貌。一、徐松的原辑稿经过几度易手整理，可能还有失落；二、从国家图书馆藏徐松原辑稿来看，还发现稿件天头有许多校补文字，而20世纪30年代《宋会要辑稿》影印本却将其全部剪除；三、前面提到缪荃孙、刘承干等学者整理徐松辑稿时出现过广雅稿本、嘉业堂清本等，这两种稿本虽然都来源于徐松的原辑稿，但审其内容与编排，却又各有特点；四、依现存的《永乐大典》中，仍可发现徐松漏辑的《宋会要》资料。

吴大澂手批本弟子箴言

吴大澂手批本弟子箴言十六卷　（清）胡达源撰。这是一部古人修身教科书。此书原刻本有著名学者吴大澂亲笔批语五百多条，近二万字。据湖南图书馆珍藏善本影印，影印本卷首有寻林前言。

胡达源，字清甫，湖南益阳人。清嘉庆进士，授编修，历官国子监司业、侍读左庶子、少詹事、日讲起居注官等。湘军名将胡林翼之父。著有《弟子箴言》、《妙香轩古文集》等。

吴大澂（1835—1902），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任编修、陕甘学政、太仆寺卿、太常卿、广东巡抚，光绪十八年任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请缨作战，兵败罢官回籍。吴氏工篆书，中年以后，又参以古籀文，书法益进，酷似李阳冰，又以其法作钟鼎文，为世所推崇。所著二十余种，多为金石书法之作，故人只知其为金石书法家，而不知其又为理学儒。

胡达源所著《弟子箴言》是一部修身之书，凡十六卷，分为奋志气、勤学问、正身心、慎言语、笃伦纪、睦族邻、亲君子、远小人、明礼教、辨义利、崇谦让、尚节俭、儆骄惰、戒奢侈、扩才识、裕经济。全书融汇先儒诸说，皆其心得之语。胡林翼尝追述其父为学，云："先宫詹（即指胡达源）之学由

宋五子以上推孔孟之旨，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际，始于功近以致远大。尝谓为学自蒙养始，故其教人必以《朱子小学》、《近思录》诸书为先，且力践诸其躬，卓然不惑。及林翼授书，则一一以是为教。”并自言其生平学术尚不足《弟子箴言》之一二。曾国藩亦曾说：“少詹君而纂《弟子箴言》十六卷，国藩实尝受而读之。自洒扫应对以及天地经纶、百家学术，靡不毕具。甄录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辞浅而旨深，要攻学者自幼而端其习，随其材之大小，董劝渐摩徐底于成而已。”

《弟子箴言》初刻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题闻妙香轩存板。后来，著名学者吴大澂读到此本，曾加大量批语。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北蒲圻人但湘良重刊《弟子箴言》。吴大澂为但氏重刊本作序，云：“余于同治壬戌人都应京兆试，得见此书于彭文敬公家，访诸石肆，竟少传本，乃约同人集资覆刻于吴门。视学关中，时曾以给诸生之好学者。光绪癸巳春，由长沙赴常德诸郡校阅营伍，道出益阳，谒文忠公祠，访知书板尚存言书院，省中各书院肄业生鲜知之者。余于公余之暇，时加省览，默诵而深思之，与三十年前之所见又有不同者，反之身心，证之阅历，验之风俗人心，言愈浅者旨愈深，玩索而有得焉。”但氏自序亦谓：“吴县吴愙斋尚书服膺此书，以为有裨世教，公余省览，有得则评识于眉端，大旨与宫詹之意互相发明，俾读此书者如瞽之有相，夜行之有烛，裨益后学盖非浅鲜。及官湖南，值尚书来巡抚是邦，以评本见示，取而读之则知尚书学问经济亦无不以此书为本。名臣勋业后先辉映。因取尚书评本叙而刊之，后之读者知文忠公渊源之所自，与尚书致力之所由。”由上引吴、但二序，可知吴大澂与

《弟子箴言》一书关系颇紧密。

吴大澂是亲笔批在《弟子箴言》道光十五年初刻本上的，所见批语凡二万余字，几可汇编为一小册子。藏本书后有萍乡文素松识语："民国十九年十月见吴愙斋先生手批《弟子箴言》一书于武昌书肆，前后凡五百条，几二万言，皆做人处世之道也，可与胡清甫（达源）先生《箴言》相媲美云。"

《弟子箴言》及其吴批虽是封建士大夫之作，其目的是为维护传统道德，但其中也有一些价值，从内容上来看如"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此富贵之所以不如贫贱也，若贫贱子弟而歆慕富贵，是谓之无志"等，至今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更重要的是，吴大澂作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亲笔手批也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与重要文物价值。

蒙古通鉴长编

蒙古通鉴长编八卷附编一卷　（清）王先谦撰。是元代蒙古部落入主中原以前的编年体史书，是一部未刊遗稿。此书仅存稿本八卷，藏于湖南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寻霖前言。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赐内阁学士衔。辛亥革命后，改名循，闭门著书。治学循乾嘉遗轨，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生平撰述、辑录、校勘之书达五十余种、三千余卷，尤以《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解》、《释名疏证补》、《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庄子集解》、《荀子集解》、《皇清经解续编》、《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最为学者所推崇。

《蒙古通鉴长编》稿本八卷，记述蒙古部兴起至元宪宗九年（1259）间的史事，即《元史》上所谓“蒙古国”时期，也就是《元史》前三卷所叙述的时期。该书前七卷以《元史》前二卷内容为纲，全部照录《元史》正文，大字占两行，顶格书写，以下辑录李文田《蒙古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何秋涛《圣武亲征录校正》三书内容及王先谦自注。李注、洪补、何校均用大字占二行，王氏自注则用小字占一行。第八卷定宗朝则全部照录《元史》第三卷内容。

王先谦有《元史拾补》十卷，稿本早已佚失。其《虚受堂文集》中尚存有一序。序言谓："《元史》疏漏讹舛，海内学者所共知而同病也。其中资参证者，惟《元朝秘史》、《圣武新征录》、《元史译文证补》三书。"《亲征录》有何秋涛校本，《秋史》有李文田注本，皆翼心孤索，大有助于考证。还说，《元史译文证补》则洪钧于光绪中出使西国，行拉施特所修之蒙古史、志费纪及瓦萨甫与阿黎之书、多桑之书、贝勒津之书，冶为一炉，大补缺佚。王氏自称："余究心元史，辄以此三书邻相比，名为《元史拾补》。"

《元史》成书仓促，失误甚多。其后有朱右作《元史补遗》、解缙作《元史证误》，惜皆已失传。钱大昕曾言："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间，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或以一人而分二传，或二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谬妄相沿，更仆难数。"清代对《元史》作正误、续编、补遗的专著层出不穷，如钱大昕《补元史氏族志》、魏源《元史新编》、何秋涛《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蒙古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新元史》、曾廉《元书》、胡粹中《元史续编》、汪辉祖《元史本证》等，这些书皆曾刊布行世。而王先谦《蒙古通鉴长编》稿本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影印后才公诸于世。

王先谦主要采用的《蒙古秘史》、《元史译文证补》、《圣武亲征录》三书都曾雕版行世，《蒙古通鉴长编》一书的影印价值所在除采用了以上三书外，其自注中尚引用了《通鉴辑览》、《蒙古源流》、《辍耕录》、《双溪醉隐集》、《西域史》、《阙特勤碑》、《草木子》、《周恭王元宫词》、《杨维桢元宫词》、《陈树通

鉴续篇》、《李廷机大方通鉴》、《李注魏书吐谷浑传》、《李注稗史汇编》、《元史语解》、《元文类》、《松漠纪闻》、《契丹事迹》、《蒙鞑备录》、《张德辉纪行》等二十余种。王氏将众书汇为一书，不仅有利于吸取众家之长，而且大大方便读者查阅、研究，补充《元史》记载的缺漏。如《元史》前三卷仅三万余字，而王氏《蒙古通鉴长编》则达三十万字。《元史》一卷《太祖本纪》第一句仅二十三个字，王氏引用众家之说加以阐述即达四万余言。其内容之丰富是每一种补修《元史》之书都不可比拟的。同时在编纂体例上，《蒙古通鉴长编》也是众多《元史》考补著作中的惟一一部编年体史书。

《葵园自订年谱》载有《元史拾补》十卷，而无《蒙古通鉴长编》，从现存《元史拾补序》可以看出，两书在内容、编纂体例上都极为相似，故又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同书异名罢了。其实《蒙古通鉴长编》所记仅《元史》上"塞外三宗"的"蒙古国"时期，不可能命名为《元史拾补》。王先谦或许原计划编纂一部完整的元史研究专著，在《元史》正文下补充《蒙古秘史》、《元史译文证补》、《圣武亲征录》诸书内容，但仅完成了《元史》前二卷所叙述的范围，即《蒙古通鉴长编》前七卷，故将已完成部分加上《元史》第三卷《宪宗本纪》编为一书，定名为《蒙古通鉴长编》。这也是《蒙古通鉴长编》详于前简于后的原因。因此可以认为《蒙古通鉴长编》即为《元史拾补》的前半部分，也可以从《蒙古通鉴长编》看出《元史拾补》的大致内容与编纂体例。

抄本历代高僧集传

抄本历代高僧集传三十八卷　（清）王先谦汇辑。稿本。从未刊印。此书是一部佛教人物大词典，收录自汉明帝至明代高僧一千八百三十人，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神异、感通、经师、兴福、杂科、忘身十一大类。资料虽辑自《高僧传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等书，但经王氏分类整理而重新编定，成为具有学术价值的佛学参考工具书。现藏湖南图书馆。影印本卷首有龙玉明前言。

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在洛阳始建白马寺，于是佛法兴焉。此后，史志文集便有诸名僧的记载。其或云僧传、或云僧史、或云记录，题名不一，而高僧传之名则起于梁释惠皎。《大藏经》中高僧传凡四部。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凡十四卷，此其一也。昔梁释慧皎搜检杂录数十家及前朝史书、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复加推广。分列译经、义解两门之法，分立十科：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所得二百五十一人，附见二百余人，凡四百五十三年；所载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天监十八年止。又唐释道宣“辄陈笔记、引疏闻见”，“南北国史，附见徵言”，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遂得续之，名曰《续高僧传》凡三十卷。其体例与梁释慧皎书大略相同，

亦分立十科，曰：译经、解义、习禅、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每科末又加扼要论述。所载始南朝的梁代（617），终唐贞观十九年（645），共一百四十四年。凡正传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厥后宋释赞宁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旨再续之，名曰《宋高僧传》，凡三十卷，盖又以续道宣之书。其门目仍旧。所录源流赅备，搜采不遗，所始于唐高宗时（649），迄于宋端拱之初（988）。凡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至明释如惺，于史志文集中辑录南宋元明护法者之大德，成八卷（亦有曰六卷），名曰《大明高僧传》。今见分列三门：一译经、二解义、三习禅。此为其四也。四传总谓四朝高僧传。

至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汇辑此四书，合而为一，名曰《历代高僧集传》。首列四书原序及目录，并《进宋高僧传表》和《批答》。又综合前人分科之法，重新确立门类，每门下分叙各僧之传，并对部分僧传进行删节。每传篇后，于各僧之朝代、释名、其传之出处、附见人名，一一标明。

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对我国人民的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生活习惯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作为佛教典籍组成部分的《高僧传》，不仅仅是一部传记书籍，而且也包含有内容广泛的重要史料。王先谦重新编纂的《历代高僧集传》向未刊印过，原稿共三十八卷，但藏本已有缺佚，所缺原卷五、卷六，以清光绪间金陵刻经处刊《高僧传初集》本之卷四至卷八补配；所缺原卷十二末尾，以清光绪间江北刻经处刊《高僧传二集》本之卷十八补配；所缺原卷十三，以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宋高僧传》本之卷四至卷七补配；所缺原卷十五，以清

光绪间江北刻经处刊《高僧传二集》本之卷十九至卷二十一补配。为了便于读者检索，又根据稿本所收一千三百六十四名高僧的实际排列顺序，重新编制成《历代高僧集传人名目次》置于卷首。

外国通鉴稿

外国通鉴稿二十二卷　（清）王先谦撰。稿本。王氏曾著《日本源流考》，其后又在《源流考》刻本基础上，增补朝鲜、琉球、土耳其、印度、暹罗、真腊、骠国、越南、马来亚、吕宋、爪哇等古代史料与条目，并改称为《外国通鉴》。此书对于研究中外交通以及中国周边的亚洲各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此书未曾出版，王氏手稿本现珍藏于湖南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董又林前言。

著名学者王先谦晚年自定年谱称，《外国通鉴》三十三卷，又其《虚受堂文集》尚见存序一篇。但是，此书一直不曾见到。建国初期，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长沙水陆洲造纸厂所收的大量废纸中抢救出一大批书籍，其中有王氏《外国通鉴》待定稿本一种。王氏此书稿本是在其《日本源流考》清光绪间刻本上改写的。其卷端原刻《日本源流考》卷一，王氏将前五字圈去，亲笔改题书名作《外国通鉴》四字，又删改日本条目，增添其他各国条目。故知此书即为王氏《外国通鉴》草稿本。

王先谦原著《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完整的日本编年史。王氏序言说：录日本开国以来迄明治二十六年癸巳（1893），采历代史传及杂家记载，参证日本群籍，稽合中东年表，为《源

流考》二十二卷。全书以干支、中国年号及日本天皇年号对照排列，汇纂各种中外史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再加上王氏自己的案语。观全书，其所引用的书籍除中国历代正史外，还有最早记载日本的《山海经》、《论衡》、《清波杂志》、《杜阳杂编》、《江南经略》、《筹海图》、《明会典》、《图书编》、《日本国志》，日本人史书《古事记》、《日本书记》、《日本史》、《日本外史》、《日本维新史》、《和汉年契》，以及西洋人编纂的《四裔编年表》等数十种。虽然还有一些重要的史籍遗漏，但是它汇集众书而成其为一书，采用编年体裁，在清末众多有关日本专著中可谓独树一帜，特别是大量引录外国史籍，对我们系统了解日本历史、中日邦交等都有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源流考》的基础上，著者王先谦除将书名改变为《外国通鉴》外，还将纪年改为只以甲子及中国年号为纲，小字增写其他各国的条目内容，其中一些国家如暹罗、缅甸等条目，经考证大部分来自王氏的另一部外国研究专著《五洲地理志略》。王氏在书眉及书缝中，还注“朝鲜一条”、“安南一条”等等，当为他以待定稿时拟增补其具体内容的提示语。从王氏手写的文字来看，这部待定稿本的内容除日本外，还包括了朝鲜、琉球、土耳其、印度、暹罗、真腊、骠国、越南、马来亚、吕宋、爪哇等国家或地区。

王先谦的这部稿本，有许多王氏的亲笔批注，由于字迹太小，不甚清楚，有些不易辨识，影印出版时据原书另录于书后是为注释，又一一注明对应页码，方便于参阅。

太平天国稀见史料

太平天国稀见史料三种　（清）周腾虎、徐僖撰。太平天国史料，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许多珍本传世。但周腾虎所著《餐芍花馆日记》、《秣营琐记》及徐僖所著《雪烦山房日记》三种原稿本，是难得的秘本。当时二人均人幕官府，不免对太平天国有污蔑之辞。然而作为目击史料，仍属非常宝贵。本书据苏州市图书馆珍藏本影印出版。影印本卷首有吴丰培前言。

《餐芍花馆日记》，内含《乐天居日记》、《达绸谬斋日记》两种。此书是记咸丰二年十二月至三年四月、九月至十一月，七年元旦至十二月十八日，八年九月至九年七月，十年至十一年除夕等时的日记，惜断续记述，并非全帙。

周腾虎（1816—1862），又名琰、天民，字甫，号抱一老人。室名餐芍花馆，因以名书。阳湖县（今江苏常州市）人。工诗善文，精于书法（此书为其亲草），行草兼优，擅长医理，到处为人诊治各种病症。游幕于江南各军，司折奏，初人钦差大臣督江南各军和春之幕，咸丰五年曾人曾国藩之幕，颇为信任，常与对弈不相上下，曾与之幕僚刘蓉、郭嵩焘相友善，故日记中屡述与名士之往来。十年又在浙省人浙江王有龄之幕，又奉命赴湘军求援，日记中许多大员，均姓而不名，所云何制

军即何桂清、王中丞即王有龄、德帅即德兴阿、副帅即张国梁。

此书的特点较多：一、记当时各地战争情况，胜败均载，虽未能全面，但对清军的腐败、战争不利，有很多揭露。二、著者本人往来于战火各区，所记为清军所占领之地，无不疮痍满目，人烟极少。三、交往官员较多，无不描写其才能，评其优劣。四、当时清军武备不修，敌至才思御，无事先防卫措施，敌未至即思逃，记杭州官员，常驻中，自无守土之志，敌至便易破城，烧杀虏抢，无不逞其所为。五、官吏之间，勾心斗角，见危不思救援，均保存自己实力，字里行间时显微词。六、对于曾国藩、左宗棠等则加颂扬，较诸胜保、琦善等固胜一筹。七、对于肃顺弃市，殊有民议，谓“辅政以来，交理大事，尚属有条不紊，亦无悖逆之事，加以极刑，不名过当。”也代表当时人一种看法。总之全书繁琐记述，不失为可读之作，而对于太平军杀人抢劫，极为憎恨，也属实情，目击身历之谈，尚可征信。影印时仍保留杂记无章、信笔写出的原样。

《秣营琐记》此书也是周腾虎所著，专记江南大营中诸事，较诸上述日记更有系统，可为三种史料之冠。首记营中文武官员之籍贯、官阶及升迁的经过，主要评论这些人的性格行为。虽属于个人评介，但颇有声色，对于当时江南主帅和春和副帅张国梁记述更为详细，认为二人均喜阿谀，恶闻直言，军纪并不整饬，军饷调拨不时，然不免仍有中饱，兵士得饷不及时、不足数，况致不能果腹，何以能战。而国梁有勇无谋，和春一切从其处理，虽与太平军相持七年，有遏止其北上之效，终以败溃而告终。国梁溺水死，和春也自尽。比诸曾左治军则远不如。此书详述见闻，共八十余页，而涉及内容较为丰富。实为

清军内幕要闻，与日记同观，更可互补不足。

《雪烦山房日记》，（清）徐僖撰。僖字梦白，江苏元和县人，明末徐如珂六世孙，少年即有文名。诗、文、联语，均清丽可读，字体也行草并佳，此稿系本人亲草，著有《雪烦山房诗稿》，《班翠传赞》并与其父隆邦辑有徐如珂《念阳公集》，清吴翌凤《卬须集》选有其诗。著者颇嗜书籍，长于目录学，偶得罕见之本，则加评论，又记考生诸事。记中又云："事能自足心意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也见本人的心境，属淡于利禄者。惜日记不多，仅存四百余页。

此日记系罕见手稿，记时为咸丰四年元旦至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七年元旦至八年九月三十日，正值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苏州一带之前，著者适在苏州盘查局工作。对于各处军事胜败，均据当时《邸抄》所记，现在《邸抄》已不易得见，得此片羽，亦觉可珍。对于大吏的调迁，亦有述及，所云吉中丞即吉尔杭阿，对其行为云："无日不看戏，极爱纸鸢，自行施放，爱国爱民者，果当如是邪！"对于大吏时加讥刺。

瀛环志略·航海琐记

瀛环志略·航海琐记　（清）徐继畬、余思诒编著。这是两种反映当时外国情况的著作。《瀛环志略》十卷，此书据多种外国地图和泰西人所著汉字杂书荟萃采择而成，依图立说，介绍当时亚、欧、非、美洲各国的情况。据 1851 年日本阿阳对嵋阁刻本影印出版。《航海琐记》四卷，当时清政府为建立北洋海军而向英、德订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轻型巡洋舰。作者受命前往护送四艘舰只返国。此书便是作者沿途所见所闻的详细实录，资料丰富而具体，真实可靠。今据所存罕见稿本影印。这两种书，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今珍藏于甘肃省图书馆。卷前有邵国秀影印前言。

瀛环志略十卷，徐继畬撰。是一部系统介绍外国地理情况的著作。成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自撰成至清代末年共刊行了三次，即咸丰十一年（1861）日本阿阳对嵋阁刻本，同治五年（1866）国内出版的重订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的石印本。本书据日本阿阳对嵋阁刻本影印。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又号松龛，山西五台山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授编修，迁御史。十六年（1836）出任广西浔州知府，不久升任广西巡抚。二十三年（1843）调福建，兼署闽浙总督。

徐继畬氏博学多闻，综贯百家，淹通七略，智绝舆图之学，是一位非常有心之人。他因公驻厦门，结识了一位能说福建话的多闻之士美国人雅裨里。雅氏带了一本绘刻极细的地图。徐氏按图钩摹十余幅，并请雅裨里帮忙译成中文。从此，他粗知各国之名，然而苦不能详。次年，徐氏再至厦门，又得到较雅裨里所携的要详密很多的地图两册，以后又购得若干种其他资料。从此，他便开始了《瀛环志略》的编撰工作。徐继畬氏“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所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经过五年的辛勤劳动，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全书终于定稿。《瀛环志略》共十卷，卷一至三世界舆图、中国舆图、亚洲各国，卷四至七欧洲各国，卷八非洲各国，卷九至十美洲各国。共有图四十三幅，图后有各国详细的文字介绍。全书内容专详域外，欧美各国尤为详尽。

道光十九年（1839），奉命赴广东查禁鸦片输入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派人译述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会》，并据此编成《四洲志》。二十一年（1841），林则徐委托魏源在《四洲志》和其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二十三年（1843）成书，共五十卷。二十七年（1847）增至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复增至百卷。《瀛环志略》始撰于道光二十三年，正是《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成书的那年。撰成于二十八年，仅比《海国图志》六十卷本晚一年，但比其百卷本又早四年。据此可知，两书基本上是同一时间的著作，不过《瀛环志略》较《海国图志》略晚，应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系统介绍外

国情况的第二部地理著作。

航海琐记，余思诒撰，刘瑞芬序。该书详细真实地记录了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从验收、回国到正式加入北洋海军的全过程，实是研究北洋海军发展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对研究19世纪末西方海军发展情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成书后从未刊印过。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著录，只有稿本和抄本存世。

余思诒，江苏武进人，曾任工部主事。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刘瑞芬出使英、俄，余氏毅然请从。十三年（1887）刘瑞芬改任驻英、法、意、比公使，余氏亦随同前往。在此期间，他人境问俗，凡所到各国的“山川要隘，政治得失，民生利病，共肆良楛”无不周览详究，认真记载。可见余氏是一位非常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的人。光绪十一年（1885）一月，北洋海军向英国厂商订造了致远、靖远两舰，又向德国厂商订造了经远、来远两舰，至十三年（1887）三月，四舰同时造竣。北洋海军派琅威理前往验收，邓世昌、邱宝仁、叶祖珪、林允升同往验收，刘瑞芬公使派余思诒护送四舰回国。经过五万里的航程，历时四个多月，至同年十月四舰行抵厦门。此时北洋海域已经封冻，奉命留在厦门操练。次年春天，驶抵天津，接受李鸿章验收。之后，旋即开赴辽宁渤海海域，正式加入了北洋海军行列。与此同时，余思诒被李鸿章留在天津听用。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都是两千吨级的巡洋舰，船体轻、马力大、航速高，是北洋海军的主力舰艇。六年之后，它们都参加了抵御日本侵略的甲午海战。致远、经远两舰于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十六日在辽宁大东沟触日本鱼雷沉没，来远、靖远

两舰于次年正月十一日在威海海域被日舰击沉。它们与众多的北洋海军将士一起，为保卫中国的海疆共同奏响了一曲高亢悲壮之歌。

余氏在护送四舰归国途中，每日在舰上与诸将士讲求水师操演各法，对军舰沿途停泊各埠的港口设施、海军装备、形胜风土均笔之于书，对各地的气候、经纬度等航海资料更是日有记录。光绪十六年（1890），余氏据其沿途所记整理成书，名之曰《航海琐记》，并请刘瑞芬作序。刘瑞芬在序中写道："庚寅（1890）夏，述职东归，行次上海，君邮寄此编，哀然成帙。每一展卷，如理旧事，如逢故人，絮语不休。盖此中语云，皆予与君所躬亲目击。或同舟连袂，或掉鞅联镳，险阻艰难，备尝况味，故倍觉其言之亲切。"刘氏还盛赞该书的真实可信，称其"言皆翔实，信而有征"。

为方便读者，影印时在卷前另加所编目录。目录文字乃据各该书的正文。

夷匪犯境闻见录

夷匪犯境闻见录六卷　清佚名编纂。1857年日本明伦堂汉籍活字印本。本书是清道光间东南地区官员编纂的一部有关鸦片战争的文献汇录。内容包括：上谕与大臣奏议，沿海数省及所属府县的公文，编纂者的见闻，英军与清政府中央及地方当局的往来函件共四部分。国内向无刊本，现藏辽宁省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吴亚民前言。

该书未题编纂者，并无序跋，因此作者姓名、生平无从稽考。但从书中记事时间看，仅知其为道光时人，鸦片战争期间住在苏州。从书中行文用语，推断他当时可能是某高级官吏的幕僚。由于能够接触参战的上层人士并得到相当信任，因而能接触极为机密的重要公文材料。作者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了解不同阶层人士对战争的看法，能够比较客观地搜集整理有关资料，为后人保留一份可信的战事的史料集。其中地方当局公文，至今不见其他典籍收录，资料尤其珍贵。此书约成于1843年后，稿本不久流入日本。此书流传面极窄，国内仅存三部，一藏于大连市图书馆（五卷，书名无“闻见”二字）；一为荣孟源藏书（六卷，为郑振铎先生所赠），两者俱为日本抄本。另一部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为日本明伦堂活字印本。明伦堂本是此书惟一的早期印本，胜于其他抄本。

《夷匪犯境闻见录》主要记录了鸦片战争时粤、闽、苏、浙等沿海各省的战事。鸦片战争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的清朝政府及各阶层人士以不同的心态经历这场战争。有人写下了亲历战争的所见所闻，有人事后搜集、整理、编纂有关资料，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这场战争，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亡佚散失，有的埋入故纸堆中不为人知。辛亥革命后，人们十分重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有关史料，如《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为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荣孟源先生所藏《夷匪犯境闻见录》日本抄本，经荣先生校勘后，曾有一少部分选刊在《近代资料》1956 年第二期上，既有外交文书、上谕、奏疏以及清政府中央与地方之间和发生战事的省、府、县之间的往来公文等等，也有作者见闻。《夷匪犯境闻见录》所记内容始于 1840 年英军向浙江省定海县知县下达战书，止于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所记多为粤、闽、苏、浙沿海诸省的战事情况。其中有关省、府、县之间的往来公文及作者亲历闻见，不见于其他记载，弥足珍贵。但非全貌。

《夷匪犯境闻见录》，一方面揭示了 19 世纪中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凶狠残暴，例如书中第一篇收录的英国海陆军侵略头目伯麦、布尔利致定海知县的战书以征服者的口吻，命令“定海并所属各海岛（与）其堡台，一均投降”，并限“半个时辰”答复，届时如“不肯投降”，“即行开炮轰击岛地与其炮台，及率兵丁登岸”。书中许多文书记载了英国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掳掠、烧杀及贩卖鸦片等种种

暴行和非法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政府及各阶层人士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态度。

此书不仅版本价值高，史料价值也具特点。影印本面世，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道光间广东防务未刊文牍

道光间广东防务未刊文牍六种　（清）顾炳章编纂。未刊文牍抄稿本。顾炳章在清道光年间出任广东试用通判时，曾勘建海防工程。他修建广州、九龙、东莞、虎门、三水等炮台以及省垣的未刊档案公牍文稿六种，详细记载工程建筑、炮台结构、地形地貌以及当时的兵力部署等，是研究军事史的重要文献。据广东省图书馆珍藏本影印。本书卷首有王洁玉前言。

顾炳章，号鉴堂，浙江盐海人，监生。道光年间以通判分发广东，补广州粮捕通判。历任海防、佛山、虎门同知等。升道员加盐运使衔，赏戴花翎。后因军需亏累罢官，卒于粤。

顾炳章曾为督办广东省城城工委员和防务监修委员，是修葺粤省城垣和勘建防务的主要官员，又是呈文的主撰者。他克尽职守，亲躬力行，出谋献策，业绩卓著，故而两广总督奏请道光帝奖励之。

道光年间，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为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积极修筑炮台，加强广东防务。他甚至在遭到革职后在留用广东半年多时间里，还多次视察海防和内卫，研究兵力部署等问题。这些，对于广东后来的防务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妥协派代表人物琦善、耆英继而督粤，迫于内外压力和军事需要，也不得不添置重火器，继续勘建和

整葺一批防务设施。

军事上的设防、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等文牍，向被视为重要的防务资料，非专门军事研究人员难得一见。但是，其中有些内容往往超出单纯的军事需要，而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情况，颇有历史参考价值。清顾炳章等编纂的防务未刊文牍六种，是当时情况的真实记录。全面收录了清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841—1850）十年间，广东军政当局有关外海和内河防务建设的呈批和信札。这些资料系统而完整，是研究近代广东乃至近代中国的珍贵史料。

本书编入《勘建虎门炮台等文牍》、《勘建九龙城炮台全案文牍》、《勘建三水县琴沙炮台文牍》、《勘建广州永康等炮台文牍》、《修粤省垣文牍》以及《外海内河诸炮台图说》等六种。文稿计有三百五十余篇，炮台及地形图三十四幅，炮台图说三十四篇。其中抄重者十余篇（因重文中个别字句稍有出入，故俱收入）。书中汇集了广东勘建诸炮台的情形和购置火炮、储备火药、营造兵房、添拨兵丁，以及修葺省垣、部署兵力等呈稿和信札。还有绘制从珠江口至广州等地，即从外海经内河至广州、佛山、三水、肇庆等地沿途两岸诸炮台位置及详细图说。在文牍中，还对所需工料、钱银与其资金来源，以及勘察、监修、验收人员等，都一一加以说明。内容详实、具体，文笔简练。

本书原为未刊文牍抄稿，小楷书写，工整端秀。为保持原抄稿的本来面目，影印时未作文字改动，只是加拟书名，并对后人所拟子目据内容稍加修订。《勘造省城北教场演武厅》一组文稿原编在《勘建虎门炮台等文牍》内，因北教场位于广州省城内，故现移入《修粤省垣文牍》中。

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

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　（清）佚名辑。此书大部分用版心镌“藏修书屋”的红格纸抄成，不题总书名与辑者，亦无序跋与目录，是同治光绪间即洋务运动时期的各种珍贵史料汇辑。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李勇惠前言。

辑者不详，但藏本题有“清末藏修书屋抄本”字样。根据《清人室名别号索引》，晚清间刘晚荣的室号为“藏修书屋”。刘晚荣，字节卿，广东新会人，主要活动时间在同治光绪间，为人朴谨，喜好搜集“卷帙不多，有资实用之本”。《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刘晚荣辑刊丛书两部：其一为《述古丛钞》四集，刻书时间分别为清同治九年（1870）、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五年（1879），版心下镌“藏修书屋”；其二为《藏修堂丛书》，刻于光绪十六年（1877），收书六集，版心下亦镌“藏修书屋”，由时任湖广总督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题写书签。但至今尚无确切资料证明两个“藏修书屋”的室主同为一人。

《汇钞》的主要资料来源：首先是具有中央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报”，民间报坊出版的《京报》，以及含有宫门抄、明发谕旨、奏折的《谕折汇存》。其次是廷寄上谕和密折密报（主要辑自各级官吏的专集）。再次是当事官员的公文、函稿，各类涉案人员的诉状及一般新闻性报纸的有关报道。

《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是一部分类辑录清代同治间有关社会、经济、贸易、政治、法制、吏治、军事、外交以及思想等方面问题的大型类书。所谓“洋务”就是“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此汇钞以二千万字的巨大篇幅分成五十八个专题，涉及当时社会诸多方面。每个专题的排列各以文献年月先后为序。书内有当时未向社会公开刊发的资料约占三分之一。《汇钞》不仅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军事、外交的必备史料，也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经济财政史、工业史、外交贸易史、华工史、法制史、宗教史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从未刊刻传世，亦不见各种书目记载，为学界鲜知之秘籍。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文献研究价值的近代史料集。详记各事原委、始末，有“覆奏轮船未可裁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坚持制造轮船事）、“洋务权舆论”（辑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始末）、“教务新闻”（国人对各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态度及传播情况）、“华工出洋论”、“洋土贷税单报单”、“孙观察条陈津防事宜”等。此书历经百余年第一次面世，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且稀见的资料。

影印出版说明：

一、重新确定书名。此书各专题虽有标题，但无总书名。藏者曾拟名：《清代中外法事汇钞》，入《史部·政书类·公牍档册类》。但因本书多为涉及洋务运动的各类史料，故经研究定为今名。

二、编定顺序及目录。此书原六十一册，毛装，排列无顺序。整理过程中，撤出内容重复者：（一）《与日本使臣往来信函》、《日本柳原来往信函》与《各使请觐抄案》中的一部分内

容完全相同，撤出；（二）《拐匪江柱案》、《日本秘鲁国来往信函照会》原有内容完全相同者各存二件，今则各存其一件，删撤重复各一件。有少量内容重复交叉的文献，仍按原貌保留下来。将全书按内容划分为国内、国际两卷，相关专题排列一起另加篇名。

关税篇（第三十二至三十七册），包括中国海关税则、通商章程、报单、税文体制等；

贸易涉讼篇（第三十八至五十一册），辑录中外贸易中发生的十余起诉讼的缘由、经过及处理结果等资料；

华工篇（第五十二至五十五册），包括有关华工出洋的社会舆论、日本秘鲁等国招工拐人案等详实情况；

教务篇（第五十六至五十七册），抄录各教教规及社会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看法。

此书原系抄本，行文中有数十条夹注浮签。为保持版面风格统一，今将夹注浮签移附于每册之后，而在原处则加【一】【二】【三】表示之。

北洋海军资料汇编

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六种　包括《丁汝昌海军函稿》、《贺总宪议海防折》、《北洋海军章程》、《海军大事记》、《海战实记》、《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现藏于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谢忠岳前言。

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海军部队，自光绪五年（1879）筹建，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正式建立，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刘公岛失陷后，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前后共二十一年。

《丁汝昌海军函稿》　丁汝昌（1836—1895），字禹廷，号次章，安徽庐江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卒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七日。曾参加镇压捻军，升任记名提督。光绪五年李鸿章以“于局英伟、忠厚朴实、晓畅戎机”，“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以资造就”。光绪六年，赴英带舰升旗回华，欧洲诸国始知中国亦有水师，群起而尊敬之。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任提督。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失败后，自杀殉国。《海军函稿》是丁汝昌从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年十月间与当局及僚属的信函底稿，共计三百八十余封，内容涉及北洋海军建设的各方面，是研究丁汝昌及北洋海军的珍贵文献资料。

《贺总宪议海防折》　贺寿慈，原名于逵，继名霖，字吉

甫、云艋，号赘叟，湖北江夏人。官至工部尚书。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清廷将总理事务衙门奏陈海防事宜并督抚、将军覆奏各折及张兆栋、李鸿章、丁日昌奏折，交付各有关大臣阅议。《贺总宪议海防折》乃贺氏对朝廷的覆奏。贺寿慈反对购买军舰，其奏折代表了当时守旧老臣反对洋务的态度。此件首次面世。

《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周馥记。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劻及李鸿章任会办，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任帮办。光绪十二年四月，醇亲王奕譞等由大沽口出海至旅顺、烟台巡视北洋海防，检阅了北洋海军各舰的会操、实弹演习。随同奕譞巡视的直隶按察使周馥记录其巡视经过，叙及北洋陆海军的建制与水师学堂等情况，对研究北洋海军有重要参考价值。

《北洋海军章程》 奕譞巡视北洋海防后，于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奏，称“京畿不详定章程，断非重诸永久”。即由周馥等参照西方近代海军制度，拟定中国近代首部海军章程，凡六册十四款，对船舰等级、人员编制、俸饷杂支、员弁升擢等作了明确规定。

《海军大事记》、《海军实纪》 池仲编。池仲，字滋铿，弱冠从事海军，由闽而沪而宁而津，与丁、邓、林诸公同役，欧西归而供职旅、威、芝（烟）、沪间者十载有奇，嗣去而宦粤亦近十载。政革后复隶海部又十余年。两书所记，大都为诸旧署案牍、奏章、电草，及海军各将士躬所见闻，对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襄勤公奏稿

刘襄勤公奏稿二十册　（清）刘锦棠撰。附有何维朴所撰传记。光绪刻本。本书汇集刘锦棠进驻新疆时期的奏稿，举凡经办之事，如内政、外交、一切奏报政府的奏章，是研究新疆的可贵资料。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本影印书卷首有吴丰培序。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是湘军将领，行武出身，随他叔父刘松山转战南北。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战殁于甘肃吴忠堡，锦棠代领其众击溃了马化隆、白彦虎等，左宗棠荐其能，以三品卿衔命接统老湘军，平了甘肃之乱，进而西征。时安集延帕夏阿古柏依靠沙俄帝国，久据新疆，宗棠帅师西向，驱逐远遁，南北各疆始得安定。沙皇俄军窃据伊犁，久而不退，外交折冲，有赖于曾纪泽。而左宗棠力主武力收复失地，自肃州移营，进驻哈密，为战争作准备，锦棠为之先驱，陈兵边境，耀武于伊塔诸地，威胁敌人，也就稍刹他们嚣张气焰，敌人才坐下来讨价还价，商订条款。虽偿付巨款，究能恢复国土，使伊犁永为北疆的门户，国防的屏障，不可谓非左宗棠、刘锦棠、金顺、张耀等之力而能之。记述新疆的战史，对于上述诸将，自不能湮没他们这一次的功绩。

光绪六年（1880）八月，左宗棠被召入阁，荐锦棠代之，督办全疆事务。他筹办善后，建军设政，修复城署，招徕民

众，劝农屯垦，创办教学。后来改设行省，他改命为第一任新疆巡抚，更改旧制，使新省二百年来由军政管理成为正规的行政制度。筹银请饷，练兵汰勇，是很费经营的，尤以撤销领队大臣、参赞大臣，使满员视为多年来固定的位置转入于湘军之手，虽军政大权操诸锦棠，而对于改革官制殊多阻碍，如奏稿中有与伊犁将军色楞额的龃龉，便是一例。汉满官员权利之争渐露端倪，锦棠后来的一再告病求退，未始不由于此。另外他在中法之战时，一再上疏，愿领八千陆海军迎战，未允。甲午之役，清廷也有令其领兵作战之意，终以病疫不克成行，而他抵御外侮之心是弥足称述的。但他终是封建王朝的官吏，当时的军阀，树立乡党，培植势力，独霸一方，不听部令，新疆地方多次兵变，足见他处理不当；且他镇压起义之军，歧视少数民族，他的功过是难以相掩的。

此奏稿起自光绪四年（1878）三月二十四日，止于十五年（1889）二月十五日刘氏交卸新疆之任，后附回乡后封爵颁赏、谢恩诸折，故最后到了二十年（1894）三月。他在新疆十二年从政的奏稿，内容所涉，可分为多类。一是新疆全区改为行省的经过，包括：分区设官，饷银的筹划，军队的改编和遣散，城署的建设，民族的安置，官员的委任，无不详载。一是经济方面，如屯田的布置，赋税的征收，官员的薪俸，当时的物价，银两与铜钱的折算，都属可据之资料。一是法律的特殊性和遣戍犯人的安置，一是对外交涉，收复伊犁，特别是沙俄依据条约，暂不纳税的规定，他们不仅将国外进口之税不缴，还要就地贩运，也谋求偷税，还勾引本地不法商人为之包庇偷税，说明沙俄的经济侵略无所不用其极。总之此书内容极为丰

富，十余年的新疆要务每多涉及，今当编纂新疆地志之时，许多资料可供选用。

原书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刻本，流传不广，《左宗棠全集》所载前部分，为同时之作，可与左集相衔接，互相参考。后部分乃接任之事，更属新疆要务，虽然部分奏稿已收入《新疆图志》中，此则为全豹，更属可取。

科布多史料辑存

科布多史料辑存四种　（清）桂祥、联魁、慧成、富俊撰。吴丰培编。科布多地处外蒙，介乎新疆和苏联之间，原为边徼要地，今虽隶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以前内、外蒙并称，《蒙古游牧记》、《藩部要略》等书对于该区史事古迹、隶属关系都有明确记载，可是以前该地文献、专著太少。编者将所藏清末驻科大员桂祥、连魁奏稿稿本加以整理，与旧抄本《科布多巡边日记》及《科布多政务总册》合为四种。影印本卷前有吴丰培序言。

桂祥科布多奏稿

旧藏稿本二册，不著撰人姓氏，书皮题为科布多奏折，书内有“奴才桂祥，拟于十月十二日自科起程，即赴乌里雅苏台署任”，此稿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所撰。

桂祥，满洲正黄旗人，光绪六年（1880）署理，九年二月调库伦办事大臣，十一年革职。此稿仅光绪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一段时间。清朝制度，凡边务大臣，如蒙古都统、伊犁将军、西宁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及驻藏办事大臣等，均由满、蒙人员充当，不得任用汉人。到了末年，政治腐败，边务废弛，赴边大员概多平庸之辈，毫无建树，只求瓜代，及期宦囊累累而已。清政府只是应付现状，谈不上防务措施。此

奏稿大都例行公文，其中练兵筹饷诸折，仅训练蒙兵二千，每年拨饷三万两，区区人力物力何济防务。可是强邻沙俄蠢蠢欲动。奏稿中记有俄官五员，随带各行匠艺百余名，携带眷口，由毕西克克地方前来，雇用特凌特人三百余名，在该处砍伐树木，盖房十数间，又派员要求贸易。履霜坚冰，已见行动，可是折中仅云“不动声色，严密防范”的空文，则边防又何堪问。但这些材料，了解该地情况，很有价值。

影印整理时，改正误文，增补人名，为科布多史料之首。

联魁科布多奏稿

联魁，一作连魁，字星樵，满洲镶红旗人。贡生，光绪六年任神机营委员，四品衔，兵部候补郎中。科布多办事大臣桂祥奏调赴科布多，委为文案处翼长，兼行兵部差事。后为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光绪三十一年命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八月十二日到达乌里雅苏台，三十二年八月调新疆巡抚，至宣统二年调回。其在科布多任所仅一年有余，此奏稿起自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讫于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日，则为在科任内的全部记录了。内容重要，有查覆参劾章京景善贪婪舞弊一折，涉及俄商与哈萨克牲畜买卖之事，殊为要件。并有前任参赞大臣瑞洵受贿之事。瑞洵为琦善之孙，崇厚之婿。稿中又有瑞洵携去粮饷处底册，如数寄回之片，说明当时边务大吏可以私自带走公文奏稿。清代各地衙署，档案管理制度不严，故任由本官带走，有些散失在外，后任欲查找旧档，往往不得全豹。

科布多巡边日记

此书为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撰。

慧成，字秋谷，满洲镶黄旗人，清道光十六年进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累官至东河河道总督，以河道漫口革职。二十八年赏二等侍卫充科布多参赞大臣，三十年调京，后官至闽浙总督。此书就是他初到任所，例应巡阅西路卡伦，因将沿途见闻，以成此作。文字雅洁，记景逼真，所经之地均蒙古史志所没有详细记载，所以更显珍贵。

科布多政务总册

此书为边陲名臣富俊撰，私藏旧抄本。

富俊，字松严，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翻译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升至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元年（1796）擢兵部侍郎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四年授乌鲁木齐都统。历任封圻，洁己奉公，所治安辑，尤于吉林屯垦之事，兴地利，豢众庶，民多便之，迄今被人歌功颂德。史常以富俊与松筠并称，为边陲名臣。盖皆殚心吏治不废著述者也。

科布多在外蒙古境内，乌里雅苏台之西，东北界唐努乌梁海，东南界札萨克图汗部、西南为新疆，西北为俄境。分为二盟，一是赛音济雅哈图盟，二是青色特起勒图盟，又有不设盟之部五旗十有一。清因其旧藩，重加封爵，设参赞大臣以统辖。其地处边徼之区，故素少志乘之作，嘉庆元年（1796）富俊来守此土，采录档册，编成此篇，仿《新疆事宜》一书，分为十目：城池，官制，外藩，事宜，仓库，军台，卡伦，屯田，游牧，牧厂。其体例虽依方志，而于风土民情尚未备录，向无刊本，故少流传。

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

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　（清）佚名撰。一部十册，红格大字清抄本，原为清内府档案。是稿传主为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间部分文武大员百余人，其中有议政大臣、尚书、总督、巡抚、将军、都统等朝廷重臣，是清代历史发展一个重要时期及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故宫皇史宬曾入藏，后乃散出。吉林省图书馆特藏部今藏。影印本卷前有贺达、高立前言。

《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书皮乃为内府特有的黄色，遇有皇帝称谓，上谕、上命等词语，均抬头三格书写，足具内府文档之特征。据最初收藏者“延侍老人”附记称：“始为内府档案，余昔在北京，曾见皇史宬所藏此类资料甚多，因清室无人保管，遂致流出，当时厂肆闻风争购者踵接，此盖其中之一耳。”看来，完整的《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确已散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篇。此稿诸目不载。其散佚部分如能同此书一样，陆续问世，对研究清史及其人物列传，将是一大幸事。

八旗，做为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清代历史上特别是其立国时期，曾起过重要作用。记载八旗历史、人物传记，官修的重要文献有《八旗通志》，雍正五年（1727）开馆编纂，至乾隆四年（1739）成书，分八志、八表、列传三个部分，所收事迹讫于清世宗朝。嘉庆元年（1796）续

修二集，只收乾隆一朝事迹。《八旗通志》以后再不见续修的记载。此列传档案稿所收人物中只有五人被收入《八旗通志·列传》，其他均不见记载。未收原因可能是：一，出于精选；二，当时未及立传。再与《清史列传》相对照，此内府列传档案稿百余人传记中，不见于《清史列传》者就有七十多人。《清史列传》是中华书局于1928年印行的，取材广泛，叙事详细，可谓清代人物传记集大成者，而有这么多人的传记未收入其中，原因可能是当时无法找到散佚的这部分。

《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是清代皇家之档案稿。故此，是稿的史料价值值得珍视。（一）此稿传记，所收的人物未见《八旗通志·人物志》的有九十五人，未见《清史列传》的有七十多人，足可补今见《清史列传》之不足。（二）可为清代顺、康、雍三朝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供重要的有价值的史料，诸如对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及其余部的进攻；平定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噶尔丹勾结沙俄发动的叛乱等，均有较多记述。（三）可补《清实录》等清史政书的缺失。传主就政务、军务重大问题写给皇帝的奏章，以得旨、上谕、七命等形式转述的皇帝的批复，几乎每篇传记都有此类内容，充分体现了档案稿的优势。此外，每个人物的升迁奖惩，均有详细记述，是研究清代职官制度的重要实证。

本书原装订成十册，现编辑分为上下二册，页码重新编排。原书第五册五十九叶后即六十一叶，但内容连贯，实属原编码有误。原书本无目次，为方便读者，特按原书顺序编辑了人名目录。

钦定台规

钦定台规四十二卷　（清）延煦等编辑。本书是清政府的一部法规汇编。全书汇集了清代历朝监察机关参与会审案件（包括辩诉、听断），监督各部政务（如考试、官吏任用与考绩、钱粮收支等），纠察宗室贵族、八旗兵丁，巡察京师与边区等方面的谕旨、政令以及都察院的规程等，为现代纪检、监察、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以及律师、公证人员提供重要历史借鉴，也为中国历史、法制史、政治制度史、清史、近代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今据光绪十八年（1892）原刊本整理影印出版。影印本卷首有陈金陵序言。

此书汇集了清皇朝的监察机关即都察院职掌事务有关的诏谕、奏疏、条例、规制等官方政令文书。我国封建王朝设有监察机关。秦朝执掌监察之责者为御史大夫，位次于丞相。两汉御史大夫（大司空）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东汉光武帝使御史隶于掌宫中图兰台，其长官为御史中丞，时称宪台、御史台。以后历朝多以御史台为监察机关，明初改称都察院。清承明制，于崇德元年（1636）设都察院，直至清朝的覆亡，是以清朝将都察院职掌事务的官方文书，称为“台规”。

清朝都察院对宗室王公、八旗将领、文武大小官吏、京师

各衙署、地方各级衙门先行监察权，与刑部、大理寺作为三法司之一，行使刑事审判权，并作为皇帝的耳目，职司言责，参与朝政大议，为封建王朝的重要机关。清朝统治集团鉴于明末党争之习，多次颁发谕旨，力戒宦官参与党争，为此严格规定，大臣子弟不得担任御史，以资防范。雍正元年（1723），又将监督京师六部，执掌封驳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隶于都察院，实现了台省合一，从而加强皇权对都察院的统治。

清代历朝对《台规》多有增辑、纂修。乾隆八年（1743）有八卷本，道光七年（1827）有四十卷本，光绪十八年（1892）有四十二卷本。光绪本刊载了太宗天聪至德宗光绪历朝的有开政令文书，为清朝最完整的《台规》。但光绪本刻印中有错讹之处，如第十三卷四页下第三行有："定稿选先送刑部堂官画题"续十一字，与第四行相重，据道光本改为"移会到日，满汉御史前往公"；第二十卷十七页上第五行"孔郎阿"，应改为"扎郎阿"。其他还有个别错讹之处，做了相应改正，不再赘述。为了阅读方便，做了断句，第一卷至第十八卷由杨益茂同志做了初点，余则全由陈金陵完成。

满洲编年纪要

满洲编年纪要不分卷附编一卷　（清）周沆编撰。清稿本，从未刊行。本书以编年体裁记述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间，发生在东北的重大历史事件。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王清原前言。

周沆，播州（今贵州省遵义）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本书采录《开国方略》、《东华录》、《实录》、《宣统政纪》及私家笔记，以东北地区军政大事为主，记载明万历至民国初年间近三百多年的史事。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及中日、中俄关系等等。1931年以前，周沆一直生活在东北地区，与张作霖家族有较多交往。他经历清末、民国时期，对东北近现代史多亲历亲见，对日、俄侵略中国东北的活动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张作霖父子的主要活动多有了解。自满族崛起于东北，进而入主中原，统一中国之后，东北被称之为“满洲”。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日趋重要。从古至今，有关东北地区的史学著作很多。除正史及各种志书外，还有许多专著如《满洲源流考》、《东北通史》等，此外还有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交通、民族等种类繁多的专史。但是《满洲编年纪要》是首先用编年体裁，记述东北三百五十年历史的。

《满洲编年纪要》的编辑有以下特点：

一、以地域为经，以时间为纬，全书分正、附两编，详细记述了三个半世纪东北地区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一书在手，即可系统了解三百多年东北历史发展的脉络。

二、该书以东北地区史事为主干，并叙述同一时期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相应重大事件。读者在了解某一时限内东北史事的同时，通过对比，可直观地了解东北与全国各地同期历史事件的因缘关系。

三、通编所征引的史料除采自《开国方略》、《清代历朝实录》、《东华录》、《宣统政纪》、《清史稿》等史书外，还从众多私家笔记中选取大量史料，弥补史书之不足。

四、将东北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从古代至现代）的事件，跨越省区，有机地贯穿起来编年记叙，是该书的特色，有利于读者研究阅读。

五、附编按年记述民国元年（1912）至二十年（1931）间的历史情况。对这一历史时间，在没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史书可资参考借鉴的情况下，作者利用采择当时的档案文献、新闻报刊等资料旁征博引编辑成书，是很不容易的。

六、此书仅存作者稿本，从未刊行。影印面世意义重大，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史学爱好者研究东北史、满族史、明清史、民国史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史料和工具书。

稿本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事略

稿本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事略三卷　附南岳倡酬集一卷、龙舟会杂剧一卷　（清）王船山著，康和声纂。纂者搜集王船山南岳诗文四百九十一首，自崇祯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按年编录，引申考证，篇末附案语加以考证。现藏湖南图书馆。影印本卷首有寻霖前言。

王船山（1619—1692），名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少负俊才，读书十行俱下。明崇祯末，与兄介之同举乡试。明亡后，归隐衡阳之石船山。著书授徒，成就甚众。卒后，学者称之船山先生。王船山曾自称南岳王夫之，又谓己"与岳患难，惟岳知余"，所以其著述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南岳的诗文。

康和声（1881—1952），字凤琴，号砚堂。湖南衡阳人。清光绪间秀才。民国时曾任教育部编审等。后归隐南岳，创建南岳图书馆，并任馆长。康氏一生治学甚勤，尤注重先贤文献的搜集整理；曾编纂《王船山先生墨宝四种》、《重订王船山先生年谱》、《王船山先生遗著遗墨叙录》等。稿本《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事略》便是其中的一种。

《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事略》共收文二十八篇，诗三百九十四首，词五十六首，共四百七十八篇（首）。卷首康和声《传

例》介绍王船山其人，阐述此书编纂内容及体例，说搜访所得的船山南岳诗文很多，计自崇祯壬午（1462）讫清康熙辛未(1691）凡五十年，“有纯属南岳本山者，有正气所系，不容不以广义及之者，兹谨按年编录，先提时事出处大纲及著作要目，而于各诗文词后，复挟隐钩微，引申考证，篇附案语，以示系统而期事实一贯，藉便观览”。书后又有《后序》一篇：“综核先生生平诗文，多述南岳，本标岳名，然观岳余一集，可资隅反，不有其正，何有其余，……时值强邻猾夏，亡国之痛，一寓于诗与文词。大抵诗意尚隐，而词意较显，文之得自原稿者，尤显而易见。惟词与文例不编年，诗虽大部编年，而不编年者尚多，今悉以意逆志，以事隶年，稽核致当，阐发爱国幽光，读者抚今思昔，三复兹编，激发无良，无忘祖国，共济时艰，而宏抗建大业，则得之矣。岂日多乎哉，岂日泛及乎哉。”

岳麓书社出版《船山全书》是王夫之著述至今诸版本中收录全、校勘精之书，但是康和声此书与之相比仍有自己特色：

第一，康和声将王船山众多南岳诗文重新按著述年月编排，每年先叙述王船山的主要活动，再罗列诗文，各篇诗文后再加案语。康氏案语或注明诗文出处，或阐明写作背景，或介绍诗文中人物地名，或发挥其中微言大义。康氏案语有的竟长达千余字。在全书中，案语达三分之二，大大方便了读者的研究参考。

第二，王船山自订诗文稿大部分未注明写作年代，康氏对此作了大量考证工作。如王氏生前《五十自定稿》中《重过莲花峰为夏叔直读书处》一诗，各本皆未注明著作年月。康和声考证王船山顺治九年壬辰（1652）有《过西明寺追怀悟一上人

示苍枝慈智》一诗，而西明寺在莲花峰南桐油岭，又夏叔直卒于顺治七年，其时王船山尚在肇庆依附桂王，次年才返衡阳。《重过莲花峰为夏叔直读书处》诗中有“凄断登临旧碧岑”，“云积步廊春袖湿，灯寒残酒夜钟深”之句，正好与上诗诗意相符，两诗均当作于清顺治九年。康和声的考证工作，大部分有理有据，但也偶有失误。

第三，补正了原本中的一些疏漏。如《岳馀集》中《玉门望狮子峰用旧作四韵》，康氏改“玉门”为“土门”；还考出“土门”在续梦庵附近，可据以望狮子峰。其说甚是，所以出版《船山全书》即据康本改正。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编刻的王夫之诗文集文字每多空缺，而康氏尽可能地加以填补，而所补之字也确有一定参考作用。

尽管康和声对王氏诗文的补字未能注明出处，考辨也难免有失误；但是他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编年，阐发诗文的思想意义，对于王船山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历朝折狱纂要

历朝折狱纂要　（清）周尔吉编。本书专讲中国古代的案件侦破和审理经验。它汇集了我国古代二百多例著名的疑难案件并加以剖析，分类编排。此书可为司法、检察、监察、公安、律师、法学教学研究人员的案头参考书。本书卷首有陈金陵前言。

周尔吉，湖南长沙人。年少时就留意古书记载和口头传记里的疑难案件，随手摘录，积二十余年，得二百余例。清朝光绪年间写成《历朝折狱纂要》八卷。按照当时的法律与习俗，分成诘奸、察盗、辨伪、理冤、判产、惩诈、感化、明伦八类，每类一卷。由于得到广东代理督粮道道员李瀛（湖南祁阳人，同治十三年第三甲第七十八名进士）的支持，以《历朝折狱纂要》之名，刻印问世。他们希望这部书的流传，能提高那时的办案问官的效能，虽不能使天下尽无冤民，而天下之冤民亦必自少矣。其用心颇为良苦。但刻印以后，流传很少。

刑民案件有着时代的烙印。今天影印出版《历朝折狱纂要》一书，希望能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但又不要泥古而不能今，守经而不达变。人民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保卫、纪检干部与律师，如能从本书的某些案例内受到启发，提高破案效率，减少冤假错案，做到明察秋毫，无错案，那就是本书的最大社会效益，也是人民的愿望。

袁世凯未刊书信手稿

袁世凯未刊书信手稿　袁世凯著。又称《洹上函稿》。原为红格手写本，上有袁世凯亲笔手批，装裱成十一册，是袁氏于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年1月—1911年10月）间被朝廷“开缺回籍养痾”，蛰居河南彰德城外洹水畔的洹上村时（其中1909年1月—5月寓居卫辉县），写给其亲友、故旧以及有关官宦的信函底稿。现藏于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谢忠岳前言。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81年投靠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出驻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因得李鸿章的赏识，升任驻朝通商大臣全权代表。回国后，于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时，袁氏因出卖维新派而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擢升山东巡抚。又以镇压义和团运动，旋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组建北洋六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北洋军政集团。曾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廷因出兵受挫，被迫诏袁复出。袁氏受任为内阁总理，乃挟迫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位。1916年复辟称帝，年号“洪宪”，但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同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至6月忧死。其后，由他生前所创建的武装政治集团

——北洋军阀仍统治中国达十余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清代光绪皇帝死后，清政府免去袁世凯的职务，命其“回籍养疴”。袁回到河南彰德郊外洹上村。此集是袁在此期间写给其亲戚、同僚、部下的亲笔信七百余通。涉及三百多人，反映了他与旧时僚属和地方官员所保持的密切联系，这些信件一面是表现了袁“与农夫为伍的田园生活”景象，另一面从与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张士钰等人的信件中显露出伺机再起的愿望。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一面和清政府谈条件，另一面通过亲信，秘密调集军队，准备“剿抗”。这些信件是研究袁世凯及中国近代史的珍贵资料，反映了袁世凯复出前夕的思想与活动情况，是研究这个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其人其事的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影印说明：

原件装订以时间为序。但疑二处有误，即宣统元年八月初十复凌福彭，误置于初九之前，今影印时已加调整；又，辛亥年“十月三日”复刘能纪，疑日期乃笔误，故未调整。这些信函当为幕友拟稿，故其上有袁氏手批。手批多在信稿红格栏外，由于受印制的板框尺寸之所限，今将有些手批相应移近框栏（个别手批字体过大，略加缩小），以利影印。还编制了目录。目录上的标题，基本上依原稿抄录，其中有些人名可考者，则在其字或称谓后加括号注明。原件无标题者，则在拟题下加“＊”号标明。

陶勤肃公新疆奏稿

陶勤肃公新疆奏稿　（清）陶模著，吴丰培整理。此书原有民国十二年铅印本，共为十二卷，包括陶模在陕甘总督、两广总督各任上之奏，流传未广。此书仅选其在新疆时期的奏稿四卷，用原式影印，并为断句。陶模清光绪十七年（1891）任新疆巡抚。在新疆五年，办事干练，应付有方，人称循吏。其治理新疆政事的重要经过，均载此书中，许多史事均为《新疆图志》所未载，确是新疆研究之要籍。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陶模（1835—1902），字方之，清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同治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甘肃文县知县，累迁至陕西布政使，光绪十七年升新疆巡抚，二十二年调陕甘总督，二十七年改两广总督，二十八年卒于任所。《清史稿》有传。其子保廉随侍人新，精于地理之学，沿途携书实地考察，以古证今，有《辛卯侍行记》六卷，成为新疆游记中极有价值之作，亦为传世名著。父子二人于新疆的政治、地理方面都有贡献。

新疆自清光绪十年（1884）成立行省，等同内地行政机构，设巡抚一职，总揽该省一切军事、行政，改变了由陕甘总督兼管的局面。第一任巡抚为刘锦棠，十六年因病请假回里，十七年由陶模继任。行省初立，规模草创，兵燹之后，疮痍未复，刘锦棠规划于前，陶模整顿于后，一武一文，均对新省有

所建树。

当新疆建省之初，政局未定，百废待举。内政则民族矛盾时常发生；外交则英俄交窥，边务紧张。模久任外吏，历任陕甘要职，邻近新省，而左宗棠用兵西北，力保其能，故他主持新政五年，颇有作为。现存这一时期陶模之奏稿四卷，重点在防御外侮，整顿内政，特别对于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极为重视。他主张“国之强弱视人才，人才不足，和与战均不足恃”。要“破除拘牵”，“以收实效”。“先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

清末的政局紊乱，捐官亦属败政之一。时汉民向当地民族人士放高利贷，竟有数月即本利加倍，盘剥之酷，比内地更甚，他奏请严禁，亦是其解决民族矛盾的一方面。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有此见识，也属不多。此稿中关于英军入侵坎巨提之事，颇叙原委，乃外交之要务，更是书中的要件。

明代宫廷杂录汇编

明代宫廷杂录汇编十三种　（清）张寿镛编，吴丰培整理。本书汇集明代十三种秘籍，大部分记载明代宫廷生活内容。书前撰有解题。此据约园抄本影印。影印本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张寿镛（1876—1945）字伯颂，一字咏霓，号约园，浙江鄞县（宁波）人，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多年，后任财政次长，主办光华大学，富有资产，曾将鄞人著作编成《四明丛书》八辑，为近代地方丛书之大观，民国庚辰，曾为官方收集图书，得见此书，录副以存。

约园传抄本《宝目堂札记》四册，内容为明代秘籍十四种。除李贤之《天顺日录》早已多次刊于《纪录编》、《胜朝遗事》等丛书中，其他十三种均前所未见之书。如李东阳之《燕对录》及伍袁萃之《林居漫录》，虽于《四库全书提要》曾加著录，列入集史类及小说家类存目中，而传本极少，其他如《经筵故事》、《经目诗始末》及《乾清宫牍》均记录了明代宫廷遗闻及经济史料，极为珍贵的。

此书共十三种，均为稀见之本。

一、《皇明帝后纪略》始德祖（即朱元璋之曾祖）讫穆宗（即隆庆帝），记其在位及生卒年。

二、《十二帝纪略》李维祯撰，维祯字本宁，京山人，隆庆二年进士，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余，召修《神宗实录》，故称史官，官至礼部尚书。此篇乃本朝人对本朝帝王评论，自多颂扬，然其亦有持平之论。

三、《承天大诰——大狩记》，此篇记嘉靖十八年嘉靖帝至承天谒祭显陵事。

四、《经筵故事》明初设经筵之制，使帝王得以接近儒臣，学习治国的道理，最初数代，尚能遵循此制，渐而御临日少。此书亦见明初之体制，到中、晚期政治紊乱，日趋衰败，帝王不学，亦明祚不永的主要原因。

五、《经筵日讲始末》，此篇记嘉靖、隆庆两朝经筵之事。

六、《东宫讲读》，简记太子时讲读故事。

七、《商廟看书》，颂扬洪武帝之勤政。

八、《永乐以后诸帝燕封》，多颂扬诸帝与大臣之燕封，均不著撰人。

九、《燕封录抄略》，李东阳撰，东阳字宝之，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弘治八年累进为文渊阁大学士，在朝五十年，清节不谕。此书多为弘治朝事。弘治不失为明代较为开明之主。

十、《林居漫录抄略》，伍袁萃撰，袁萃字圣起，号宁方，吴县人，万历八年进士，历官广东海北道副使。此书多贬斥当事公卿大夫，所载多朝野故实。

十一、《乾清宫膳》专记宫廷膳食物品数量和价格，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十二、《禊录》一，不注撰人，内容有奏疏、诗法对、田赋、草料等。

十三、《禘录》二，专记嘉靖朝事，较简略。

今见此传抄本，书法不俗，书更罕见，每篇末均有张氏题记。今加整理，除删去《天顺日录》外，其余十三种，重新按类排次。以原书名难于说明内容，因其中十种均录宫廷之事，故改名《明宫廷杂录丛编》，并于书前加编目录以及解题，考订作者和内容，以便检用，惟书中尚有缺页，无法抄补，只好存缺。

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

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　吴丰培、董盼霞、杜晓明编。清抄本。本书为清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十年（1884）之外交史料，据原清总署档案抄件三百八十四件影印成书。影印本卷首有吴丰培序言。

清代制度是：每一次军事行动结束后，必设立方略馆，将此役的始末、政治措施编成《方略》，以夸耀其武功，垂训于后世。自编纂《平定三逆方略》开始，先后编就二十余部之多，成为史料的重要之作。自道光以降，英法帝国主义以炮舰攻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开辟了通商口岸，于是，丧权辱国的外交失败接踵而来。但清政府仍本《方略》的陈规，因不便再称《方略》，改为《筹办夷务始末》，先后编成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久藏禁苑，未见印行。迨至192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成立，首先将道、咸、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影印出版，使我国近代外交史有了较为系统的史料。不久又有王亮先生继承其先人王彦威所编自光绪元年（1875）至三十年（1904）四月的外交史料，进行补辑，并据清外务部档案及当时驻外各使领馆存档等，赓续编补，自光绪三十年五月至宣统三年（1911）止，又曾编《西巡大事记》成二百五十三卷的《清季外交史料》。此超过五百万字巨著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学

者的重视，成为研究近代史、外交史不可缺少的可据史料。当时知名人氏如学界蔡元培、胡适，外交界顾维钧、蒋廷黻等莫不为之撰写序文，加以誉扬。特别是道、咸、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与《清季外交史料》均相衔接，使九十年的外交史料有了连贯性。虽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尚未见有超过的著作问世，亦足证其价值所在，中华书局及台北方面重印时，亦未见有所增补。

此书收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汇订四函，系罕见抄本，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十年，其中部分与《同治筹办夷务始末》与《清季外交史料》相重，为两书所缺者尚有三百八十四件，如光绪六年中德修约，前后补遗达八件之多，光绪三年“湖北武童殴伤英人请饬李翰章妥速办理折”叙述事件真相殊详，另取名为《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不仅可补《清季外交史料》之缺，也是清季外交史料的新发现。

直庐日记

直庐日记不分卷　（清）胡嗣瑗撰。此日记记录了溥仪在天津静园与臣僚的复辟活动及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伪满洲国的情况，兼及其他时事。现据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原稿本影印。影印本卷前有武亚民前言。

胡嗣瑗（1869—?），字晴初，一字琴初，别字忆仲，贵州开州（今开阳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任金陵道尹及江苏将军咨议厅厅长。1917 年张勋复辟时，授内阁阁丞。其后，长期随从废帝溥仪居天津。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先后任天津办事处顾问，伪满执政府秘书长，伪满参议府参议等职。善书法，好藏书。溥仪居天津时所赐清遗老匾额的题字，多出胡氏之手。所藏书多钤有“开州胡嗣瑗藏书印”等。

《直庐日记》是胡嗣瑗日记稿的一部分。起自 1931 年 2 月 17 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止于该年 10 月 22 日（农历九月十二日），时值胡氏随从溥仪居住天津期间。直庐，即其天津寓内书斋名。现存寓津《直庐日记》共五册。胡嗣瑗为溥仪的老师，忠于清廷。溥仪出宫后，一直侍奉身边，是溥仪身边的要人，被称为“胡军机”。溥仪被迫退位后，1924 年 10 月初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1925 年 2 月移居天津张园，1929 年 7 月迁静园。溥仪至天津后，曾设办事处。胡嗣瑗当时主持溥

仪办事处。他每退值回家，便在日记中详细记载当天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以及溥仪谈话的内容。因此，他的《日记》对于了解溥仪在天津时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方面又对溥仪进行诱骗活动。《直庐日记》记载了溥仪与日军之间互相接触的一些情况。此时溥仪家庭矛盾激化，淑妃文绣离开静园，与溥仪脱离关系。胡嗣瑗充当溥仪的代表，进行了交涉，并在所达成的协议上签字。《直庐日记》对此事的记载完整而详尽，不仅可以驳正当时社会上的错误传闻，而且还能使人了解到更多的具体细节。因此，《直庐日记》这部私人记述，实际上又可以被视作溥仪居津末期的史事实录。

文澜阁四库全书选粹

文澜阁四库全书选粹　《四库全书》是清代皇家编纂的最大的丛书，原抄本分藏南北七处。其南三阁本，今仅存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本孤品，弥足珍贵。此书装潢豪华，堪称艺术珍品。北四阁书钤各阁之宝，而文澜阁本则钤“古稀天子之宝”，且装帧、纸张等与北阁各本亦有不同，内容上也有些差异。今选经史子集各一种，即（清）杨名时《周易札记》二卷、（宋）孔传《东家杂记》二卷、（清）梅文鼎《中西经星同异考》一卷、（元）胡炳文《云峰集》十卷。用宣纸朱墨套印，包背装，分绿、红、蓝、褐四色绢面，悉依原样影印，保存原本特色。影印书后有出版后记。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代典籍浩如烟海。清乾隆年间朝廷广征全国图书，从中选出三千四百六十一种，编成了《四库全书》。共抄成七部，分七阁庋藏。南三阁：文澜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咸丰十年（1860）倒塌，书多流散。光绪六年重建，书由丁丙、丁申二人搜集抄补大半，后又陆续根据文津阁本抄补完全。书今藏浙江图书馆。文宗阁，乾隆四十四年（1779）建，在今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寺。咸丰三年（1853）毁于火。文汇阁，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修建，咸丰四年

(1854) 毁于火。北四阁：文渊阁，乾隆四十年（1775）修建，在北京旧紫禁城内。《四库全书》第一份写成，即藏其中。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文溯阁，在辽宁省沈阳市清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建，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津阁，乾隆四十年（1775）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建于承德避暑山庄。1915 年藏书运至北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文源阁在北京圆明园内。乾隆四十年（1775）修建，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焚毁。

文澜阁地处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由圣因寺行宫藏经阁改建而成。全书计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册。因允许士子进阁阅抄，二百年来《文澜阁四库全书》对江浙文化的发展颇有推动。咸丰十、十一年太平军攻占杭州城，阁圮书散，沿湖弃撤，当时八千卷楼藏书楼主丁申、丁丙兄弟冒险拾搜，又四处收购，辗转保藏，总得残书八千三百八十九册。光绪七年文澜阁修复后，书才重新归阁。光绪八年起丁丙开始主持补抄缺书，从自家及江苏、湖南、安徽、广东等十七位藏书家处补抄，历时十八年，共抄成三千一百零三种。此是“丁氏补抄”。民国四年乙卯，钱恂再行补抄，花费八年，从文津阁本抄回三十三种，又购回原抄一百八十二种。民国十二年，张宗祥组织人员三举北上，借文津阁本补抄，仅二年，抄成二百一十一种，二千零四十六册，又重校丁抄二百一十三种，二千五百五十一册，重抄五百七十七叶。此是“癸亥补抄”。民国二十三年又补抄一种。至此，文澜阁本基本恢复全貌。然通检全书，仍有个别书缺卷未补。

抗日战争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后避难富阳、建德、

龙泉、贵阳、重庆，战争结束后返杭。1970 年至 1976 年，书又进行了一次大迁移。《四库全书》历经沧桑，七阁书仅存其半，江南三阁同遭兵燹，惟独文澜阁本劫后复存，此中丁氏等先贤功德，后人当志不忘。

《文澜阁四库全书》后归浙江图书馆典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全书备受珍护，原抄本也陆续又有一些收回。丁氏以后已易匣为橱，80 年代又特制三百三十只樟木箱并设专库珍藏。

文澜阁本与北阁各本相比，别具特色。卷端钤阴文“古稀天子之宝”，卷末钤阳文“乾隆御览之宝”，书幅较北阁本略小。文澜阁本在种数上较北阁本为多。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库全书查检撤书，文澜阁本周亮工等人多种书并未撤出，如今存有原抄同书完本，另有《问学录》原抄本，为北阁本所无。书之卷数，文澜阁本也与北阁本有所不同，如《云峰集》，文渊阁本缺九、十二卷而文澜阁本不缺。丁氏补抄自四库本，所用底本多有相异，其中不乏诸藏书家所藏宋元秘籍；四库本《尚书要义》、《春秋谳义》、《读四书丛说》等书原抄底本缺卷，而丁抄所录为全本。四库本乾隆大加删改，丁抄则无此弊。因此，文澜阁本可谓是别本四库，有着特殊珍贵的价值。

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清）四库馆臣撰。金毓黻将伪满奉天图书馆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每篇提要辑出，编成《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一书，于1935年出版。此书流传不广。现据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影印，影印本卷前有王清原、韩锡铎前言。

金毓黻（1887—1962）又名毓绂，号静庵，斋名静悟室、千华山馆，辽宁辽阳人。191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奉天图书馆副馆长、奉天通志馆总纂、国史馆编修、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后又任伪满文化协会理事，并兼《满洲学报》主编，并任行政院参议，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北大文科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东北文献学家。著作有《东北通志》等。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的奏折，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起了重要作用。该奏折主要陈述征集遗书问题，建议朝廷应令儒臣对这些书籍进行校雠、分类，并对每部书校其得失，撰写提要，置于本书之首，然后进呈，供皇上披览。军机大臣进行了议论，同意朱筠的意见，并认为应仿效前代，编纂出一部按四部分类的目录。乾隆在三十八年二月的谕旨中说："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节略，

附夹本书之内容，于检查询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崖略，粘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于是，便决定纂修官们每校理一部书都要写一篇提要，然后编撰出一部带提要的总目录。提要内容包括书名、卷数、著者介绍、写作经过、内容得失，有的还包括版本源流。征集上来的书，除列为禁毁的之外，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质量较好的编入《四库全书》，一部分内容相对较差的只保存目录，俗称“存目”。纂修官们对所分担的书认真审核校理之后，按要求写出一篇提要，并提出入选或入存目的处理意见，然后由总纂官复核，有时意见不一，便由总纂官审定。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馆开馆，乾隆四十六年底或四十七年初，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完，五十二年七部皆抄完。四库全书馆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还产生了《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这些副产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它将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多种书和只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保存目录的六千多种存目书，每种书皆有一篇质量较高的提要，通过这些提要，人们可以初步认识和了解这近一万种书。所以二百年来，《四库全书总目》已成为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乾隆三十九年（1774）底征集遗书的工作基本完成，次年《四库全书》的选书工作大体有了眉目，各种书的提要也基本写定。为了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便将各书的提要辑出另写。根据乾隆皇帝的意旨，为了表彰献书者，注明每书的来源。经

过总纂官纪昀等人的再三修改润色，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总目》基本定稿，乾隆五十七年（1792）交付武英殿刻印。

《四库全书总目》（下略称《总目提要》）中存目部分是七阁之书所无的。然而《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下略称《文溯阁提要》）与编人《四库全书》各书的提要相校勘，却几乎没有一篇是完全相同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在《总目提要》辑出之后，由于某种原因，《四库全书》编定时却对个别书的版本进行了更换，提要则已另写，而《总目提要》仍是原来的。

《周易正义》与《周易注疏》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书，只此书名和卷数不同。而两个提要的内容和角度却迥异。《总目提要》所据的底本据说是清内府刻本十卷，但查乾隆三十四年于敏中等人编纂的《国朝宫史》、近人陶湘编的《清代殿板书目》及近些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等书，均不见著录，其版本实有可疑。而且其提要内容也欠妥，以“在正义既行之后也”划线，提要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意在叙述王弼注、孔颖达疏的情况，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有长篇文字指出其介绍失当；后部分以王注孔疏的个别字句为例，攻其失，而不述其之所以几代以来被列为官板《十三经注疏》的原因，颇失中允。这篇《总目提要》却很似存目部分的提要。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四库全书》在抄录时，便将底本换为乾隆初年武英殿（也可称内府）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另作提要进行客观的叙说，并对此《十三经注疏》予以赞扬。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仅见的。

在《四库全书》成书之时，儒臣们正奉乾隆皇帝之命，另纂十余部规模较大的书，如《大清一统志》、《钦定热河志》、《钦定盛京通志》、《续三通》、《清三通》等。这些书无疑是应该编入《四库全书》的，提要自然也应该编入《总目提要》。但是《总目提要》辑成之时，有的书还没有编完，当时只能根据初稿或编写大纲来撰写提要。故其书修成定稿之后，有的与初稿或编写大纲有程度不同的出入，而后又根据实际情形重新改写出来的提要自然与《总目提要》就有卷数或内容上的差异。

《文溯阁提要》基本保持了纂修官撰写的每部书提要的原貌，而《四库提要》由于经总纂官纪昀等人的再三修改，致使同种书两篇提要在文字上有很大出入。《四库提要》与《文溯阁提要》也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四库提要》中的部分提要，并不完全是《四库全书》每书的提要。正因为如此，金毓黻先生才有辑《文溯阁提要》之举，并于此书后附《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书后附有书名、著者的四角号码索引。

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

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四卷　（清）叶启发撰。未刊稿本。撰者就家藏拾经楼宋元明刻抄本、名家批校本，对书籍板刻年月、文字异同及各本得失，详加考订，卷首有曹典球（曾任湖南省文史馆馆长）序文，叶启发自序。并缀以题跋。共收书一百零八种，是一部专论目录、版本的读书札记。本书现藏于湖南图书馆。影印本卷前有寻霖前言。

叶启发，字东明，长沙人。书斋名为华鄂堂。是清末民初湖南四大藏书家之一，著名学者叶德辉之侄。叶德辉观古堂所著书多达数十种，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叶启发对目录、版本学颇有研究，是受叶德辉影响。叶启发秉承家学，专心砺志，对于旧族遗书勤加搜集，故不越十数年藏书已足为大观。其兄叶启勋（字定侯）也颇好藏书，所藏珍善本可与叶德辉观古堂相媲美，而且颇能传其学。叶启勋曾著《拾经楼绀书录》三卷；而叶启发则有《华鄂堂读书小识》。

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为叶氏拾经楼红格纸抄本，叶启发之子所抄，分上、下两册，今见此书中夹有一张由曹典球、杨树达填写的《专门著作申请奖励说明书》，说明此书为“著作者就家藏宋元明刻抄本、名人批本校本书籍，详加检核，考证其得失源流，逐一缀以题跋记载”。其内容要点为关于各

书之版刻年月、文字异同及其得失，逐一论列收藏者印记及批校、名人事迹，旁征博引，详加评论。

叶启发在《小识》序言中叙及其藏书来源："先曾祖由吴避乱来湘，先世父考功君（叶德辉）以湘潭籍成进士，官京曹者数年，性甘恬淡，谒选还田，致力于考据版本目录之学，尤嗜收蓄旧本书籍。"叶德辉兼收并蓄，其藏书多来自袁芳瑛卧雪楼（袁书多得于孙星衍祠堂），及马国翰玉函山房（马书多得于王士祯池北草堂）等。于是观古堂之藏书蔚为湘中大观矣。叶德辉生前曾将部分藏书赠送给叶启发兄弟，而启发兄弟后来又得道州何绍基所藏（何书多来自朱彝尊、翁方纲、张穆诸名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启发华鄂堂藏书由其子捐赠湖南图书馆。

叶启发在《华鄂堂读书小识》中，详细介绍各书版本异同、流传经过；汇集以往诸家题记，并自加考订评说而颇多精当之见。例如道州何绍基旧藏宋刻小字本《说文解字》，傅增湘曾大为赞赏。因为叶启发之书大多来自道州何氏，所以人们往往误以为叶氏所藏即是何氏旧物。其实，叶启发《说文解字》乃得自湘潭刘氏，此书虽亦为宋刻小字本，但曾经后来补刻过。《华鄂堂读书小识》载，明崇祯间虞山毛氏汲古阁曾以家藏宋本翻雕；所据底本后归陆心源皕宋楼；民国间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张元济影印《续古逸丛书》时，由叶德辉从东瀛借归。叶启发所藏宋本《说文解字》与汲古阁所据为同一版本，叶氏以家藏本与汲古阁重刻本对照，认为汲古阁本不仅改易原本字体，尽失宋本真面目；而且窜乱实多，贻误后学。钱大昕日记曾载：宋版《说文》二部，一为王昶家藏，一为黄丕

烈所示。黄本卷末多一行，有“十一月江浙等处儒学”字样，故钱氏认为黄本乃元翻刻宋本。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五十附说又载：安邑宋君保淳得《说文》小字本，有毛晋印、季振宜印，是元明间坊本。而叶启发认为毛氏所藏《说文》原有二部：一为宋椠宋印，一为宋本递经元明补修，字句稍有同异。藏书家因字句不同，往往误为两刻。钱氏所谓元翻刻宋本，桂氏所谓元明间坊本；其实都是宋刻元明递修本。叶启发的这些考证，无疑对《说文》宋刻本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虽然叶启发藏书数量无法与叶德辉相提并论，但《华鄂堂读书小识》因其收藏与考证之精，则可与叶德辉《读书志》、叶启勋《拾经楼绀书录》诸书并垂于世。这是一部值得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者重视的著作。

丝绸之路资料汇钞

丝绸之路资料汇钞二十六种、**汇钞增补**、**汇钞**（清代部分）共三种，均吴丰培编。先从旧史中选出丝绸之路的古籍文稿，汉代二种，晋唐各代禅师往印度求经者所见闻五种，唐宋元明清各代使往西域之专著十余种，共二十六种汇编成书。后又增加两种再编增补，又收集清代赴新履任或谪戍者的纪行之作四十种。不仅汇集许多名著，如《万里行程记》、《辛卯侍行记》等，还收集了一些稿本及旧抄罕见本。集得清代部分资料汇成第三部分。三书较全面地收集了从汉到清丝绸之路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驿站等史料。本书卷首有吴丰培前言。

汉代二种

《出关记》一卷，（汉）张骞撰。他是第一个出使西域的人，此书是第一部用汉文记载西域的著作，惜已失传，仅见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中。《史记·大宛传》中有其前半篇，所载他所至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全篇用自述语气，前半篇所记，都是张骞目击，回来向武帝所奏的调查报告，今影印本节录《大宛传》中的这一部分，用原名《出关记》。

张骞第一次出使为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初入河西

地界，为匈奴所执，囚禁十余年得机会西逃，越葱岭而至大宛、康居最终到达大月氏。为时十三载，极为艰苦，回来为元朔三年（前126）。第二次为元狩四年（前119），因武帝谋从西南通向西域之路未成，故又派张骞仍由河西走廊西行，直到乌孙与他们建立关系。又派副使分道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拘弥等地，进行联络，于元鼎元年（前115）才回来，从此沟通两地民族友谊关系，成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人。

《西域风土记》，（东汉）班勇撰。班超、班勇父子均使西域，也建立了不朽功勋，而勇著此书，仅见于姚振宗撰的《后汉书·艺文志》中，未见单行本，而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则云："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备载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班勇所记云。"完整保存勇作的原貌。现按原书名影印，并将班勇传作为附录，以作参考。

晋魏唐代释氏西域纪行四种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异说纷纭，相传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5）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正式的记录，则在东汉明帝永丰中（58—75），摄摩腾竺法蓝由月氏来中国，而楚王刘英（刘秀之子）信浮屠佛，可是影响还不很大，信奉的人数不多。到了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主要是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典籍也纷纷翻译过来，还感不足，故许多僧人就西行取经，见于记载最早是魏甘露五年（260）西渡西沙，直赴于阗国的有朱世行，以后去者很多，可惜他们的著作仅见有书名，而原著都散失了。

魏晋及唐释氏旅行之作得到四种，虽有残本也非常可贵。

《由长安发迹至西域之旅程》，（晋）释法显著，法显原著有《佛国记》，今用日人足立喜六撰《法显传考证》中一段，凡西域地名，均用他的考证，又用《大藏经》本为之校核。

《使西域记》，（魏）释宋云、释惠生撰，原载于《洛阳伽蓝记》中，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作品，现辑出时，节去游历部分，用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记》本，并采用他对古今地名相证之注，其他考证因有原书不再重录。

《往五天竺国传》，（唐）释惠超在开元间去印度时著，敦煌存有残卷，罗振玉曾将残卷印入《敦煌石室遗书》并作了《校录记》。日本人藤田丰八义成《慧超往五天竺国笺释》一书，民国二十年（1931）钱稻孙为之排印，而《大藏经》也收了此书，现节录其回程中入我国境内的部分，并用各种本子加以校核并部分选录了藤田的注释。

《悟空入竺记》，（唐）释圆照撰。悟空京兆云阳人，俗姓车氏，字奉朝，后魏拓跋之胤裔，于天宝十年辛卯（751）为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随使臣至罽宾国，历时多年，于贞元六年（790）回京。此记较简，然与以上诸本互证亦可取详补略，今自《大藏经》辑出。

唐代五种

唐代西域交通极为通畅，往来中外人士很多曾有许多专著，如许敬宗的《西域图志》竟有六十卷之多，其他如裴矩的《西域图记》三卷，程士章的《西域道里记》三卷，范正传的《西陲要略》等书，足以说明当时对于西域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可惜以上各书仅见《唐书·经籍志》中，而原书早已失传了。

《经行记》（唐）杜環撰。为唐初较早之本。王国维《古行记校录》称，杜君卿曰："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751）至西海，宝应初，因商船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乃从《通典》李元阳本移录。"

《岑嘉州诗选》，（唐）岑参撰。岑参，南阳人，天宝三载（744）进士，由帝府参军，累官右补阙，曾任嘉州刺史，故名其诗集。他从天宝八载（749）至十三载（754），以安西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书记判官的身份，在西域多年。十三载至十四载，他又以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判官和支度副使身份，第二次到西域。他的足迹较为广泛，在他的诗集中涉及西域的有三十首，身历目击之谈，虽出自吟咏，而记事写景，极为真实，故杜确称其属辞尚清，用意尚且；杜甫亦称其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不仅为盛唐诗中之巨擘，更是西域记的难得之作，今加选录亦备传诵。

《安西入西域道》，（唐）贾耽撰。乃贾耽任相时，考方域道里之数而作，从边州人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载，共分七篇，今取其第五篇，用吴士鉴校订本。

《西州图经》，为敦煌残卷，由罗振玉影印于《鸣沙石室佚书初编》，罗氏用《新旧唐书·地理志》相校，很多相合，并可证误，今加辑录并附罗跋。

《沙州伊州地志》，亦为敦煌残卷，虽然缺字很多，而地理价值极高，为稀见珍品。敦煌卷子以有年月者为可贵，此卷末有光启元年（885）纪年，年号为僖宗，已到了唐代末年。

沙州三种

《沙州记》，（刘宋）段国撰，（清）张澍辑。原书二卷即

《隋书·经籍志》之《吐谷浑记》，佚亡已久。（清）张澍（1776—1847），甘肃武威人，字伯瀹，号介侯。嘉庆进士。历任玉屏（今属贵州）、泸溪（今江西资溪）等县知县。好游历，远游晋、鲁、豫、江、浙等十余省。博览经史，留心关陇文献。辑遗籍数十种，曾刻于《二酉堂丛书》中。今据《丛书集成》本转录。

《沙州图经》，乃敦煌残卷，为卷中珍品。系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之作。日本羽田亨评说卷中记沙州境内山水城邑等颇为周详，优于斯坦因所获的《敦煌录》及唐光启元年书写的《沙州地志》，经罗振玉先生影印于《鸣沙石室佚书初编》，又铅印于《敦煌石室遗书》中，亦称此卷叙述详赡，文字尔雅，可证旧史舆地之不足。

《敦煌录》，不著撰人，现其所记均为唐代之事，自为唐人所撰，原载重修《大藏经》中，较为完整。今再用《敦煌石室碎金》校对，注其异同，堪与《沙州志》相证。

五代至宋代四种

五代之时内政紊乱，至于宋朝亦疆域不广。因太祖以统领禁军、掌握兵权，夺得了后周政权后，又鉴于唐代藩镇地方兵权太重，故选拔精兵，以人禁军，禁军称为厢军，力量极为薄弱，仅足守卫，而不能抵御边区的民族新兴势力，对于西域各地，无暇顾及，与西域较少往来。

《使于阗记》，（五代晋）高居诲撰。此篇初见于《五代史记》卷七十四，而《全唐文》卷八百五十亦加载录，文有异同，附注于后。《五代史记》云：晋天福三年（838），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厘牛尾等，晋遣供奉

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使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是岁冬十二月，匡邺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至七年（942）冬乃还。而居诲颇记往复所见山川诸国，是为此文。

《西域行程》，（宋）王继业撰。王继业，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964）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遣中，至开宝九年（976）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理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解。继业往西域达十年之久，惜所记大略，篇末有“业自云别有传记，今不传矣”，又有“业年八十四而终”之语。

《西天路竟》，敦煌卷中有残卷，尚少流传，是非常可贵的资料。成书年代经黄盛璋考为与《西域行程》同时之作，并作了详细的考证。

《使高昌记》，（宋）王延德（939—1006）著。王延德，北宋大名（今河北大名东）人。真宗初，历知郓州，徙青州，坐事降官，后致仕。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国遣使朝贡，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与殿前承旨白勋使焉，自夏州渡河经砂碛，历伊州，望北庭一万五千里，雍熙二年（985）使还，撰《西州程记》，可是宋见传本，经王国维辑出，用《挥麈录》校订。并用原名《使高昌记》为题。

元金五种

元太祖铁木真崛起于漠北，扫平各部落，得以统一，称汗于鄂诺河之源，乘金内乱进取中原夺得河北、山东等地，又因乃蛮占有西辽故地，遂破之，乃掩有西域各地，于是天山南北

两路均畅通无阻。

《西游录》，（元）耶律楚材撰。元太祖十年（1215），成吉·思汗取得了燕京，起用了耶律楚材，十四年（1219）耶律楚材随军西征，在窝阔台汗元年（1229）将他去西域的见闻写成此书。后来清李文田研究西北地理，又博采旧籍加以注释，现在又据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向达校注本增加补充。"西游"行程是自永安（北京香山）过居庸关历武川（内蒙武川）出云中之右抵天山，达蒙古克鲁伦伴。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元）李志常撰。山东道士邱处机奉太祖诏，去西域行在，由其弟子李志常所追述。是记述天山以及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较早的著作。自莱州一千二百余里北至燕京，亦出居庸关北过抚州入蒙古地，入小沙陀后到了不剌，然后过阴山以至阿里马城。

《塞北纪行》残本，明为《边堠纪行》，李文田改为今名。（元）张德辉撰。德辉，字静卿，冀宁交域人，金时为试篆御史台，官至参议中书省事。此书为戊申（1248）去塞北所作，他所走的路程部分与《西游记》同。故沈垚《西游记金山以东释》用两书互为考证。

明代五种

《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明）陈诚、李暹撰。确实为明代可贵的资料，《西域番国志》前经《学海类编》刊行，名为《使西域记》，并有沈德潜的跋，比较简略，现在根据北平图书馆所编的善本丛书影印的明按本，而用《学海类编》有所增补，可是有许多别体字，未加擅改，仍存旧貌，并

加录了陈诚的《土鲁番记》，又将曾棨、李徵二人《送陈郎中重使西域》诗作为附录。

《全陕边政考》，（明）张雨撰。雨为明嘉靖丁未（1547）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乃阅视各镇武备，究其边疆事，并附有《西域诸国》，远及西北各国，仅记里程、物产。

《汉书西域传补注》，徐松撰。徐松学识渊博，精通史地，坐事戍伊犁。时伊犁将军松筠雅好翰墨，亦研究边疆史地，驻藏时曾著《镇抚事宜》五种及编纂《卫藏通志》等书，调至新疆，极为重视本区地理，延徐松入幕，资以图书车马，使其前往各地考察。松置开方小册，随所到处，绘图明其山川曲折，记其沿革形势及用兵情况，亲身经历，完成四大名著，即《新疆识略》、《新疆赋》、《西域水道记》以及此书。后来，松筠以《新疆识略》进呈，钦定出版，因赦松还。他的遗作一再付印，均成为新疆舆地重要参考书。

《甘新游踪汇编》

入清以后对新疆建置日趋完善，躬履其地，记其风土者，不乏名作。就记行分为五类：康乾之际，屡次用兵新疆，故随军而往者，每多记其山川，详其程站，如张寅之《西征记略》、方观承之《从军杂记》。宦新官吏，初登远程，访古志异，经历毕录，如景廉之《冰岭纪程》、袁大化之《抚新纪程》，此为第二种。英俄交窥边隅，新疆更多交涉，纠纷屡起，派员勘查，每有记录，如沙克都林扎布之《南疆勘界日记》、徐崇立编之《履勘边界山川形势道里记》是也，此为第三种。清制，获罪官员有戍边之例，以犯罪之轻重，定充军之远近，近则张垣、宣化，远则新疆各地，名曰发赴军台效力，其中犯员，不乏文人

名士，于行程之往返，舆地之要塞，述其见闻，详其经过，如祁韵士之《万里行程记》、方士徐之《东归日记》是也，此为第四种。别有不属于上述四种人物，只有陶保廉，既非官吏之赴任，又非遣戍人员之充军，乃随其父陶模赴新疆巡抚任所，实行囊中，饱载书籍，凡山川关隘之险事，道路之分歧，地理之沿革，风土之特殊，莫不勤咨广询，逐日缕记，复自为之注，名胜古迹，古今异称，博引群书，考证极详，名曰《辛卯侍行记》。综论新疆舆地之作，当首推徐松之《西域水道记》及陶著《辛卯侍行记》，而后者尤为稽考精湛，所言可据，询属纪行之上乘，不可多得之佳作，此为第五种。今辑此五类成篇之作，得三十余种，虽其中亦曾有刻本，而购求今已不易，其余均属秘本。积数十年之力，始得汇为一篇，则有清三百年来记载新疆行程之主要者，或已毕集于斯，省检用群书之烦，而获互勘互证之效，供史地学者所需，同好者其将乐观所成欤！

《甘肃至新疆路程》

我国驿站之设，由来已久，及至清代，更加备至，布及全国，音讯互通。清初对于边区指挥自如，六百里加快，不分昼夜而行，使羽书军报速达于朝廷，端赖乎驿站之设立。在三百年前，恃马力为交通重要工具之时，从京师到北疆伊犁，路途万里，而文报一月可达，不可谓不迅速矣。及乎清末，设邮电，建铁路，而驿站始废。今各铁路沿线之站名，往往仍保留驿程名号或陈迹。新疆地处遥远，该时官吏之赴任，戍卒之瓜代，遣戍人员之赴役，商旅之贩运，莫不按站而行，始得食宿，设若过站，便将野宿，求水火而不可得，生命危矣。辑《甘新游踪汇编》，故首列《甘肃至新疆路程》，并附录《库车

琐记》中之哈密至库车路程，详当时之行程焉。

《哈密至准噶尔路程》

雍正间使臣撰，不著名氏。是篇起自雍正十二月二十三日，迄于正月二十八日，总记三十六日之行程。篇中地名颇沿明代旧称，因为未经乾隆改译原故。又考《西域水道记》卷二亦引此文，里程虽同，而字有所润色，且地名多有改易，今加互校，并将《西域水道记》的地名，小字旁注。

《西征纪略》

（清）张寅撰。此书据旧抄本付印。为陕西盐厓县知县张寅解运骡马，由陕西、甘肃而入新疆，至哈密军前，为清代赴新较早记程之作。虽篇幅不多，而书极罕见，清代重要书目均未著录。魏源《圣武记》中《亲征准噶尔记》后，附马思哈《塞北纪程》、殷化行《西征记略》、钱良择《出塞纪略》等篇，而不及此书，足见道光年间，已不多见。

张寅，字晓谷，山东滨州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进士，选授盐厓县。新疆初辟，行旅较艰，书生从戎，自多绘色。

《从军杂记》

（清）方观承撰。此书即其从军之作，其行程乃自张家口转蒙古各旗，路经外蒙科布多等地而至新疆。时为雍正十一年，而本传作十年，则可证《清史稿》之误。

方观承，字退谷，安徽桐城人，祖登峰，官工部事，父式济，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内阁中书，侨居江宁，坐戴名世《南山集》狱，并戍黑龙江。观承尚少，寄食清凉山寺，是岁与兄观水徒步至塞外营生，往来南北。数年，兄与父

皆没，益困，立志勤学，为平郡王福彭所知。

雍正十年（1732），福彭以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噶尔，奉为记室。世宗召入对，赐中书衔。师还，授内阁中书，官至直隶总督。当清康雍之际，军旅整饬，边地用兵所向有功，安抚民族尚有方略。虽记中多沿途风物，而于北地阨塞每多论及，不失为可取之作，文字娟雅，尤属余事。观承于直隶任内，对于水利疏浚向称能手，史称其治绩彰显者，固非过也。

《西行日记》

（清）赵钧彤撰。全书三卷，记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初六日自保定清苑县出发，至十一月初六始抵兰州。途经山西、陕西两省，沿途名胜，均有记载。

赵钧彤，字治平，号澹园，为山东莱阳县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历任唐山知县，四十八年（1783）癸卯，因罪遣戍新疆。虽属遣戍人员，而迎送酬酢，应接频繁，亦官场之习惯。时当乾隆武功较盛时期，西北各处，军事井然，烽堠谨备，故能遥控新疆，指挥自如。

书中所记，可窥一斑。钧彤雅好翰墨，虽在隆冬风雪之中，而日记不断，凡山川脉络，地方形势，都有论及，按图考证，详述环域，堪为地理佳作。故光绪《登州府志》称其天资灵敏，语皆沈鸷清壮，成所诸作，尤多奇气，固非过誉。

《西征纪程》

（清）王大枢撰。全书为八卷，此《纪程》乃记自安徽转河南，至陕西、甘肃，过哈密、吐鲁番，以达伊犁，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十八日起，至十月十一日始达戍所。今辑自兰州始。所记沿途见闻，多志古迹，博引群书，有所说明，

推引久佚之书隋裴矩《西域记》之文，尤为珍贵。

王大枢，字澹明，号白沙。安徽怀宁县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五试春官不第。五十三年（1788），因事谪戍伊犁，因成《西征录》，盖取潘岳《西征赋》之意也。其居伊犁也久，竟达十三年。曾人修志局，参与纂修《伊犁志》，于沿途所记地理古迹，颇多引用典籍之文，乃后增入。

书中记千佛洞云，疏岩凿石，佛龛无算，像有雕塑有绘画，以数万计，至今丹青尚有存者。并记雷音寺古碑缺文，均为他书所未及。又谓赤金湖南有石油泉，是为玉门油田记载较早之作，极可珍也。

《遣戍伊犁日记》

（清）洪亮吉撰。此日记是嘉庆四年（1799）九月遣戍伊犁之作。亮（吉），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人。亮吉在乾隆时代，屡主文政，极负盛名，性情豪迈，喜论世事，颇遭时忌。乾隆帝逝世，嘉庆帝初掌政事，亮吉上书言事，主要“以风俗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书成，达成亲王以闻。帝见大怒，严旨下廷臣会鞫，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此沿途日记所由作也。亮吉由京离监，押出彰义门，经山西、陕西而至甘肃，径达伊犁。今录自兰州始，经哈密、吐鲁番等地以至戍所。不久，帝欲示己非拒谏饰非者，故即释亮吉回籍，为遣戍官员罕见之例，故有《百日赐环诗》、《万里荷戈集》及《天山客话》，与《遣戍伊犁日记》，均为同时之作也。亮吉著作极多，诗文名世，而对于地理之作，亦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纂修方志，更有八种之多。

《万里行程记》、《濛池行稿》、《西陲竹枝词》

（清）祁韵士撰。作者于嘉庆六年被遣戍伊犁，于二月十八日由京起行，行程记自山西太安驿，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犁。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莫不随手疏记，以成是书。今自兰州始，而附《濛池行稿》中有关记程之作三十余首，及《西陲竹枝词》中有关新疆舆地者四十首，庶诗文并存，可资参阅。

韵士，字鹤汇，山西寿阳人。嘉庆时翰苑名臣，尚有自撰年谱，备载生平。当韵士入翰林院充国史馆纂修，以擅长满文，又悉发库伫满文红本，摘要译汉，得其端绪，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八年成一百十二卷，以官修刊行。又别撰《藩部要略》十八卷、《藩属世系表》四卷，以年月编次。史称《表传》。李兆洛序称，“如读邃皇之书，睹鸿濛开辟之规模”，固非过誉。及抵戍所，除上述记行及诗文三种外，还著有《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乃据程振甲之原稿而加以编辑完成者。又自著《西陲要略》四卷，《西域释地》一卷。

嘉庆六年以郎中监督宝泉局，十年局库亏铜案发，历任监督均逮问治罪，韵士亦名列其中。其年谱云：“向来监督交代，仅凭册造出结，相沿致误，则其获遣，固非其罪也。”韵士复有《己庚集》、《书史辑要》等书行世。其子寯藻以进士出身，官至大学士，著有《䜌䜣亭集》。

《东归日记》

（清）方士淦撰。士淦，字莲舫，安徽定远人。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由内阁中书，历官浙江湖州府知府，办灾

赈，修石塘，俱有治声。道光六年（1826），缘事遣戍伊犁，八年释回。因将归程分日缀记，以成此书。其行程自伊犁以至西安，日期自道光八年（1828）三月十五日至六月三十日，约为一百余日，记事则详于新而略于陕，故全录之。时届初夏，于石壁巉岩、险途峻域中，尚能描绘青绿相间、如画之景，亦因其生。入玉门关，与秋冬季节奔赴戍所，长征于冰天雪地之中，愁郁困苦之情者，迥不相侔。又有《生还诗草》，乃与日记同时之作。

《荷戈纪程》、《南疆勘垦日记》

（清）林则徐撰。此两篇新疆记程之作。则徐以焚毁鸦片，抗拒英军，闻名世界，卒以清廷昏愦，妄信直隶总督琦善之媚外谗言，自毁长城，竟革则徐之职，于道光二十二年遣戍新疆伊犁。此《荷戈纪程》之所由作也。则徐久任封疆大吏，其故旧门吏极多，又震其威名，故所至之处，均有官员迎送，武员竟于十里外排队相迎。

其记中亦云：有舆夫八人，圈车十五辆，俨然督府赴任之排场，非其他遣戍人员所能比拟。清例，官员得罪，若革去所有本兼各职，一旦起用，舁以京卿衔，立复原职品级。若为降三级调用，厥罚虽轻，实则按级升转，反而复职迟缓，故获遣之员，往往设法得革职处分，不冀降级调用也。则徐以名臣出戍，起用自在意中，故边吏莫不隆重礼遇之。南疆办垦，亦为则徐在新之德政。时伊犁将军布彦泰委之，综理其事，周历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垦田三万七千余顷，请给回民耕种。此《南疆勘垦日记》所由作也。《荷戈纪程》初刊于遗集中，而各地官员之酬酢，均缺而不录，盖防物议也。

所载日记，据稿本印行，故较详备。今据而录之，惟有误字脱文，复以遗集本校补之。《南疆勘垦日记》虽非全帙，亦觉可珍，今亦据日记转录，而冠以此名。

《西行记程》

（清）杨炳堃著。手抄本。书较罕见，著者生平不见于史传。

炳堃，字蕉雨，浙江归安人。以拔贡考取一等，以知县分发。道光十三年（1833），由河南信阳州任内，升为湖北汉阳知府，在任七年，升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因新宁会匪李法发滋事之案，围捕不密，发往新疆军台效力，乃于咸丰元年（1851）二月二十六日，自湖南省城出发，登舟至汉口，车行至许州，转陕甘而入新。其自序云："所历之区，山川古迹，风俗好尚，以及路之险夷，地之饶瘠，风膳露毂，触目皆成景物。"

《莎车行纪》

（清）倭仁撰。咸丰元年正月倭仁赴叶尔羌就帮办大臣之任，沿途所记。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至大学士，《清史稿》、《清史列传》均有传。

本书所记由京经晋、陕而至甘、新，今仍节自兰州始。其所经地区，往往溯其沿革，民族地名，多述其原来命名之意，书末杂论新地概况，盖本诸《西域水道记》，尚多可据。其本传称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等罪，诏斥未经确讯，率行参奏，下部议，降三级调用，嗣后转任京职。

《冰岭纪程附度岭吟》

（清）景廉撰。景廉字秋坪，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二年进士，八年授伊犁参赞大臣，官至军机大臣。《清史稿》、《清史列传》均有传。观其生平，仕新颇久，屡率劲旅与白彦虎、阿古柏相战，新疆之平定，景廉殊建功勋，乃满员中之佼佼者。

冰岭在阿克苏东北四百余里，路途险峻，重峦叠障，马行积雪，滑溜难以留蹄，车则更难转轮，最险处，乃梯上铺毯，相携而过；寒气凛冽，砭人肌骨，仅伊江戍卒，换防恢武，南路运送官物者，始取径于此，而宦游者，以非康衢，往往避越此道。而景廉以咸丰十一年（1861）任叶尔羌参赞大臣，赴普安谳狱，取其捷径，可以速达，毅然履险。于九月二日自伊犁惠远城就道，经固尔札城、索果尔台、库森绰罗塔坂、博尔台、霍诺海台、特克斯台、沙图阿满台、阿东格尔台、亮噶尔台、噶克察哈尔海台、特莫尔苏、穆素尔搭巴罕——即冰岭，再经塔玛哈塔什台、胡素图托海台、土巴拉克台、蛔蛘塔坂、亮噶尔台、阿拉巴特台、扎木台而至阿克苏，其艰险备尝，较其他行程，按站而进者则险易自不同，亦游踪中另一途径。后附《度岭吟》，为沿途吟咏，亦记景物，与《纪程》相辅之作，故并录之。

《西征日记》、《东归日记》

（清）吴恢杰（莲衣先生）撰，此两篇是赴新任返记程之作。

莲衣先生屡试不第，乃改学幕，适提督张耀率师西征，驻师哈密，因与之有旧，故应召而赴新疆，参与其幕。于同治十

三年（1874）四月，自苏州而申，水路至安庆，改由陆路到六安，转至郑州，自豫而秦而甘而新，至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三日始抵哈密。驻哈一年而返，辗转数月而归故居同里。沿途见闻，均有记述。

《泽雅堂纪行诗》

（清）施补华撰。补华字均甫，浙江乌程人，同治九年举于乡，两应吏部试不第，遂西逾秦陇佐左宗棠幕府五年，既而遭谗被劾，乃出嘉峪关，循天山而南，经奇台、焉香、尉黎、始塞、库车、疏勒，而达阿克苏，帮办军务张曜留佐戎幕。数年，曜擢升山东巡抚，也约随往，官至候补道。光绪十六年（1890）卒，年五十五。曾与陆心源、戴望、凌霞相友善，而其才出诸家之上，著有《泽雅堂文集》六卷，诗集六卷，光绪十九年（1893）刊行。其佐张幕时，曾奉委由喀什噶尔城西北行出克齐克、明约路两卡，至阿克苏铁力克达坂、出木伦，凡千数百里。撰有纪行诗十四首。对于沿途见闻，颇多记述，可补前人记此路途之缺，是为难得之作。

《额鲁特行程日记》

（清）宜珍撰。宜珍，赫舍哩氏，奉命查勘伊犁沿边卡伦界碑，自七月十八日起行，至八月二十五日到惠远城复命。书中不载纪年，惟文中记格登山碑为三年前马将军所重修。考马名亮，二十八年任伊犁将军，三十三年调职，三年前，则当在马调职之后。再考书中记有七月三十日之事，光绪三十四年七月适为大月，宣统元年为小月，则为光绪三十四年之事。再日记最后有云："并谒庆芝山秀观察。"庆名秀，时任伊塔兵备道，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卸任，则宜珍进谒，当为是时无

疑矣。书极罕见，《新疆图志·艺文志》未见著录，今仅国家图书馆藏有原抄本，颇为凌乱。凡当时大吏，均缺而不名，所载格登功德碑，更多误文。今为考补校正。

《西行日记》

（清）冯焌光撰。乃作者因其父遣戍，殁于戍所，乃往迎父归葬，旅途所记。其由上海乘轮至汉口，循汉江而至襄阳，自樊城起早，由豫而陕而甘，出嘉峪关至安西州，事先命其叔祖图赴乌垣寻找遗骸运回，在安西相遇即返，故身未履新地。其归程仍从原途至河南紫荆关，舍舆登舟，至樊城而止，此为全书之行程。

焌光，号竹儒，广东南海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捐内阁中书，投效江南军营，由湘军之提拔屡保，升为苏松太道，办理上海机器局，为显赫之能吏，故当时大员叠加誉物，屡奏其孝行。而李慈铭于《越缦堂日记》中，讥焌光夸其将迎之感，声气之广，所及宴会，流连风景。虽越缦堂笔下殊少完人，而焌光此作，多记酬酢之事，以迎椟而炫其孝思，固一洁誉之士欤。

《辛卯侍行记》

（清）陶保廉撰。保廉字拙存，浙江秀水人。为新疆巡抚陶模之子。模宦新时，该地建省不久，兵戎初靖，而外交频繁，俄则侵帕米尔，英则攻坎巨堤。模处理得宜，故《翁文恭日记》云：新抚陶子方来，此人操守好，能恤民隐，固清末之能员。其子保廉，于光绪十七年随其父入新就职，沿途考地理，以成此书。考有清一代二百余年赴新程之作，不下三四十种，而著者不外前述四类人士，而以显宦之子弟，随同赴任

者，仅《辛卯侍行记》一书而已。保廉潜研舆地之学，博议前闻，究心时务，随身携带西北地理必备之书九箱之多，分载五乘，真所谓学富五车矣。故王树枏序称云："光绪十七年三月秀水陶公，奉巡抚新疆之命，嗣君拙存侍公行，历秦、晋、魏、齐六国之地，两逾长城，渡瀚海，入月氏、鲜卑、车师、蒲类诸国，以达新疆。行程一万一千余里，凡山川关隘之夷险，道路之分歧，户口之多寡，人心风俗物产之异同，罔不勤诹广稽，取有关经史及体国经行之大者著于篇。"其作乃于古地，溯其源流，论及史迹，西域故道，引古证今，博采旧典，真可谓鸿学赡才，精研地学者矣。

《叶柝记程》

（清）王廷襄著。廷襄，字洁丞，湖南湘阴人。光绪十八年（1892）任莎车州叶尔羌典史。此书为作者赴新疆记程之作，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自新疆省城乌鲁木齐以达温宿州，下卷记自温宿以至叶尔羌，附河源杂考数篇。作者赴新行期两月有余，行程四千二百余里。经过之地为吐鲁番、托克逊、焉耆、轮台、库车、拜城、温宿、喀什噶尔。书为活字本，《新疆图志·艺文志》未加著录，亦足见其传本极少。

《河海昆仑录》

（清）裴景福撰。景福，字伯谦，又号睫阇，安徽霍邱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光绪五年（1879）举人，十二年丙戌科进士，任为户部主事。十八年外放赴广东，补陆丰、番禺、潮阳、南海等知事。二十九年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弹劾，夺职下狱。寻以缴锾不足，谪戍新疆，入巡抚联魁幕。宣统元年赦回，卜居无锡。民国三年任安徽省公署

秘书长，擢政务厅长。当其遣戍新疆，乃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由广州水路，至江西德化，改陆路转入河南，十月十七日至兰州闭居殊久。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始发兰州，四月抵迪化，因将行程见闻，以成此书四卷，名曰《河海昆仑录》。原书喜记佚闻怪事，今汰其生活琐闻及迷信不经之事以及议论经史、无关舆地者，而于当时有关政事，如章奏等均予以保留。

《西辕琐记》

（清）宋伯鲁撰。伯鲁字芝田，陕西醴泉县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进士，三十二年应伊犁将军长庚之聘，赴新疆任文案，民国后曾任陕西第一师参谋长、司法部长、总统府顾问、参议院议员等职。

自三月二十二日由醴泉携眷起程，四月十二日抵兰州，小住月余，至闰四月二十日始行，抵迪化已九月二十五日。足见行程艰缓，非半载莫达。沿途见闻，颇有所记，并多吟咏，亦附载之。当其在新时期，正当新疆布政史王树格开局，网罗多人，共编《新疆图志》，而伯鲁虽未在局内任职，而《建置志》为其编写。

《北征日记》、《入关日记》

（清）李德贻著。德贻字弦荪，四川彭州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为伊犁将军长庚调往伊犁办理警政，乃由镇江入都至归化，绕道内外蒙古，经迪化而至伊犁，往返行程，均有记载。书分四篇，为《入都日记》、《出塞日记》、《北征日记》和《入关日记》。今录其《北征日记》及《入关日记》两篇，均较简略，粗记行程而已。原为铅印本，脱文误字极多，因取其显误者考之。

《西征续录》

（清）孙希孟撰。扬州古旧书店喜抄旧籍，以广流传，固属佳事，但抄手过劣，校核亦粗，错字连篇，脱文更多。此《西征续录》，亦为该店传抄之一种。书中前后均无叙跋，不详著者之经历，仅知孙希孟为安徽寿州人。此书记孙希孟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郑州起程，于次年四月达到迪化的行程。

《柝游见闻录》

（清）易炳熿撰。炳熿字沃鲁，湖南湘阴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新疆政法学堂，为藩司兼监督杨增新选拔，派署乌什直隶厅照磨。照磨乃司笔札之吏，而能考察舆地，研究文物。王树格《新疆访古录》中曾引用其所得元世祖元宝交钞，足见其对于山川形势、收集古物均较留心。此记自是年七月初八自乌鲁木齐省垣起程，至八月二十六日到乌什城止，行期近五十日，途程三千余里。

《游历蒙古日记》

（清）余培森撰。培森字松崖，安徽来安县人，清举人，候选知县。曾任新疆参谋处提调、孚远奇台县知县、迪化府知府、都督府秘书、阿尔泰办事长官秘书等职。此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新就职记程之作。于三月二十八日自京起程，经归化转外蒙各地而入新疆孚远奇台以达迪化，时已八月十七日矣。又于民国二年九月二十日自迪化起程，十月二十七日到达阿尔泰，亦有日记。

《昆仑旅行日记》

（清）温世霖撰。世霖字子英，又号支英，河北天津人。曾投考水师电报各学堂，后学幕，就督署任文案。寻创设天津

普育女子学校及举办《醒俗》、《人镜》、《自由》等报，鼓吹新政。又组织请愿国会同志会，联合各省学生搞救国运动，赴京请愿，建议迅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因此触怒清廷，由直隶总督陈浩龙奏参逮捕，遣戍新疆。此书即遣戍时沿途所记，乃由天津转保定，经河南、陕西、甘肃而至新疆乌鲁木齐报到。其人参与学生运动，故为孙中山所重视，并派员看视。其所至之处，被其乡人商团所款待，虽当时目为政治犯，须严加管束，其实若到戍所，仍有官宦与之往来。如记中往见迪化张知府及臬司杨增新问管束之法，均答“已到了迪化即算完事”，遣戍犯员，仍可作幕教学也。

《抚新纪程》、《壬子回程记》

（清）袁大化著。大化字行南，安徽涡阳人。以参淮军戎幕游保至道员，历任徐淮海道、奉天水边道，升河南巡抚，调新疆巡抚。虽在新不及一年，而支持编纂《新疆图志》，成为名作，其功殊不可湮没。而此记程中，亦自开封启行，乘火车至汜县，再至西安。今仍节自兰州始。大化关心吏治，更注意矿藏，凡经过之金、煤各矿，莫不详志，特别对于各地水井，极为关注。人新归其管辖，故当即命令守牧之吏，凿井开渠。其重视水利，于此可见。乃宦新不久，即为鼎革。其辛亥始末，别有钟镛之作，故不详述矣。其壬子回程，乃自乌拉山等地，经蒙古而返，与去程殊途，亦属可取也。

广东通志稿

广东通志稿　原名《广东通志未成稿》，（民国）朱庆澜、梁鼎芬、邹鲁编。此稿先后两次编撰皆未成。前编十九册，后编一百二十册，合共一百三十九册。内容分为训典、山川、地形、兵制等三十门，叙事自清初至民国二十三年，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清代和民国广东史料，特别是民国年间广东在土壤地质、兵要地理、人口调查、司法警务、物产及其进出口、契税盐法、外交侨民、公路建设、人物列传等方面的资料尤为丰富。如人物门，共辑清代、民国人物传记九百一十六篇，其中有邓世昌、冯子材、黄遵宪等近代著名人物，以及朱执信、邓荫南等资产阶级民主志士。又如物产门，以大量的文字、图表详细介绍了民国年间广东粮食、蔬菜、蚕丝等生产及进出口情况，以及与上海等地的比较。志中附有十四幅用手描、蓝印、石印、油印等方法制作的地图。原稿藏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现影印本共五册，卷前有林子雄影印前言。

清道光二年（1822），两广总督阮元修《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其后九十余年，广东无修通志记录。1914 年，教育部咨文各地编修乡土志，用作学校教材；1916 年，教育部会同内务部咨令各地编纂地方志。当时广东地方人士对重新编纂《广东通志》是十分积极的，早在教育部咨令修志之前的

1915年，广东修志馆已经成立，地址在原广雅书局。纂修通志的班子亦已组成，监修者名单虽以广东军阀龙济光在前，实际上主要由1916年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主持，朱氏在其《续广东通志序》中简述了这次纂修省志的缘起与经过。此外，在续修《广东通志》职员名单中，总纂、分纂、收掌、分校、采访、誊录等职务由一批前清朝的遗老，包括梁鼎芬、易学清、陈庆桂等粤籍著名学者担任，其编纂动机和体例乃延续清代之传统。民国初年，军阀统治，民不聊生，修志事业艰难开展，虽朱庆澜说是“仅数月而成书过半”，事实上其成果只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十九册志稿而已。

1928年，广东民政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的朱家骅向国民政府会议广州会议提出纂修《广东通志》的议案，1929年经广东省政府第一百零七次会议研究同意，将原广东修志馆易名为“广东通志馆”，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任馆长，温廷敬为总纂，并通过《广东通志馆规程》。1931年，许崇清辞职，通志编纂停顿。

1932年2月，邹鲁任中山大学校长，出于“学校和社会应该发生密切的联系关系”的主张，他接受了广东省政府委托，同时出任广东通志馆馆长，并将通志馆移至中山大学内，延聘学校的历史、地理学教授从事编纂业务，“务期早日完稿，以成我粤文献”（邹鲁《回顾录》卷三）。当时，邹鲁提出要编纂“适应时代的省志”，重新拟定志稿总目，督促落实通志修纂。邹鲁在《回顾录》中说，志稿“在一九三八年学校西迁前，全部已告编成。但因经费缺乏，只先印了《列传》四本，其他稿件，由于学校搬迁，能否保全，诚属堪虑”。邹氏所说

指的是民国年间中山大学出版组铅印本《广东通志列传》四卷，而从现存邹鲁主编《广东通志稿》一百二十册的情况看，它只能算是一部十分初步的志稿，似乎非如邹氏所说“全部已告编成”。

正如上述，广东在民国期间经历两次修志，前者可简称为“朱志”，后者则简称为“邹志”。朱志历时数月，只开始编写了训典、山川、兵制、前事略、人物志、艺文志几部分，内容文字仍以抄录各府、州、县志为主，多用朱印书口有“续广东通志卷”，或书口下“广东志局”，其余偶为绿色方格的稿笺，每册封面页上盖有初辑、覆辑者的姓名（朱印）及“广东通志馆图书”朱文大方印。在训典门，每页稿纸边栏外盖着录事、分校者的姓名（朱印），以备查检，体现出编纂者的规范认真态度。书中还有用毛笔注明“校对无伪”，落款时间为民国六年旧历三、五月间。

1929年，广东通志馆重开，编纂业务断断续续，据原编纂之一冯愿撰写的《通志馆编纂认定门类成绩表》记录，他是1929年7月到馆的，当时未任命总纂，各县征访工作尚未开展，一切规程无从着手。1930年，温廷敬担任总纂，确定了分为郡县沿革、职官、选举等五十二门的《征访条目》，当时通志馆同时致函各县县长，聘用各县征访员根据《征访条目》进行搜集采访工作。以后编纂进度仍然缓慢，是年，“各县征访稿到馆寥寥”，仅完成《列传》四卷及《政经》一卷。后至1931年8月，广东通志馆陆续收到了各地送来的采访稿六十本（件）。

1932年，邹鲁到任，曾拟定通志总目为：列传、外交、古迹略、教育、金石略、宗教、艺文略、物产、宦绩略、职官

表、财计略、舆图、矿物地质、民族略、风俗、灾变、公路、林业、航政等二十余门，以后邹志除部分内容是抄录朱志外，其他大部分是按此分类编纂的。

在中山大学，邹鲁把通志编纂业务与学校的教学研究相结合，该校出版的《文史学研究所月刊》详细刊登了《广东通志》的编纂体例、总目及说明、征访条例、征集广东名人传条例等资料，从中可略知通志编纂概况，以及从旧式方志向新体方志过渡的设想。当时为编纂好通志，中山大学兴起了对广东区域史的研究热潮，主要成果有罗香林的《广东通志民族略系篇》，朱希祖的《广东通志馆征访条例》、《广东通志略例及总目》、《广东通志总目说明书》、《明广东东林党传》，以及温廷敬、邬庆时、丘复等人的研究文章。此外，通志馆还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刊登《广东通志搜集外港通志》和《完成广东通志进行讯》。

虽然朱志与邹志均属未成稿，不少内容仍属初稿，与正式出版的地方志尚有一定距离。但由于它们均是稿本，又因为广东从道光至民国一直未曾编纂通志，所以两部志稿中不乏珍贵资料，从而反映了清末民国间广东地区在政治、历史、文化、地理、军事、科技、人物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情况。

朱志书前有朱庆澜《续广东通志序》，内容依次为：职官表、训典、晷度表、山川略、兵制、前事略、人物志、艺文志，其叙事自清顺治元年（1644）至清宣统二年（1910）。其中《训典》收入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朝廷上谕。朱志的主要内容是人物传记，约占全书百分之六十，其中包括广州、韶州、潮州、肇庆、琼州府和嘉应州的人物志以及广东儒林，共

有六百八十九人，传记内容来源于各府、县方志，亦有部分来自诗文集、家传、墓志铭、行状以及采访册等。人物传记中有近代粤籍名人冯子材、黄遵宪、邓世昌，还有曾当过“海盗”的传奇式人物张保仔、郑一嫂等。

邹志书前有题：邹鲁修，温廷敬等纂。其后的“续修广东通志职名”仍原封不动地抄录朱志的纂修人员名单，说明了它承接朱志的续修关系。邹志叙事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内容分为训典、山川略、地形、地质概要、兵要地理参考、堡寨、城市、村制、医院、寺观、灾变、警政、物产、税收、沙田、盐法、兵制、外交、公路、航政、邮政、前事略、大事记、艺文略、金石略、集古略、列传、杂录等二十八门，此外还有近古时代之刑制、铜鼓篇、六祖坠腰石刻字，以及广东通志馆宋元石刻、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序等文章。

由于邹志编纂于民国中期，收辑和保存了大量清代、民国的广东史料，特别以民国年间广东在土壤地质、兵要地理、人口调查、司法警务、物产及进出口、契税盐法、外交侨民、公路建设、人物列传等方面的资料最为丰富。

以物产为例，介绍了清代、民国时期广东大米、小麦、黄豆、花生、番薯、蔬菜、水果、蚕丝、茶叶等作物的生产情况，并列有《广东各埠洋米之进量表》、《广东输入面粉表》、《广东埠输人小麦表》、《广东果物输出香港价值表》、《广东与各省果物输出比较表》、《广东蚕茧之出口表》、《广东缅（蚕）丝与各商埠出口比较表》、《广州蚕茧出口与上海蚕茧出口比较表》、《广东近数年麻之出口数量表》、《广东棉花各埠出口表》、《广东茶叶近数年出口数表》，上述各表颇为详尽地记载了民国八年

(1919)、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年（1927—1931）广东粮食蔬果、生丝蚕茧和棉麻茶叶的进出口数量，以及与上海等地的比较，翔实地反映了当时广东作为主要出口省份的情况与地位。

1934年，广东通志馆曾向广州市社会局了解广州地区各公立和私立医院的数目及其沿革概况，并特别设计了一份《医院调查表》，交由各医院填写上报，当时广州市市立医院、广东妇孺医院等都参加了这项调查。在邹志医院门，我们看到了详细记载有近代以来广州博济医院、国立中山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广州市市立医院、柔济医院、私立广东光华医院等十二间医疗机构的历史沿革和业务状况。

在盐法门，邹志记载了广东盐业的制度沿革、生产分布，以及大量的法规、章程和统计资料，其中有《历任广东盐政长官姓名籍贯任期表》等第一手材料。

外交门较多反映了广东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形势，专章介绍“鸦片战争”与“中法甲申之役广州湾之租借”，以及“广东人口与旅外侨民”、“租借地及租界、外侨”和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928—1935）在广州市居住的英、美、德等十四个国家的侨民人数和职业。

公路门有第一、二、三期琼崖（今海南省）各县公路修筑概况表，详细记录了当地公路建设的起止点、长度里数、股本总额、兴竣时间、公司名称和举办性质；而邮政门则列出了全省一千一百四十一个邮局及邮寄代办处的地点、名称和等级，细致入微地揭示了当时广东邮政概貌。

在税收门，记录了自民国二年至民国二十年（1913—1931）广东在烟酒、筹饷、契税等方面的税收情况；灾变门的

内容是从广州《民国日报》上摘录下来的有关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报道，记事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

邹志在朱志的基础上进行人物资料的收集整理，除烈女、耆寿外，共收二百二十七人，其中大部分为明、清人物传记，同时又有朱执信、邓荫南、郑士良、邓子瑜等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的生平事迹。

地图是邹志的特色之一，在河源、新兴、梅县、阳春、从化、赤溪、英德、茂名、开建、五华、大埔等县的地理参考书中，多附有地图，其绘制方式有手描、蓝印、石印、油印等，甚至还用彩色者，它们呈现了民国时期广东各县乃至乡镇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测量绘制舆图的水平。

《广东通志稿》首次将两部志稿一并刊行面世，既有利于人们对清末民初广东历史的研究，同时纠正了过去曾有邹志“不幸被红卫兵焚毁殆尽”的说法（见1987年台湾《广东文献》季刊十八卷二期黎德邵撰《省志续编的展望》一文）。为了方便读者和尽量减少篇幅，我们将原书的文字和地图缩小，分成上下栏；若遇两部志书重复的文字，仅保留朱志的内容，如邹志第一、二、三册中的“续修广东通志职名”和“训典”，以及第五十三、五十四册“兵制”的内容均抄录朱志，皆删略不刊。其他门类或人物传记，虽两志稿之间有的题目或人名相同，但内容文字有出入者，仍然保留。同时依朱志和邹志原来的先后次序重新编排了目录，俾读者参照阅读。

清代粤人传

清代粤人传　（民国）佚名编。民国十五年（1926）由宦京粤绅自清史馆抄出。分大臣、忠义、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六类，传稿一百七十七篇，计传主三百五十四人。是稿传主武人多于文士，对于清朝台湾林爽文起义、川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重大事件，以及中英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均有记述。部分列传与《清史列传》相较，文字亦有出入。属孤本，现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卷前有谢晖影印出版前言。

《清代粤人传》，清“国史馆”原编，佚名辑。此稿于民国十五年（1926）由宦京粤绅自清史馆抄出，寄回广州的黄文裕公祠，交由黄慈博氏保管，并拟付石印出版，但因经费无着，不能成事。后黄慈博病死，遂将此书稿售予广东省立图书馆。按清史馆设立于民国三年（1914），废弃于《清史稿》成书之民国十六年（1927），则此“宦京粤绅”当为修《清史稿》之编纂人员。

《清代粤人传》据清史馆稿辑之《清史列传》相比较，时间早两年，且《清史列传》粤人被删者超过三分之二。如《大臣传》本稿六十五篇，《清史列传》只录二十篇；《忠义传》六十八篇，只录二篇；《儒林传》九篇，只录六篇；《文苑传》十三篇全录；《循吏传》十篇全录；《孝友传》五篇，而《清史列

传》则全无。所以，《清代粤人传》有一百二十一篇传记为《清史列传》所无，其资料价值足可见珍贵。

从形式上看，《清代粤人传》遇“上”、“皇”、“天子”、“谕令”等字语皆提行抬头以尊清制。抄写时均按“国史馆”原先格式，而《清史列传》无此格式，从头到尾连续排写。由此可见，《清代粤人传》更接近“国史馆”文献原稿，堪称“国史馆”纪传资料的翻版。

从内容上看，《清代粤人传》传主武人多于文士，许多在鸦片战争以后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之传记为《清史列传》所无。如民族英雄邓世昌的传记，详述邓世昌的仕途履历，特别叙述了邓世昌在甲午战争中对日作战的详细经过，全面记载了黄海海战的战况与邓世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从文字上看，《清代粤人传》与《清史列传》相较，文字有出入。《清史列传》刊于民国十七年（1928），出于对友邦的和善，编辑者对“国史馆”原稿中的部分蔑视洋人的称呼如“夷人”、“夷务”、“夷船”等字句均改作中性处理；在改正过程中，《清史列传》部分行文又存在漏、误、错字的情况。从这个角度上讲，《清代粤人传》由于直接抄自“国史馆”原稿，其对《清史列传》的校勘价值也就很明显了。

《清代粤人传》系记载广东省籍之清代人物的传记，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清史列传》中粤人记叙的不足，对清代广东人物的研究当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这些粤籍人士的仕宦遍及全国，故其传记内容非仅局限于一隅。这就使《清代粤人传》对整体的清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清代粤人传》属海内孤本，未尝刊行过。此书原抄本曾

题《清史粤人传》，但并非抄自《清史列传》，故影印时为避免误会而改为今名。原抄本有夹条，今改置于卷末，并说明其所在页码。又为了方便读者，今按原书编排了人名目录。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续编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续编 杨铎、熊秉坤、黄中垲、邓飞鹏、邓玉麟、陈霁云、曹弼等人撰。阳海清、孙式礼、张德英等编。两书所收多为未刊稿本、抄本，少数为稀见印本。共有专著十一部、回忆录八篇、人物传记十二篇、文告一篇共三十二篇。其内容包括由辛亥革命参加者及其他有关人士撰写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专著从众多未刊和已刊文献中摘录类编的史料。全书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现存湖北省图书馆，二书卷首均有阳海清等前言。

《辛亥建国史纲》（手稿本），著者杨铎，字闻泉，光绪癸巳（1893）生于湖北夏口（今汉口），卒年不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又调管鄂北榷政。铎既躬与鼎革之事，又游心班马之业，纂述《辛亥建国史纲》三编。全稿以事为纲，系之以文，详之以注。凡辛亥革命文献，多所搜集、稽核。辛亥以前发难诸役，不问巨细，无役不书；各省反正情况，亦记载较详。其记事始于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终于戊辰（民国十七年，1928）。尤为可贵者，著者注意矫正有关专著之失误，如前编注十二："唐才常等谋举事武汉，不济死之。杀之于紫阳湖畔。而冯自由著《革命史》及徐珂辑《清稗类钞》均误为溜阳湖。"注五十四："邹鲁著《党史稿》记，于丁未之冬，称

为钦廉上思之役；冯自由著《革命史》记于戊申之春，称为马笃山之役。其实一事也，考是役为二月下旬。”等等。稿中有钟孝先、徐忍茹、陈瑞冥浮签校注。所不足者，本书引文皆未注明出处。且后编缺“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中正宣布下野；蒋总司令通电复职，率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接收北京，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全国宣告统一”六节。未知系著者撰稿未竟，抑是后来佚失？

《辛亥武昌起义纪实》成稿于民国二十二年，向未付梓，且不题书名，今由湖北省图书馆据其内容拟定。著者熊秉坤（1885—1969）原名祥元，又名忠炳，字戴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依然健在的辛亥老人之代表人物。其早年投身湖北陆军工程第八营，后加入共进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直接参加了武昌辛亥首义。是年10月9日，革命党人之汉口机关遭到破坏，武昌戒严。次日下午七时率众起义，迅即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又组织敢死队攻克督军署。后任第五旅旅长。1913年在南京参加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在广州任大元帅参军。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后长期任国民政府参军。1949年以后，曾任湖北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病逝。该书首章论述了湖北革命之起源及其经过，对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于辛亥首义中之经历记之尤详。如首先发难及事前布置，军械所内应及接炮队攻占督署，以及当夜各方响应之先后，领队之人物，出队之多寡均据实作了记载。于彭、刘、杨三烈士就义情形亦有所记述。著者乃辛亥首义之参与者，以其所睹撰为斯编，无疑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辛壬闻见录》之著者为黄中垲，字逸民。湖北江陵人。早年留学日本，习法政。1910 年回国。1911 年应汤化龙约，在汉口筹办商业学校。辛亥首义，约汤化龙、胡瑞霖、舒礼鉴同往劝说黎元洪，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急起任事。黎答应任武事，民事应由汤等承担。黄遂参加了军政府工作，颇受黎倚重。黄兴到汉后，亦器重黄中垲，常参与枢密工作。1913 年 4 月二次革命失败，黄中垲深感政治失意，遂脱离政坛，蛰居上海。其后作者回首往事而撰成是稿，名曰《辛壬闻见录》。因所述均为作者身经目击，感受甚深，故写来形象生动，非彼泛泛而谈。如记黎元洪受民军拥戴，勉任都督，但心存观望，既不视事，亦拒不会客，终日居于斗室，兀坐榻上，不言不笑，有问事者则拱手嗫嚅。粗粗几笔，画出了一个“黎菩萨”。再如记袁世凯应清廷召赴京后，扭捏作态，恫吓威慑，使隆裕就范，大权独揽，玩弄诓、载澧于掌股之上，其枭雄本色亦栩栩如生。其余所记，如首义后社会秩序之混乱，外国公使团对革命之态度，接收电报局、招商局之过程，制定国旗之讨论等，亦可补其他史书之阙佚。

“回忆”八篇均为稿本，乃辛亥革命志士或与其有关的人士所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写下了个人闻见，可资研究辛亥革命者参考。如朱树烈（1882—1951）字舜卿，湖北沔阳人，（共进会员）在《辛亥八月十九夜武昌首义之回忆》中，写革命党人推黎元洪为都督而黎氏首鼠两端时，对黎慷慨陈词，并举刀自杀，血溅满座，促使黎表示愿与革命党人“共竟革命大业”。阳夏战争时，起义军失利，形势危急，朱氏与甘绩熙赴各营组织敢死队百余人，连夜夺回磨山、扁担山。再如谢楚珩

（原名超武，湖北枣阳人）曾在湖北新军二十九标当兵，参加共进会。武昌起义时随众进攻楚望台。所撰《回忆二十九标》一文，虽已残缺，但对该标在起义当时的动态记之甚详。再如黄世杰（字慕三，号恢亚，湖北黄冈人）于湖北讲武堂毕业后，经祝兰亭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遂矢志投笔从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侧身于湖北陆军第二镇工程营（次年该营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工兵第十一营前队），潜伏工作，联络同志，宣传革命，颇著成效，竟争取士兵过半。武昌起义时，会同李鹏升、杜昌年率领五十一人进驻武胜门而严守之，更占领凤凰炮台以为控制，并令陆军乐、李玉斌等占领中和门及楚望台；次日又奉命成立工兵第二营，进而参加阳夏之战。这在其所撰《辛亥参加首义回忆录》中均有反映。《武昌起义三日记》系作者受吴醒汉之嘱而写，吴氏系同盟会员，曾任湖北新军三十标排长，参与策划辛亥首义，尽管作者事迹不详，而其所记应可作参考。

“人物传记”七篇之传主梁耀汉（后更名栋，字隽氏，号瀛洲，湖北汉川人）、刘英（原名光铭，字聃述，湖北京山人）、汤化龙（字济武，湖北浠水人，光绪进士）、张鹏程（字翼洲或义舟，湖北恩施人）、贺公侠（原名大镜，字鉴山，号剑川；晚年更名守中，字抱一。湖北天门人）、邓贤才（字鸿卿，湖北京山人）、蔡鹏来（字仰之，湖北钟祥人），或直接参加武昌首义，或在外省响应，或在其前后为革命奔走呼号，其事不可湮，其功不可泯。由其亲属、挚友或学者分别撰写行述、事略，不惟褒扬其革命精神，可以激励后辈，其所记材料亦或多或少能补史志之阙，可资研究者采撷或参酌。尤值得一

提者，章太炎先生撰写并手书之《刘聃述记》，不啻其本身是一篇重要文献，先生手迹及诸家题跋亦属墨宝，弥足珍贵。至于各篇传记中的某些溢美之辞，读者诸君自会鉴识。

黎元洪所发**《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流布甚稀，应是治史者所渴求而难以觅得之史料。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续编》，本编计收撰述六种、文牍二种、传略五篇，均为著者手稿，或为稀见印本。

(一)《纪元前事略》

系前陆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之邓飞鹏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所写稿本。邓氏参加了辛亥旧历八月十九夜之起义，此稿所记为四十一标在当天的动态，侧重于个人所经历与闻见者，可供辛亥革命史研究者采撷和比勘。

(二)《辛亥革命史》

曹弼撰。稿本。以“国立武汉大学毕业论文”稿纸誊写。著者生平年里无考。稿分五章，分述“辛亥革命的起因”，包括其“远因”和“近因”；“武昌首义的经过”，包括首义以前的革命运动、首义的真相、民清两军阳夏对敌战况；“各省独立的经过及其影响”；“民清议和与南京临时共和政府的成立”，包括议和的先声，经过及其结果，临时共和政府的酝酿，总统选举、政府组织、总统改选与颁布临时约法、政府北迁；“辛亥革命与国际关系”，包括革命发生后的列强态度、善后借款及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通读全稿不难看出：著者对史料的占有尚不充分，对某些史事的分析不够深刻，但于史料之搜访与爬梳仍属功不可泯。

（三）《辛亥武昌起义经过》

邓玉麟撰述，曾发表于《大公报》某年“国庆特刊”。邓氏系湖北巴东人，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后任第四师师长、广东大元帅府参军、北伐左翼军第一路司令。兹据抄本影印。

（四）《湖北革命实见记》

作者胡石庵，原名人杰，又名金门，字天石，湖北天门人。早年肄业于武昌经心书院。曾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被清政府逮捕，获释后投保定徐锦帆军。未久回鄂，再入经心学院读书，因进行反清宣传而被开除。后两度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归国后，担任《中西报》、《公论报》、《扬子江小说报》之主笔。集资创设大成印刷公司，印行革命书报。武昌起义时创刊《大汉报》，是为民国首家革命报纸。民国三年（1914）因反对袁世凯再度被捕，袁死后始获释。晚年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民国十五年（1926）去世。其“叙例”称：“本书由前至后，皆由石庵一身所经历者从实记载，绝无丝毫铺张隐饰于其间，盖决心为湖北革命留信迹，不求荣，不畏祸，阅者鉴之。”“本书系由八月十八日汉口宝善里机关部破坏起，至元年正月一日孙大总统就任止，其中或繁或略，皆就石庵一人所闻见者为准，遗漏之憾，自不待言，……阅者谅之。”现存第一册，所记为清宣统三年（1911）旧历八月十八日至廿九日发生之事实。此书于民国元年（1912）由大汉报社印行。据书前“绪言”及范韵鸾、颜觐棠、金人铭序，知其撰写于民国元年一至五月间。其第二册究竟是未予付印，抑是湖北省馆缺藏，因无据可稽，难能确定。

（五）《中山先生驻鄂记》

民国元年（1912）四月九日，应副总统黎元洪之邀，中山先生“偕各随员”及“公子一、女公子二”来鄂视察，在辛亥首义之地驻足五天。本书于其在鄂期间之行止言论，诸如孙黎会晤、发表演说、视察汉南汉北，以及武汉各界欢迎之盛况和民众的反应，记之甚详。

著者陈霁云，字古囊，号僧魂，湖北宜都人。时为《民国公报》记者，得以目睹先生一切活动始末，故其所记全面、详细、准确。惟其以骈体纪盛，文辞深奥，语义艰涩，读来诘屈聱牙。此书于民国元年（1912）五月由鄂军印刷局铅印，流布非广，可补后撰之中山先生传记、年谱一类著作记此五日事实之疏漏。

（六）《辛亥粤乱汇编》

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同年三月十日发生于广州的温生才刺杀满人将军孚琦事件、由黄兴等领导的三月二十九日起义，正是武昌首义的准备和预演。埋葬在广州黄花岗和武昌辛亥烈士陵园的烈士们的头颅和鲜血系为着同一理想而抛洒。本书铅印于宣统三年（1911）（辛亥）六月初一，距事件发生仅两月，无疑是最早反映此次起义的文献。作者岭南半翁目睹了这两次巨变，有感于胸，“爰搜罗斯事颠末，并采集各报所载，辑成是编，俾觇世变者所考焉”（见《辛亥粤乱汇编·缘起》）。虽以“粤乱”名书，但其编写态度较为客观，可信性强，足资史家采择。影印底本为胡绳旧藏，书中有其批注数则。胡氏藏书已悉数捐给襄樊市图书馆，兹由该馆提供。

（七）《孙中山书牍》

民国元年（1912）七月由吴砚云编订、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孙中山书牍》（一名《孙大总统书牍》）二卷，是迄今所见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之最早的书牍汇编，分宣言书、公牍、咨文、函牍、批牍、附录、祭文七类，计六十六篇。民国初建，百业待举，这些书牍成为中山先生在民元上半年间为国为民而辛勤劬劳的见证。解放后，曾从中遴选四十六篇汇入《孙中山全集》。惟原书各篇均未署日期，是为美中不足。

（八）传略六篇

档案资料显示，原湖北省通志馆曾于40年代征集过湖北地方文献，邀请部分辛亥革命参加者及其亲属、僚友撰写回忆录、传记和纪念文章，我们已从中择取若干篇汇入已出版之《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兹再择数篇列入续编。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情况，当属有用之史料。

此外，《请与梁钟汉从优褒恤文》、《詹大悲事略》、《邹镛事略》三文原无题目，影印时为方便读者面另拟上题。

淹　留

淹留　廖平子著，佟德山整理。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手抄期刊，一向未见藏书单位著录。这便是抗战兴起时老同盟会员廖平子先生避居澳门期间，以抗日战争题材为主要内容的诗学专著。亲自撰写、作画、编辑、装订，每期手抄十五册，寄港澳等地知名人士。深得蔡元培等人好评，被誉为“空前绝后，呕心沥血”之作。以诗文为主，兼附插图，内容为宣传抗战，抨击时弊。全书共四十期。现将广东中山图书馆珍藏的一至三十八期，影印出版，为中国现代史、报刊史及地方文献的研究提供一份资料。本书影印本卷首有佟德山序。

廖平子（1892—1943），字苹庵，号任肩。出生于广东顺德一世代书香门第。青少年时，聪颖好学，诗文书画均有所造诣。弱冠时代，即与邑人黄节、卢信等著文抨击清政，时人称为顺德三杰。早年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与郑贯中、卢信、陈树人等在香港参加同盟会。1907 年东渡日本留学，1909 年学成归国。先后担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广州平民日报》、《美洲大汉日报》副刊编辑及记者，著作甚丰。辛亥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稽勋局审议员。1913 年讨袁失败，弃职归粤，专心社会慈善事业，曾先后主持精斌体育会、花埭孤儿院等，成

绩卓然。后息影家园，除躬身园艺外，以诗文书画自娱。日寇侵华，组织抗战敢死队，失败后避居澳门。

1937年抗战兴起，1938年秋广州沦陷，日军继而侵占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县。廖平子一腔热血，出售桑田数十亩，所得尽购枪枝弹药，号召农民组织抗战敢死队，揭竿而起，抵御日伪。后因书生言兵，不到二十二日便告失败而携眷避居澳门，距广州沦陷刚好一月。这时廖平子已一贫如洗，于是手书发行《淹留》，以文为生。《淹留》每半月发行一期，每期手抄十五册，每册收费十元，月以三百金以资糊口。《淹留》先出四十期，约1941年夏改名《天风》，继续发行了十四期。1941年12月18日日军侵占香港，澳门危如累卵。廖平子决计归粤，几经辗转，于1942年春抵粤北曲江，居莲花山。因生活无着，仍操澳门故技，改出抗战诗史《予心》，于1943年3月16日发行第一期。《予心》仅出五期，即因病卧床，第六期尚未寄出，于9月19日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淹留》创刊于1939年2月16日。刊名出自屈原《离骚》"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原刊高十九公分，用连史纸抄写，字体秀丽。封面左上方《淹留》二字，下写明发行日期，钤"五山一农"朱印一方。右上角书写"诗学专著"四字，下写明期数。扉页用宣纸作画一幅，多为结合本期内容之山水画，寥寥数笔，颇有宋元古意。内文第一页下方钤著者斋名"自怡室"朱印一方。每期内文八至九页，半页八行，每行字数不一，白棉纸装订。1983年香港人士何建华先生将毕生藏书二万余册移赠广东中山图书馆，内有《淹留》三十八期（册），这一几被时代湮没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重现读者眼前。

《淹留》第一期，刊有《发刊词》一文。阐述了诗人创办这一刊物的宗旨："《淹留》者何？志无成也。读书无成，抗战亦无成也。吾将以毛墨为原料，以诗歌为工作（具），身上百千万毛孔，一一放出无限光芒，以与敌作殊死战。内则加笔伐，表同情于志士仁人，于是国魂指日以复，国难指日以苏，个人人格亦永远不会损失，以存天地正气。"廖平子是一位多产诗人，据《淹留》三十八期统计，共成诗四百一十首。其中五、七言绝句五十七首，五、七言律诗一百六十三首，五、七言长句一百九十二首，另文三篇，函一通。在这四百多首诗歌中，绝无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淹留》第二十一期，载有《淹留》自序一文，凡一千七百言。序文旗帜鲜明地指出文人之笔锋不能为国家为民族捍卫，抑亦文人之耻也。接着诗人悲愤地呼吁："虽然羞自羞，耻自耻，悠悠千百载，于此中致力者曾几何人？欲中国免为各外族蹂躏其可得哉！其可得哉！"掷地有声，使人振聋发聩。廖平子对文人的责任，诗歌的任务，诗歌创作应如何与时代的前进、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紧密结合，阐述了极其精辟的见解，这一至今仍闪烁着光芒的文艺观，出自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一位老同盟会员的手笔，的确难能可贵。

诸葛亮传记集

诸葛亮传记集四卷附录二种　陈翔华编。本集汇印晋、宋、元、明、清各代所撰诸葛亮的传记共四卷。所收录有早期刻本及其他珍贵版本，计宋刻本二种、元刻本一种、明刻本八种、清刻本八种，以及清文澜阁四库全书精钞本一种、清钞稿本一种、日本刻本一种。其中有许多是极为稀见善本书。书后附编者新撰《诸葛孔明年谱新编》、《诸葛亮传记书（篇）目》二种。卷首有陈翔华《论诸葛亮的历史影响与其传记》代序。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草庐，他提出占据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两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所谓“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后刘备根据其策略，联孙攻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并占领荆益，建立了蜀汉政权。刘禅继位时，他被封为武乡侯，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建兴十二年（234），与魏司马懿在渭南相拒，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传曾

革新连弩，能同时发射十箭，又制造“木牛流马”，便利于山地运输。著有《诸葛亮集》。他是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民间故事对他的智慧谋略多所渲染，被后人称为足智多谋的人物。他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

自西晋至清代的一千六百多年间所出现为数很多的诸葛亮传记或评传，是研究诸葛亮与其影响，以及各个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现象的重要文献。

诸葛亮睿智的政治预见及其谋略，对于转变时局乃至影响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诸葛亮在刘备三顾时，首先提出了“隆中对”的构想，谋取统治势力相对薄弱的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形成与曹操、孙权相抗衡的鼎立局面，然后待变北伐，进而再图王霸之业。后基本上证实了诸葛亮的科学预见。其使吴结盟而取得赤壁之战的抗曹胜利，才促使刘备迅速摆脱危困境地而崛起成为三足鼎峙的局面，从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走向三国时期。

诸葛亮治蜀的政绩卓著。他在“外结好孙权”的同时，致力于“内修政理”，使蜀中“风化肃然”，而成为当时政治搞得最有条理的一国。在法治方面，他主持制订法典《蜀科》，并亲自撰作《科令》、《军令》等律令，行法严明，纲纪整肃。在用人方面，他选贤用能，既大胆录用刘璋姻亲旧部、益州人士以及原来的反对者，又善于从下层破格选拔良才，所以蜀士都心悦诚服。在发展经济方面，他重视农业生产，即使在北伐期间也“休士劝农”，分兵屯田。还关心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发展盐铁、织锦、建筑以及交通运输事业，使国力得到增强。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他采取和抚方针，既大量任用少数民族

上层人士，又传播先进文化、开发经济，改善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有力地维护国家的统一。

诸葛亮具有高尚品格和杰出才能。他操劳国事，强烈地表现出对事业无比忠诚的献身精神。他开诚布公，集思广益，鼓励部下勤攻己阙，并引咎责躬。他宁静淡泊，谨慎克己，清廉自奉。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声烈震于遐迩”（西晋张辅《名士优劣论》）。早在他的生前，其理国干才便已受到敌战之国曹魏谋士与结盟邻国东吴君臣的屡屡称道。他入蜀的次年（后汉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平汉中时，谋士刘晔劝之乘机进攻初取益州的刘晔，说：“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三国志·刘晔传》）至魏文帝曹丕即位，太尉贾诩也道“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而认为此时蜀国未可轻取（《三国志·贾诩传》）。这些是敌国人士对诸葛亮政治的称许。吴王（孙权）黄武三年（224）张温使蜀，目睹诸葛亮之治而归来“称美蜀政”（《三国志·张温传》）。至孙权称帝而与蜀使共结盟约，其词有云：“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三国志·吴主传》）这些可见盟国东吴君臣的赞扬。

诸葛亮的去世，更加引起蜀人的深情追怀，甚至被他流放的废官也都痛悼不已。廖立曾任侍中、长水校尉，李严原官骠骑将军、中都护，俱以居大位而遭诸葛亮之废职为民，流徙外乡。但闻诸葛亮卒，廖立“垂泣”痛哭，李严伤悼“发病死”。对于这位赏罚公平、法治严明的杰出人物，百姓尤为敬爱而怀念。在蜀中，一直广泛而自发地进行“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的纪念活动，最后朝廷才在沔阳为他立专祠。诸葛亮亡后四十年，西晋史学家陈寿说："（二百三十四）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上诸葛亮集表》）后来，袁准也指出："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袁子》）直至晚唐，古文家孙樵还写道："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子民如此而久也。"（《刻武侯碑阴》）他一直赢得群众的爱戴。

陈寿是最早为诸葛亮写传记者，诸葛亮卒后四十年，陈寿作《上诸葛亮集表》述评诸葛亮一生的功业，近人卢弼认为："此表文已可为武侯一篇佳传。"但是，从严格来说，最早的传记著作还应推他后来所撰《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终年六十五岁。少时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好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在蜀汉时，出仕为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者黄皓专权，陈寿不肯阿附，因而屡被谴黜。约至晋武帝泰始初年，被举孝廉，为本郡中正。先后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他仕途坎坷。著有《益部耆旧传》十篇、《古国志》五十篇、《官司论》七篇等（俱已佚）与《三国志》六十五篇。

陈寿《三国志》尽管也有自己的局限，但是无愧为一部历史名著，而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及后来的范晔《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其《诸葛亮传》不仅是最早的诸葛

亮传记，而且也是研究诸葛亮生平与思想足可以依赖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宋元明清各代纷纷有重新编撰诸葛亮传记之举。这些传记在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基础上进行整饰或改编，但与之又有异同。第一，在编撰动机上，明确地以蜀汉为正统。诸多编撰者“帝蜀寇魏”思想强烈，不承认三国时期鼎立的客观史实，却将其重撰之书命为《续后汉书》或《季汉书》等，而其中诸葛亮列传则成为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第二，在史料处理上，除以陈寿原传为基本架构外，还大量采录《三国志》其他各传、裴松之注及至其他野史异闻。所增补的内容，有些是陈寿当时未能看到的，但也有些则是陈寿的唾余。第三，从某种特殊需要出发而编撰。有的传记将诸葛亮写成名将，也有的写成道家，虽然不免与历史真人存在些差异，但倒也另具一格。

这些传记为宋胡寅《诸葛孔明传》、宋郑樵《诸葛亮列传》、宋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宋萧常《诸葛亮列传》、元郝经《诸葛亮列传》、明朱瞻基《诸葛亮传》、明李贽《诸葛亮传》、明魏显国《诸葛亮传》、明李廷机《诸葛亮传》、明谢陛《诸葛亮传》、明杨时伟《诸葛忠武传略》、明陈元素评点《汉诸葛亮传》、清朱璘《汉丞相诸葛亮传》、清王复礼《诸葛忠武侯传》、清尹于皇《汉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赐金鈇钺曲盖羽葆武乡忠武侯诸葛亮传》、清张江《诸葛亮传》、清章陶《诸葛亮列传》、清汪瑮《诸葛公传》、清汤成烈《诸葛丞相列传》。

以上历代所作的诸葛亮传记，是这个传大的历史人物给予

后来各个时期带来重要影响的产物。尽管诸多传记中的人物生平事略大致相同，而且也都作了程度不等的积极评价，但是由于编撰者所处不同的时代与思想状况，所以他们考察问题的着眼点与表述史实的手法也并不尽同，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传记不能不带有自己的色彩与印记。因此，我们研究历代的诸葛亮传记，也将会有助于对历史上思想文化现象的了解。

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

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一百种　陆行素、李健等编。此书收录天津图书馆独家所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善本古籍丛书，共一百种。内容分为：经部五种、史部三十八种、子部六种、集部五十一种；其中：明代稿本三种、明代刻本三十八种、清代稿本十九种、清代刻本十三种、清代抄本二十七种。均未列“四库”存目。卷前有陆行素的影印前言。卷后有李国庆的影印后记。

天津图书馆最早是天津直隶图书馆，由直隶提学使卢靖（字木斋，湖北沔阳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次年五月正式开馆。另外有两个前身：一是民国二十年（1931）建立的天津市立图书馆，一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建立的原天津图书馆。1952 年将三馆合并，改称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总藏书量约四十余万册，而古籍线装书约占其一半强。50 年代得周叔弢、徐世昌、徐世章、任凤苞诸先生的慷慨捐赠，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拨交的康有为弟子徐良、崇化学会等藏书。60 年代又得著名小说史家周绍良先生转让的明清小说八百余种、六千一百余册，政府拨交的民间宗教的大量宝卷，明版《大藏经》等。到 1982 年定名为天津图书馆时，全馆总藏书量达三百余万册，其中古籍线装书五十二万册，内含古籍善本书八千

三百余部，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者二千二百七十七种。内容上囊括经、史、子、集、丛；版本上包括唐人写经、宋椠元刊、明清精刻、活字套印、学人稿本、名家抄校本，以及日本、朝鲜刊刻的汉籍等。

此丛书就是从中精选出来的一百种，现就几个有特点的稿本及抄本介绍一、二：

稿本《钱罄室杂录》，经折装，十册，（明）钱穀辑。穀字叔宝，号罄室，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正德三年(1508)，《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徵明》传中两处提及他，却不过寥寥数字，只说他是文氏弟子、善画而已。该书末附文徵明之孙文从简跋文一则，于钱穀记录较详。此跋不仅是已知的钱穀传略的最早最详记载，而且对了解本书可谓指示门径者。钱穀家贫好学，以善画闻名，他一生纂集抄录的著述不少，惟无力付梓而大都不存。他编的《吴都文粹续编》，四库馆臣据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藏抄本录入《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此书另有丁氏八千卷楼抄本），原书五十六卷补遗一卷，四库本已缺卷五十三、五十四两卷。除本书外所知者尚有嘉靖十四年（1535）手抄《唐朝名画录》（见《过云楼书画记》书四）、二十三年（1534）抄南唐冯延巳《阳春集》（见《铁琴铜剑楼书目》）、三十六年（1557）辑《历代隐逸传》（见《涵芬楼烬余书目》）、四十年（1561）从同里彭年借抄元陶宗仪《游志续编》（见该书跋文）、四十三年（1564）抄宋陆游《南唐书》（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月》）、隆庆二年（1568）抄宋人编《续会稽掇英集》（见《善本书室藏书志》），至于他的《三国志类抄》、《南北史摭言》、《吴中人物志》、《长洲志》以及

《钱罄室诗集》，皆既不见存，也不见诸家书目著录了。他以高寿终，但卒年不知，只知道万历六年（1578）他七十一岁客居金陵王氏修竹馆时，尝为之作《兰竹卷》（见《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

此书是钱穀行书手书，仿类书体例，以类系事，杂录经、史、子、集，计分天文、时令、地理、圣贤、忠孝、德、让、智、命、友、公平、品藻、鉴诫、礼乐、杂纪、官职、敏识、愚昧、著述、书写镂板、藏书读书、史事著述、字义、拆卜、诏令露布杂事、箴铭诗什、族氏、名字、称号、名讳、祖父、母、儿、宗族、兄弟、任子、不肖、奖掖、劝勉、孤寒、膏粱、外家、姑、姐妹、妻子、美女、丑女、婚姻、妓妾婢、奚奴僮役、相貌、睡眠、梦、笑、啸、贫、愁、泣、侠、报、女德、老、言、谣、吟、头、目、耳、口舌、发、髑髅、物释（按，此类目序列次第，当非原作之貌，一是恐原稿有散佚不全之可能，二是收藏者得原稿之先后而装潢时所致），凡七十一类，个别类下且分有子目，如天文类下包括日、月、星、风、雪、雾、雷、虹，言类下包括大言、小言，物释类下包括禽、兽、果。各类目下分列记述，少则一、二条，多则十余条以上，或释义、或记事、或录相关诗文（如诏令露布杂事类下录有唐于公异《破朱泚露布》，箴铭诗什类下录有唐皇甫湜《著作郎顾君（况）集序》，啸类下录有晋成公绥《啸赋》，美女类下录有梁元帝、李白等人诗作）。综观全书，采集子部杂著类著作为多，且多朱元以前人著述，正经正史为少，个别处也有钱氏读书札记。本书充分反映钱氏读书之广，手录之勤，其中不乏今之难以经见甚或散佚著述，惟每项不标注出处，难

以探溯其源。

该书钤有“文彦可”朱文、“沿洲私印”白文、“谢林邨珍藏书画”白文、“洽卿私印”白文、“吴云平斋”白文、“二百兰亭斋藏书之印”白文、“听钟山房”朱文、“方塘之印”白文、“一名问渠”朱文、“颜怀之印”白文、“平泉居士”朱文、“刘世珩经眼”白文、“世珩审定”朱文、“刘世珩读”白文等。大体可知原稿藏于文从简，经谢沿洲、方塘、吴云、刘世珩等先后递藏，其来源有自，递传有绪。书前有罗振玉署端：“钱磬室先生墨迹，丁巳夏六月永丰乡人罗振玉书于海昌寓居”，并钤有“罗振玉印”、“罗叔蕴”二白文篆印，惟“磬”当为“罄”之误。末尚有方塘题词：“先生最妮古，手录百子强。抄自县罄室，珍比名山藏，先后有同癖（原注：此五帙前人已经装潢，白斋兄乃市得之），楮豪发妙香。再三题竟读，从缀自成章。”并有钤记二方。又，此书原未题书名，此书名乃收藏者（编目者）据其内容，参以诸家题署而定。

《天池杂稿》，（明）徐渭撰，稿本，蓝格，行草书写，字数不等，圈点涂抹笔迹犹存，是为初稿底本。渭字文长，号天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屡试不中，一生潦倒，以诗文、书画、戏曲遣忧排愤，佯狂于世。此稿对照其万历、天启间刊行的《徐文长文集》、《徐文长秘集》、《徐文长逸稿》，内容颇有出入，如《读文信公（天祥）仙岩祠焚吊》诗二首，《文集》卷七虽有载，然已失去“诗序”：“公从北使亡，至临海，一宿张和孙家，已举义，将赴公而公被执矣。临海仙岩百花洞，公往之，而投宿于张地也，今盛祠公于此。按公传：公生则某龙神庙不灵，死则复灵；公举义，江水随公义旗所指涨而流。公

败于梅领，吞□子二两，不死，饥八日不死。”凡九十五字；《答张君当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华裘及菽酒》书，《逸稿》卷二十一亦有载，然文题作《答张太史》，题注作“当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华裘及菽酒”，且缺文尾“后赘”以下凡四十六字。尤为可贵的是此稿本中尚有部分诗文，如《答朱太卿》、《答沈四书》、《达摩》、《送沈玉吾再北》等，为《文集》、《秘集》、《逸稿》失载。

《赖古堂未刻诗》，稿本，经折装，（清）周亮工撰。亮工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时称栎下先生，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一生饱经宦海沉浮，两度下狱，然才气高逸，记闻淹博，生平著述甚富，遭毁禁亦多。此稿为清顺治十五年（1658）手写七言律诗十一首、七言绝句二首，末有亮工自跋。

亮工在顺治十五年以前已有十一种诗集付梓问世，今惟《友声》、《晞鬯》、《闽雪》（见周在浚《赖古堂集凡例》），以及《蕉堂集》（见《赖集》卷二十三《题蕉堂索句图》）见于著录外，其余均不见于其传记、诗文及书目记载，这是其一。其二，周亮工在康熙九年之前已有自焚著述之举，待康熙九年他五十九岁时在江宁慨然叹曰：“一生为虚名误，老期闻道，何尚留此耶！”尽取所著书板并藏书百种焚之，至少那是第二次。其三，此稿手录于即将被逮下狱之前（此第一次下狱，后康熙八年再下狱），自感命途多舛，遂选取“能自见其性情”的诗作交给王逸庵保存，嘱托他日合集以传，可见此册实为研究其生平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此所谓“未刻”系指顺治十五年以前未付梓，他卒后三年即康熙十四年（1675）其长子周在浚于金陵为之集

辑刻《赖古堂集》二十四卷（今有《清人别集丛刊》影印本），上述诸诗均囊括其中，然与稿本相较，仍有标题、诗句相异者，如《赖集》所录《与有介》诗，稿本题作《寿介寿，勿勿与介交十一载矣》，集本“未成远”、“恋君酒美不须钱”二句，稿本作“不成远”、“为君酒美须臾焉”等等。此稿本钤有“胶西王逸庵家藏书画印”、“闷海十二年游人”二篆印。

《俞渐川集》，（清）俞汝言撰。清抄本，诗文集。汝言字右吉，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他一生坎坷，在明末仕途未捷，入清遂弃举子业，绝了做官从政的路。颇有遗民思想，专事典籍收藏整理，授徒讲学，著述立言。一生著述颇多，却因家贫无力刊刻，多散佚不存。四库馆臣根据他的手稿本，将其《春秋评议》、《春秋四传评议》收录在《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提要》称他的著述“简汰精审，多得经意”，“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帙无几，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药石，亦可谓深得经意者矣”，可见极为推崇的。其引朱彝尊《经义考》中缪泳之言，谓俞氏“尝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诗古文曰《渐川集》，今皆未见”。显然，这部《俞渐川集》乃四库馆臣未见之书，其流传罕秘可知。该书为俞氏同宗后人俞城之师竹斋据稿本传抄的，全书四卷，诗文诸体具备，篇幅各占其半。前有曹溶、文德翼、魏禧三序，皆备称俞之为人为学。该书除了反映俞氏生平外，还收录他所作的《儒论》三篇及《西汉官秩序》、《明世家考序》及《西平县志》小序十二篇，使我们藉以得知其亡佚著述之大概；记载了他与清初一些遗民、学者如屈大均、顾炎武、朱彝尊等人的交往和学术探讨；还有大量浙江尤

其是嘉兴籍文人武士的寿序、小传、神道牌、行状以及纪事诗，其中抗清殉节为多，这些传记性资料，或为其他史籍不载，或较后之记载详尽，是研究明清之际，江南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资料。

(同治)《涡阳县志》，（清）奉宪檄于同治八年（1869）纂修。作者历经三任知县，至十一年成稿而未曾付梓。书六卷，下析子目六十五。体例较当、内容翔实。按，涡阳乃同治三年清军残酷镇压捻军起义以后，由颍州知府英翰（也是镇压捻军元凶）会同督抚奏请清廷拨亳县、宿州、阜阳、蒙城四境之地新设，取北魏时旧称及在涡水之北而命名，目的是加强对其地的统治、防止这里“刁悍顽民”之东山再起。本志是该县首创志，据立县不及十年。故其舆地、人物、艺文、杂类等旧事，属于今涡阳境地者，皆从上述四地旧志摘之，不足与论，惟武备、人物、艺文志所载咸同间新近人事，极与继太平军之后震撼半个中国的捻军起义相关。盖涡阳县乃捻军起义之发祥地，其首领张洛行、张宗禹等皆为县人。如《武备志·兵事》详载咸丰三年（1853）正月至同治二年（1863）二月捻军起义和失败之经过。《人物志》中的《忠节》、《武功》及《艺文志》人物行状纪略，多载有镇压捻军的帮凶，如英翰、牛斐然、牛师韩等人的血腥行径，反衬捻军英勇斗争。且本志纂修上距捻军起义斗争不过十来年，不乏当事人存世者，所以史实应当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因此该书对于研究捻军起义者是最为难得的资料，然而向以此孤本存传，世人不得一见。颇具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刻·捻军》第二册《各地活动》中录的是（民国）《涡阳县志》，而民国志始纂于1919年，成于1920年，初印于1924

年。虽其以同治志为粉本，然删节改订变化较大，且上据事情发生已经六七十年之久，以资料贵乎原始论，自然民国志所载远不及同治志可靠。如捻军雉河集会盟时间问题，史学界历来颇有歧说，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参考书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五卷《清·近代》（张习孔、田珏主编，1997年北京出版社第二版）在“咸丰五年七月”条下列“雉河集会盟。是月（一说八月。引者注：或说是年秋）各地捻党首领在雉河集（今安徽涡阳）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组成捻军，旗分五色”。而（同治）《涡阳县志·武备志·兵事》载：“咸丰六年正月，张烙刑伪称盟主分五旗”，并详细记载其经过：“众匪欲尊烙刑为首，与烙刑谋士郑景华、李士锰谋之，二人均系蒙城岁贡。郑、李云：‘欲尊为首，胥奉约束。’乃择吉日，先安置烙刑于韩家楼，众匪齐赴请烙刑登坛。烙刑故作谦让，方乘肩舆至雉河集山西会馆，宰杀牛马，祭吉（告）天地。郑、李一为赞礼、一读祝文，伪尊烙刑为盟主。郑、李又献计云：‘旗号，三军耳目，须分五色正镶，俾各领之以便认识，方有纪律。’于是以韩奇峰为蓝旗首、侯士伟为红旗首、宫得（树）为白旗首、苏天福为黑旗首，张烙刑自领黄旗……”虽然主“咸丰五年七月”说者，有都察院左都察御史、署户部尚书、宗室文彩等奏折为据，那毕竟是二手乃至三手资料。从地方志的“地近而颇，时近而真”的记载特点看，此足可澄清史学界这一团迷雾。又，该志向著录为“稿本”（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今审其书既无印鉴可凭，也无改动修补签条，字迹虽不工整，却无涂鸦之处，而杨雨霖志序有云：“始遵奉所发条款，先于亳、蒙、阜、宿旧志内其地舆志之山川等条、选举士之进士等条、人物志名贤等条，

以及艺文、杂类，或地或人属于涡阳者，莫不拨入，以立根基”。其中明显为“选举志之进士等条”，而抄胥者不识原稿致误（且颇多错别字），据此书当为抄本。然而不论是稿是抄，因别无他本，其史料价值不减。

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

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　吴希贤编。编者作为国家文物鉴定专家，长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取诸家所藏、世上难得窥见的一百二十四种小说、一百零二种戏曲书影加以整理，按原书大小影印出版。全书共分二编，上编古代小说，下编古代戏曲。其中多为罕见秘籍，如元末明初刊本《西厢记》、“公私书目俱未著录”的明弘正间活字本《分类夷坚志》、聊斋抄稿本《异史》以及《王宝训解启蒙故事》、《历朝故事通宗》、《千古奇闻》等。此书辑录各原版小说、戏曲的封面、首叶、序跋与目录及人物故事的大量版刻图像，并保留版本学家（赵万里等）、原藏家的识语与印章，资料极其珍贵。本书可以窥探古代小说戏曲原本及重要版刻的真实面目。卷首有史树青序、吴希贤前言、刘燕远例言。

雕版印刷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唐、五代时期版画开始出现，1974 年陕西西安西郊出土的初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约 7 世纪）是世界最早的本刻版画。又如敦煌莫高窟发现唐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经》，其引首有祇树给孤独园说法图，为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古木刻版画，已相当成熟。其后，宋、金、元、明各代，雕版印刷业不断发展，并由宗教版画发展为应用版画及艺术版画，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版画插图亦极为盛行。

明代版画之发达已臻鼎盛。书籍附有版画插图成为当时印刷特色之一。插图书籍每书少或数幅、数十幅，多则至一二百幅，不但数量大，而质量往往超过前代。插图或为上图下文而成连环画形式，或插于每一回目或正文中间，而以集中置于卷首者为多。成化、弘治以后，小说、戏曲广泛流行，出版商为迎合读者所好，扩大销路，无不冠图，其小说、戏曲无图者则滞销，难于出售。图版能帮助读者理解正文，提高书籍艺术，雅俗共赏，故能受到读者欢迎。明代刻书附图，成为一时风气。精心雕镂，书林竞争，书名多冠以纂图、绘像、绣像、全像、出像或全相、补相等字样。此风至万历、天启、崇祯时期尤为盛行，成为中国版画发展史上之黄金时代。明代版画，以刊版地点大致分为北京、南京、建阳、徽州四派。

北京派：以成化间永顺堂刊《说唱词话》最为著名。1970年上海市嘉定县出土，讲史类三种，公案类四种，传奇三种，南戏一种。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上图下文，其余《全相石郎驸马传》等均为图占一面。弘治戊午十一年（1498）正阳门内岳家《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书品宽大，每面上图下文，词与图合，以便客邸、泛舟坐客阅览歌唱。

南京派：万历年间，金陵唐氏书坊所刻戏曲繁多。唐对溪富春堂多至百种，见存者亦有三四十种，文字叶板框四周装饰回文图案，称为‘花栏’，‘出像’版画风格古朴豪放。唐乡谷世德堂由富春堂分立出来，风格近似。唐锦池文林阁、唐振吾广庆堂、陈大来继志斋插图渐趋工丽。

建阳派：元代建安虞氏首创连环画式之图书《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形式，影响久远。明建阳书林继承传统。嘉靖、

隆庆、万历间，此风尤盛。余氏、熊氏以及刘、杨、郑、叶、黄、陈、江、金、周、詹诸家所刻极为丰富。余氏双峰堂刻本《水浒志传评林》、书林仙源余成章梓《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书林莲台刘求茂乡梓《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等之附图，是其代表。

徽州派：万历间，徽州派版画崛起，纤丽细致，姿态妍美，开卷悦目，引人入胜，是名副其实的绣像、绣梓。不少版画出自当时名笔，刻工大部分出于歙县虬村。自称新安黄氏或古歙黄氏，其中著名者如黄应光，刻有徐评《画意西厢》、《西厢记考》、香雪居《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元曲选》、《乐府先春》、《吴骚集》、容与堂本《水浒传》、李评《琵琶记》、《西厢》、《玉合》、《红拂》，以及《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等。黄应瑞刻有《大雅堂杂剧》、《四声猿》等，黄德时刻有《玉簪记》等，黄一楷刻有起凤馆本《琵琶记》、《西厢记》、《青楼韵语》、《顾典斋元杂剧》、李评《浣纱记》等。黄氏父子兄弟叔侄一门，妙擅绝艺，当时有“雕龙手”、“宁内奇工”之称。因此，常被外地邀请刻书。当时，有人或因生活、工作关系迁居他乡，如黄德宠迁苏州，黄应光、黄应秋、黄一楷、黄一彬及其子建中（子立）等迁杭州。杭州版画受其影响较大。武林名匠项南洲（仲华）、洪国良，以及建安刻工后迁杭州者刘素明所刻插图，都受到徽派的极大影响。

清代早期版画继承明季之遗风。清初金陵刻工穆近文在苏州设局，所刻《秋水堂双萃园传奇》插图八幅，十分精致。康熙、乾隆时期在整理传统文化基础上，禁毁书籍不在少数，其中禁毁民间流行小说、戏曲数量尤多，因之对小说戏曲发展影

响较大，甚至《红楼梦》亦有读者认为‘恐有违碍语’之嫌。这致使因小说戏曲而发达起来之木刻插图，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一般认为清代小说、戏曲不如明代繁盛，但几部重要作品仍有精致木刻插图。如顺治时期，李渔《笠翁十种曲》、李玉《一笠庵新编传奇》，都附有精美版画插图。有些明人戏曲、小说，清代重刻时曾加插图，胜于旧刻。如顺治元年嵩山书院刻《绘像三国志》。康熙间新安鲍承勋所刻戏曲中之《扬州梦》传奇、《杂剧新编》、《秦楼月》等，显示了鲍氏一家仍是明代徽派的正宗传人。其他如康熙间四雪草堂刊本《隋唐演义》、《封神榜》等插图，规模相当宏大，亦属徽派名作。稍后如康熙本《长生殿》、《珊瑚玦》、《双忠庙》，乾隆程伟元本《红楼梦》，诸书插图，由于画家艺术水平高低不同，刻工非出一时一地，优劣互见，反映了清代插图艺术的概况。

以上所述为小说、戏曲明清版画概貌。本书收录以明代为主，其中多属江、浙、皖、闽四省精刊，一部分则出自名画家、名刻家之手，绘图精良，雕刊工细，足称小说、戏曲明代版画盛时佳作。此类佳刻，由于图饰精细，纹线人微，初次刷印，不过百部，故世间流传极少，为古籍中最珍贵之善本。至于本书所选几种《红楼梦》插图，则是从中选出之精品，名著附以精刻插图，可与明刊诸本并美。

此书上编古代小说部分，收录图书一百一十二种。依据实际收录情况，并参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等，分为五类：一文言、二话本与拟话本、三讲史、四烟粉、五灵怪

与公案。各类的编排，基本上按作者或作品的年代先后为序。但为便于读者查阅，其间又将题材邻近者或后续各书相互聚合，不仅类聚了戚蓼生评本、程甲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王希廉评本等十二种版本，而且还有《红楼梦补》、《增补红楼梦》、《红楼幻梦》、《红楼梦影》、《新红楼梦》、《红楼真梦版画集》等。

下编古代戏曲部分，收录图书一百余种。编排时，曾参酌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以及庄一拂《中国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著录。大体上也以作家年代为序，其间亦以类相聚而合于一组。

为了便于小说戏曲版本目录学者的了解，将各书的著者、刊刻年代及版本行款等情况，依原书题款，著录于全书总目各条之后。

为了便于版本学者与美术史专家的研究参考，所收各书，除原本缺失外，俱辑存其封面、首叶，并尽量地保存原书的序跋、目录与人物绘像。原书上的版本学家、藏家的识语与印章，亦俱一一保留之。例如明弘正间活字本《分类夷坚志》卷尾，有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题识云："此本首题建安叶荣祖类编，虽残帙，然为弘正间活字印本，尚早于洪本数十年。公私书目俱未著录，亦罕见之秘籍矣（按洪本书叶亦收录于本书中）。"诸如此类的题识，可供研究者参考。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　正、续集，共收录西北方志五十六种，多属稿本、抄本或乾隆以前刻本。流传极少。台湾出版《方志丛书》及上海出版《方志大全》，均未见收入，对研究中国西北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风俗极具参考价值，现分别于甘肃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珍藏。影印本卷前有邵国秀前言。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十九种。按省区分为：陕西一种，甘肃十五种，宁夏一种，新疆二种；按时代分为：明代三种，清代十五种，民国一种；按版本分为：稿本四种，抄本十一种，珍稀刻本三种，据稿本翻印的油印本一种。

所收的稿本是［民国］《甘肃通志稿》、［光绪］《新疆回部纪略》、［光绪］《新修打拉池县丞志》、［光绪］《泾州乡土志》。其中，以前两种文献价值最高。［民国］《甘肃通志稿》，刘郁芬修，杨思、张维等纂。1936 年成稿，分：舆地、建置、民族、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外交、职官、选举、人物、金石、艺文、纪事、变异、杂记十七纲九十三目，共一百三十一卷首一卷，约四百五十万字。全志材料翔实，征引广博，体例严谨，编次分明，实为甘肃省志中最好的一部。稿成之时，抗日战争爆发，未及付梓，原稿本和清稿本交甘肃省图

书馆保存。此次影印出版，是第一次将全稿公诸于世。[光绪]《新疆回部纪略》，慕璋纂。璋又名霁堂，甘肃镇原人，曾任西宁县教谕。光绪九年（1833）受命考察新疆，以为尔后设县做准备。据正史和地方档案纂成此书，稿存陕西总督府，底稿为其子少堂所存，建国后捐赠甘肃省图书馆。全书十二卷，一至九卷记新疆回部（维吾尔族居住地区）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官制、营伍、粮饷、赋税、钱法、军台及回务等，末三卷为霍集斯列传、土尔扈特传及特产等。内容丰富，记事简赅，是研究新疆民族与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甘肃省图书馆素以收藏西北文献丰富著称于世。八十年来，采用各种方式收集地方文献。依据兄弟馆或私人所藏珍稀刻本抄写西北方志，自然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因此，在这次影印出版的西北方志中，抄本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嘉靖]《徽郡志》、[万历]《重修通渭县志》、[顺治]《华亭县志》，是三县现存最早的县志，记事虽简约，却保存了不少明代及其以前的珍贵史料；[康熙]《庄浪县志》对明末战乱之后庄浪的荒困状况记载颇详，对研究明清之际北方经济，极有参考价值；[乾隆]《银川小志》对乾隆三年（1738）宁夏大地震有详细记载，是研究地震预报的珍贵材料；[万历]《庄浪汇纪》，根据当时档案编纂，真实可靠，详细具体，对明代边防制度记载之详远胜他书，史料价值极高。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所收的三种刻本，[康熙]《静宁州志》、[光绪]《陇西县志》、[乾隆]《陇西县志》义例简要，考证精审，对于经济、民生等事记载尤详，被誉为陇上名志。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收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的

省志或类似的省（区）志六种。陕西修纂地方志的历史悠久，被誉为地方志的渊源之乡。至明代，陕西进入了修纂地方志的鼎盛时期，有明一代曾五修省志。仅嘉靖及其以前就有［成化］《陕西志》、［嘉靖］《雍大记》、［嘉靖］《陕西通志》问世。［成化］《陕西志》，伍余福纂，成化十一年（1475）成书，三十卷。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存两淮盐政采进本，今仅见之于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曰："是编成于成化乙未（1475），以府州县所寺监为纲，而各系门目于其下，如一统志之例。陕西为古都会地，旧迹颇多，金石尤富，诸书记载颇详，其所采摘，尚未能完备。"［嘉靖］《雍大记》，何景明撰，三十六卷，嘉靖元年（1522）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三辅黄图以后，宋敏求、程大昌所作最为简要有法。景明广事搜采，意欲突过前人，而嗜博务多，如历代史赞之类，概为收之，未免泛滥。文字多摹古而失真。如改沿革志曰考易，改艺文志曰志贲，名目皆出臆创。"上述两志前者未能详备，且仅见之于存目，已经失传；后者虽存世，无奈世人对其评价不高。惟［嘉靖］《陕西通志》，无论体例之严谨，或记事之详确，皆远在前两志之上。此志凡四十卷，嘉靖二十一年（1542）成书，赵廷瑞修，马理纂。马理，字伯循，号溪田，陕西三原人，正德进士，官考工郎，迁光禄寺卿，有《溪田文集》等多种著作行世。全志设星野、山川、封建、疆域、建置沿革、西域、圣神帝王遗迹、古迹、圣神、经籍、帝王、纶绂史子集、全陕名宦、艺文、户口、物产、仙释、职官、水利、兵防、马政、风俗、灾祥、鉴戒等目；并分述西安、凤翔、汉中、平凉、巩昌、临洮、庆阳、延安等府及三边名宦、乡贤、

流寓。此书保存了陕甘两省大量明代及其以前的史料，实为陕西明代最有价值的一部省志。

宁夏，明代为宁夏卫或固原州。清初沿袭明制。雍正三年（1725）改为宁夏府。民国十八年（1929）始建宁夏省。明代三百年间，编纂的宁夏方志有：［宣德］《宁夏志》、［弘治］《宁夏新志》、［万历］《朔方志》、［万历］《朔方新志》五部。这次收入［弘治］《宁夏新志》八卷，是继［宣德］《宁夏志》之后的宁夏第二部地方志。弘治十四年（1501）成书并刊刻，王珣修，胡汝砺纂。胡汝砺，宁夏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全书共八卷（卷七佚），分五类，一宁夏总镇，二人物、大事，三镇外属城，四历史考证，五艺文。前冠宁夏巡抚王珣序，后载胡汝砺后序，内附“宁夏城图”与“国朝混一宁夏境之图”。此书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宁夏志，对研究宁夏史地和明代九边重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除收上述两种省（区）志外，还收录了［民国］《青藏界图说》、［道光］《西域考古录》、［光绪］《新疆大记》和［民国］《新疆大记补编》四部著作。这些著作书名虽不称作“省志”，但其记事方法、编写体例，却近似省志。一般方志学著作也将其作为省志对待。［民国］《青藏界图说》对青藏交界的地形、山脉、河流、市会、村落、物产、习俗的记载极其罕见，史料价值很高。［道光］《西域考古录》，俞浩撰，记述兰州以西、天山南北麓，以及西藏诸地古今地名、山川形势、风土民情，在总撮旧籍的基础上并有所考辨。［光绪］《新疆大记》，阚凤楼撰，草创于咸、同年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方由其孙阚铎校对付印。［民国］《新疆

大记补编》，吴廷燮纂。吴曾任清史馆总纂，晚年受阚铎之托补订［光绪］《新疆大记》。《补编》分叙疆域、山水、村屯、道路、沟渠、户口、田赋、部族、物产与郡县建置始末，条目之清晰，叙述之详明，皆胜于前书。以上四部书，保存了丰富的青、新两省（区）地方史料，弥补了两省（区）之省（区）志记载简略的缺憾。今将其收入本书，与其他志书一并影印出版，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收府州县志二十三种。其中有陕西十二种，甘肃七种，宁夏一种，新疆三种，它们是从七百多种志书中挑选出来的。例如：［万历］《富平县志》，刘兑修，孙丕扬纂，万历二十年（1584）刊刻，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刻。包括图、考、传、志四部分，沟洫志对渠堰记载颇详，是明代陕西十大名志之一。

［万历］《韩城县志》，苏进修，张士佩纂，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印。文词简约，记事翔实，表格清晰易读，是韩城县的第一部县志。

［康熙］《米脂县志》，宁养气修纂，康熙二十年（1681）刻印，为米脂县最早的县志。［民国］《米脂县志》，严建章、高仲谦修，高照初纂，民国三十三年（1944）刊印。内容丰富，新旧并蓄，其中关于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史料尤为珍贵。

［民国］《镇安县志》，滕仲黄修纂，民国十八年（1929）刊印。该志对当地矿产的记载较详，关于明末农民军、同治年间太平军和民国三年（1914）白朗起义军的记载，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嘉靖]《平凉府志》，赵时春纂，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印，是平凉现存最早的府志。赵时春，字景仁，号浚谷，平凉县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赵以文章名于世，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唐顺之曾说："宋有欧、苏，明有王、赵。"对其所纂府志历来评价很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道："考证叙述，具有史法，在关中诸志内，最为有名。"著名方志学家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中也赞道："浚谷平凉志，声名籍甚。陇中今无传本，现于京馆读之。指斥时政，能言人所不敢言，于民生疾苦兢兢焉，惟恐言之不尽。"

[光绪]《莎车府志》，佚名纂，宣统元年（1909）抄本。此书对莎车的物候、川流、国界、牧界、种族、沿革、学校、官制、邻交、商业、工艺、田赋、物产等等，均有较详记载。此外，还有一些府县志也都是研究中国西北的宝贵文献。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收录了甘肃的采访录［光绪］《泾州采访新志》、［光绪］《崇信县采访乡土志》两种。它们都是光、宣年间为修纂［宣统］《甘肃新通志》准备的应征书，例目与新志大致相同，但与新志相比，内容更丰富，记事更具体，其资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还收录了陕、甘两省的乡土志六种。乡土志产生较早，南宋绍兴五年（1135）常棠就曾编过《澉水志》。光绪年间清政府颁发《部颁乡土志例目》，以推动全国乡土志的编纂。清末民初作为蒙学教材，乡土志问世较多。收入本《续集》的有［光绪］《洵洋县乡土志》、［民国］《榆林县乡土志》、［民国］《洋县乡土志》、［民国］《西乡县乡土志》、［民国］《保安县乡土志》、［光绪］《安定县乡土志》。

这些乡土志，均包括历史、地理、人事三方面内容，记事详确，社会历史资料丰富，值得重视。

本书所收的三十七种方志，分为十册。按陕、甘、宁、青、新为序排列；同一省（区）的方志，省志在前，府州县志在后，至于府州县志的次序，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册》所载地、县次序确定其先后；同一省或府州县有不止一种方志时，年代早的在前，年代晚的在后。为方便读者，全书有总目，每册设分目，各省、州、府志立子目。原书的残缺部分，在书中加以注明。原书有次序倒置、页码错乱现象，在整理时已一一加以更正。

名人楹联墨宝集锦

名人楹联墨宝集锦　（明）唐寅、（清）郑板桥、曾国藩等撰，（清）吴隐编。（清）俞越、严信厚、（民国）杨守敬、陶浚宣跋。此书是将明清两代三百位名人手写的楹联摹刻于石，再拓裱成册，汇编成十二集，行、草、隶、篆各具特色，有极高的欣赏、借鉴和收藏价值。现据私家藏吴氏当年的初拓本影印出版。卷首有尚林序言。

吴隐，号石潜，浙江绍兴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清末金石篆刻家。此书是吴隐尽数十年之功，搜集了明、清两代三百余位名人的楹联手迹，采用当时刚刚传入我国的摄影技术，将其摹刻于石，再拓裱成册，汇编十二集，取名《古今楹联汇刻》。收有：（清）爱新觉罗·允禧，清康熙帝第二十一子，封慎郡王，字谦斋，号紫琼道人；爱新觉罗·永瑢，清乾隆帝第六子，封质庄亲王，号九思主人；爱新觉罗·永星，清乾隆帝第十一子，封成亲王，号少厂；铁保，字治亭，号梅庵；英和，字树琴，号煦斋；玉辂，字赐山；德林，字君直，号砚香；如山，字冠九，号古稀男子；（明）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翰林博士；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官户部尚书；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官兵部武选司；吴宽，字原博，人称匏庵先生；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官南京兵部尚书；倪

元璐，字玉汝，号鸿宝，官户礼两部尚书；黄道周，字玄，号石斋，官礼部尚书；史可法，字宪之，一字道邻，武英殿学士；米万钟，字仲诏，号友石，宋米芾后裔；（清）顾炎武，号亭林；傅山，字青主，号啬庐、朱衣道人；陆陇其，字稼书；陈邦彦，字世南，号春晖，官礼部侍郎；张照，字得天，号泾南，官刑部尚书；钱维城，字宗，号稼轩，官刑部侍郎；石韫玉，字执如，号琢堂，乾隆五十五年状元，官山东按察使。周于礼，字妥远，一字亦园，号立崖，官大理寺少卿；钱大昕，字及之，一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以及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手迹。

楹联是挂或贴于楹柱的对联，又称楹帖。相传始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寝门桃符板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宋时更用于楹柱，故名。楹联虽出于五代，但盛行于明、清。每逢节庆，人们皆以张贴楹联为时尚。

这些楹联都有极高的欣赏、借鉴、研究和收藏价值。然而石刻拓本历经沧桑，存世甚少。今影印出版时更名为《名人楹联墨宝集锦》，并按原顺序编制了著者目录及附著者简介，大大方便了广大书法爱好者、文学研究者及收藏家。